

目 录

文 献

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彭德怀(1)

回 忆 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耿 飏 贺晋年(8)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李 强(30)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田 方(37)

人 物 介 绍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王 焰(47)

专 题 资 料

1959年庐山会议记事陈诗惠(1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
的关系和斗争金蕴芳 丁晓春等(150)
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概述.....师文华 卢海明(180)

1936年广东省党组织的重建和南方临时
工委成立始末

.....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17)

史 实 考 订

李富春、蔡畅由法国赴莫斯科时间考

..... 周永雪 (232)

转 载

彭德怀同志视察敦煌小记 王文煊 (235)

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彭 德 怀

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我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如各地群众来信和军队内部的反映；同张闻天、周小舟谈话；小组会的讨论；庐山食堂的议论；《内部参考》；特别是中央印发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贯彻执行1958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分析》（载1959年6月29日《宣传动态》）以及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经过阅读与同志们交谈，加以初步分析，形成的概念，反映给毛主席。

我国自1958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是大跃进的速度，究竟宜有多大呢？是一年翻一番，两年或三年翻一番，或者是四年翻一番呢？经过第一个五年（1952年—1957年）和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和努力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是有严重困难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这样高速度的建设是难以继续持久的。苏联采取五年计划，即五年翻一番，这样的速度，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每年平均递增

* 本文节自彭德怀1959年7月—8月间出席庐山会议期间和会后所写的笔记，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14. 87%。根据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论述，每年平均增长13%至14%，这是最低速度。我国比苏联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国的条件比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要好些，人力也更强大得多。究竟能快多少呢？如四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18.93%。如三年翻一番，每年平均递增26%。我国工业建设应当努力争取在三至四年间翻一番，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话，就可提出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或者三年半完成。似此，既紧张又留有余地，避免大马鞍形。争取高速度的发展经济计划，没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速度的标准，计划工作就不能不是随波逐浪的被动形势。这是工业方面要有一个标准，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标准。我国解放以来，总起来看，农业每年平均能够递增5%到7%就很不错了。这是就现在条件和逐步改善技术措施来说的。至于将来农业机械化、水利、肥料条件大大改善后，也有可能比现在增产速度要大得多。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上是存在着求成过急‘左’的倾向的。不平衡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如不迅速加以纠正，将要动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当前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紧张局面，事实上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这不仅将要影响到城市和农村的主副食品；而且会影响到轻工业原料；影响到国内市场和物资出口；影响货币回笼，也就是周转率缓慢，以致影响财政收入和货币信任。有同志说：“财政有结余，没有问题！”根据事实分析，财政不是没有问题，财政问题是在严重不平

衡的经济发展中潜伏着。要想财政真正没有问题，是建立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进口物资和出口物资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上述哪一方面失去相对平衡，发生严重不平衡现象，就会影响市场、影响财政收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如果超过市场回笼货币收入时，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货币贬值。“财政没有问题”的乐观主义者，不愿意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中潜伏着的财政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还是靠人力劳动，可是农业劳动力极为紧张，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我国从解放以来，自然气象是：三年中有一年是丰年，一年是平年，一年是歉年。即1952年是丰年，1953年是平年，1954年是歉年，又1955年是丰年，1956年是平年，1957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而1958年是一个特大的丰年，由于各种原因，使它收获得不好，保管得不好，以及多吃等浪费，造成了丰年不丰收。如果过去几年自然气象是规律性的话，那么，1959年是一个平年，1960年将是歉年。真的如此，我们当前的困难将要增多，而不是减少，时间将要延长，而不是今年秋后即可好转。即使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工作中偏差，农村中所遭受共产风的破坏，也需要有两年才能恢复到1958年夏季以前水平。至于耕牛的死亡，树木的砍伐，要恢复那是几年和十几年的事。现在并没有多少同志来注意这些情况，而是盲目乐观，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过多的调走农业劳动力，口头上是在强调工农业并举，而

事实上是忽视工农业并举，忽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8年人民公社化，那一股共产风冲击和搞乱所有制，错误地把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管理区的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几乎都变为公社所有制，造成穷队与富队之间，贫农与中农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同时紧张。对于自留地也是几收几放，增加了农民对发展生产的顾虑，人心不安，大量农民自发地流入城市，这一切当然会打击农民生产情绪，必然会造成减产的效果。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虽然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上海六中和七中全会，以及1959年4月22日发出《党内通讯》，总的说来，‘左’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未酿成动摇总路线的错误，也没有打击那些真正热情高涨的干部和群众，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胜利。但是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都纠正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存在和发展，³特别是共产风所带来的严重强迫命令，浮夸虚报，脱离群众等现象是异常严重的。某些个别县要在两三年之内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相当多的地区，实行大兵团作战，不计报酬，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男女强弱分编劳动大军，而不是强弱搭配。根据我国农村现在生产条件，这样的分工和组织是很不适当的。为了急于建新居民点，事先拆毁房屋，新居民点尚未着手建设，旧有房屋已经拆毁不少。为了炼铁，捣毁铁锅和农具，这些现象决不是正常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¹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未改造好的干部，被过去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些人对农业生

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由于过高的估计亩产量，不少地区过早的进行园田化，以1/3土地耕种，1/3土地停荒（即休耕，编者注），1/3土地植树木花草以供观赏，把远景规划当作行动口号。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影响下，²以及农村中劳动力不定等等原因，致使1959年春播面积，比1957年减少9000万亩左右。1958年大跃进，农业也是特大丰年，但因各种浪费，库存粮食没有任何增加，而且减少了！这种情况，如果一旦遭遇较为严重些的自然灾害，将要出现相当范围的饥饿危险。

工业方面主要是基本建设范围太宽，投资过多，材料缺乏，又加上分散使用，许多限额以内的工厂半截停建，或者停工待料。许多非生产性的建设可以缓建，甚至几年之内可以不建，但是急如星火，拼命赶工建成。原料生产建设一般落后于加工业，使许多加工工厂经常吃不饱或技术太差，不能不停工，结果修制两误，职工也增加过多，不少工厂人有备份，工资总额直线上升，但原材料均无储备，一失平衡，不能马上调整，结果是资金积压，浪费很大，成本过高，不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外贸易，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在我国现在物资基础这样薄弱时，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对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利的。如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这样做不仅不能多出口猪肉，反而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这于发展养猪不利，也就会减少猪肉出口。

在全民办教育的口号下，入学人数成千万地增加，

这当然是好事。但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大量改革，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以前，占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人员脱离生产，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是不相适应的。将会影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妨害大跃进，也就会真正妨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无人售货也几乎成为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特别在北京市区和郊区，是很普遍的。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所有采用无人售货者，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少则千元，多至万元。某些单位反映经营不错，但不反映真实情况。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离开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什么是特殊表现呢？因为它是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等美名誉词的掩饰下进行的，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扣上你不相信群众觉悟的大帽子，谁也就不敢提意见了。群众觉悟是否提高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比解放以前大大提高了，但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无人售货那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风格有没有呢？有！要不要呢？要！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共产主义风格的先进人物，越多越好。现时这些先进分子，在绝对数字上是不不少的，但是在相对数字上，所占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只有这些先进分子占多数时，还要加上从经济发展状况去考虑，在这两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无人售货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能做得到的事。

抢先思想，争先恐后的放卫星，报捷报喜，以少报多，以劣报优，甚至以无报有，这样的浮夸风气是普遍存在的。还有某些同志认为‘左’比右好，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党内严重缺乏民主生活，这一问题在地委和县委两级也是值得注意的。还有任务繁重，什么都要第一书记挂帅。造成严肃认真负责者，忙乱不堪，疲倦已极；官僚主义者，置若罔闻，其结果都是办不好事情的。要完全纠正‘左’的现象，克服歪风，还要用一把大力才行。以上这些就是我7月14日写信给主席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动机。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有无参考价值，请主席斟酌。我没有想到主席会把此信印发到会同志，如果我当时想到写信会要印发的话，那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我在当时也看到有右倾萌芽，但认为‘左’还是主要的，这封信印发后，我17日看到，19日就在小组会上做了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和不大符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会已经决定要开中央全会。我为什么要仓促写这封信呢？是听说15日即要闭会了，我12日上午想到主席处谈谈就算了，走过去时，警卫人员说，主席刚睡，我回居住地后，仍去参加小组会。13日晚间便写成此信，14日送给主席的。我认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写信或当面说是应该的，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的。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耿 飏 贺晋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又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总后方，为国内革命人士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了合作，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很清楚，陕甘宁边区是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故视边区如背上之芒、肉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以此来削弱、扼杀边区，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消灭边区。

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华北敌后，对日作战。在陕甘宁边区仅留下少数留守部队，总兵力仅1.5万余人。当时国民党当局并不给我们这些留守部队的领导机构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我们即以八路军留守处的名义组建了留守部队领导机构——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

部主任莫文骅），并先后成立了绥德、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属五个军分区（警备区）。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包围、侵扰情况的发展，我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编组情况也有所改变，兵力也有所加强。但就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说，^⑤我边区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我们仅有的这些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部队，既要保卫从宜川到神府一线的千里河防，阻止日寇的西进，又要对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一直处在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入侵威胁之下。

（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积极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獗。同年底，蒋介石、阎锡山在晋西北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制造了“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他们大举入侵，夺地掠城，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

收卖我方人员刺探军情，阻扰我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罪恶行径，对我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军事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

陇东分区，东连陕西，西北接宁夏，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初期，我方在陇东仅留下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副旅长耿飏）旅部及其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的警备第二团（团长周求保）、教导师袁国平部的全部与环县、曲子、华池等县保安队合并改编成的警备第七团（团长袁渊），以及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一个军分区独立营和几个县的保安队。这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合计起来，才4000人左右。陇东分区未专门设立军分区机构，由三八五旅兼军分区。

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挑起的。早在1938年12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就曾袭击我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扬言要消灭我陇东的八路军。自此之后，驻西峰镇的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即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军粮草，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1939年1月间，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邵介民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者是汉奸”，并采取挑衅行为，捕押我方的民运工作人员。4月初，“西峰公署”派保安队在南三镇绑走我方人员10名，我方当即向“西峰公署”，并电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然无结果。9日晚，我三八五旅亦派兵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的一名区员和义警队长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日益紧张。10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令其派部队进犯我镇原县。该师随即派出部队会同保安队，向我七七〇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造成围城态势。我三营闭城自卫，力求以谈判来解决争端。我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也急电蒋介石、朱绍良、程潜，要他们制止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由国共双方派员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到5月初，国民党当局才同意谈判，镇原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一再胁迫我宁县驻军七七〇团二营撤走。我二营当然不予置理。不久，国民党一六五师的三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余人，向我二营发动攻击。二营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的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城中一幢楼内。预布在城外的敌骑兵连乘势攻城，我二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直到5月中旬，在我方代表向“西峰公署”再三抗议下，对方见势不利，始将三个骑兵连撤走，宁县事件暂告解决。

在镇、宁两县事件尚未彻底解决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又在筹划新的摩擦事件。1939年9月中旬，经朱绍良与驻平凉之第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钟竟成的策划，第二次陇东事件就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展到陇东各县。12月10日夜，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纠合保安队突然袭击我驻宁县的七七〇团二营，因我军无防备，伤亡大半，仅一小部突出城外，战斗至1940年1月，我军被迫撤出宁县全境。12月16日，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两个营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围攻我镇原县城内的三营。因敌我力量悬殊，三营于是日晚间突围出城，移驻孟坝，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8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我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三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后赵匪窜至环县北门外，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击退，赵匪败退后，乱窜于洪德、虎洞等六个区之间，肆无忌惮地抢掠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个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我陇东分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警备二团，于2月16日出动进剿，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全部摧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余匪全部就擒。与此同时，我警二团还击溃了暗藏在我环县车道区内的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爪牙张廷杰，解决了由张煽动的我自卫军900余人的叛逃事件。2月中旬，我军一部曾在正宁县平子镇与国民党保安队激战两天，尔后退出了正宁县。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我亦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城

内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黄陵、店头一带的一条几十里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把它叫做“葫芦把”把关中地区叫做“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总想先把它吃掉，然后侵吞整个边区。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方在关中分区的兵力很弱，原先只有保安独立一营（营长高步云）和保安独立二营（营长张占云）两个营，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进保安独立三营（营长贺吉祥）。而他们面对着的却是胡宗南的20万正规军。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因此不断在关中地区制造摩擦事件，企图蚕食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

1939年5月下旬，我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一名上士路过旬邑县城时被国民党暗杀队杀害。我驻旬邑县城的独一营和荣校代表再三要求国民党县长惩办凶手不成，我荣军一个排开进县城，遂即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县长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会同国民党保六团一营围攻我保安独一营和荣军排，激战7天8夜，终因寡不敌众，我保安独一营被迫撤出旬邑县城。为此事件，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曾致电蒋介石和程潜等人，要求严惩

枪杀我荣军的凶顽，停止进攻我八路军驻地。

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城建在南北走向的大沟里。当时，我保安独二营驻在县城的南关，国民党军队驻北关，北关比南关地势高，两关相距仅200米左右，国民党军队居高临下，不时向我哨棚扔砖石，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我军退出县城，我保安独二营与其作了针锋相对斗争。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派其二十四师围攻我保安独二营，打了2天，在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我保安独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到此，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制造的这几次摩擦事件，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的地盘。

虽然如此，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军则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我关中分区保安独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店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对方10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两股匪徒共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活动范围的阴谋。这些胜利使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警备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延安通往华北、华日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的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

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五县的大部分农村，原系苏区，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绥德五县划为警备区。警备区由陈奇涵任司令员，指挥我留守部队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和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负责河防。而国民党当局的政权组织，既不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来绥德任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曾被毛主席当面斥责为“摩擦专员”的何绍南，一到绥德，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还有什么“板子”（娼妓）队，对我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而且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胁迫群众不与我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何绍南一伙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该地区，截断我党中央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的阴谋。

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故曾多次找何绍南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商谈，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对外。但何绍南及其党徒视我们为软弱可欺，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不得不改换斗争方式。从此，无论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谈判桌上，或是在请客席上，他们就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予以无情的驳斥和彻底的揭露。各部

队则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并派出小部队下乡镇，深入到群众中去，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对那些坚持屯粮不售的劣绅们，我们则向他们摆出蒋介石的“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训词”，采取封仓按官价收购等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有粮出粮。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回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揭露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使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起来。

1939年秋，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从晋西北回师边区，进驻绥德地区（王震任警备区司令员），何绍南既怕又恨，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但就在这欢迎会上，却大放厥词，说什么，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王震旅长当即予以驳斥道：“我们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会后，何绍南就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我三五九旅是“溃军”。王震旅长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何见势不妙，乃亲赴西安请示对策。翌年2月，何返回了绥德，立即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反共策划，阴谋集中13个保安中队偷袭我驻军。三五九旅得悉后，除在军事上作好必要的准备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何见我已有准备，其罪行又被揭露，故即煽惑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我七一七团，并抢占了一些阵地，我七一七团当即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匪徒。何绍南本人则于1940年2月29日深夜，率7个

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之械弹库后向西逃窜。这批保安队被我追击部歼灭了一大半，何绍南只带几十人逃回榆林。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电致请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绥德专员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将绥德警备区所属县的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司令员为绥德行政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王震司令员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公众并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五县面貌一新。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就告平息。

在抗击这次反共高潮中，我留守兵团各部队、三五九旅和边区保安部队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警备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分区，我方虽退出了五座县城和一些区乡，但我方的力量也都有较大的发展：在政权建设上，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镇原、庆阳有一部分白区）；在军事力量方面，我方兵力也大有加强，如陇东分区比原先有成倍的增长，仅正规军就增加了3000人，地方武装也增加了1000余人。

（二）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了对我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的军民。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

战区的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各地强拉民夫构筑了五道封锁线，计北线两道，南线三道，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垣数省。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国民党对南线的封锁尤为重视，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上总是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这样，在一段时间内，边区周围处于对峙胶着状态。

1940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法西斯订立了三国同盟之后，为放手向南洋进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急谋解决中日战争，以巩固其南进的后方。为此，日寇就亟力勾引国民党中的投降派，策动中国的内部变化，企图借中国人之手来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加紧推行其对日妥协和积极反共的政策。于是，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是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同样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在这次反共高潮前后，国民党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其总兵力已达40万之众，而且都作好了进攻边区的军事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第一步夺取我关中分区这个“宝葫芦”，第二步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夺取我三边和陇东地区。所以他们首先在我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尔后在三边分区的张家畔、绥

德分区的吉镇，陇东分区的宁望堡等地挑起了摩擦战斗，又侵占了我边区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王震率三五九旅的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和甘泉、富县等地区，进行屯垦，又令警备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同年8月正式成立了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保安独立团（团长刘茂功）。

警一旅下关中后，文年生旅长、阎红彦政委率领警三团、警八团和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收复柳林后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之敌赶回了原地。

边区南线的摩擦斗争基本上平息了下来，北线却又临多事之秋。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分区进逼。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县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三边分区也未专门设置军分区机构，由留守兵团警备三旅（旅长贺晋年、政委王世泰）兼管军分区的工作。为了对付何文鼎部的南下，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主席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和贺晋年分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

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部还前出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银头梁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地方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十一旅。我们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此时已取得了十一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很有利条件。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防范，就未敢继续向我边境推进。到1942年1月14日，何文鼎部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至此，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完全打退。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边区的包围封锁，给边区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留守部队和边区群众的团结一致，实行精兵简政，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国民党要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的罪恶企图，最终遭到了彻底破产。

(三)

国民党顽固派对其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并不甘心，仍伺机作新的冒险。为发动一次新的反共高潮进行舆论准备，1943年3月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污蔑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边区和人民军队为“奸党”、“奸军”、“新式割据”。同

年5月间，“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发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向共产党大举进行的时机已到，进一步掀起了反共舆论攻势，大肆鼓吹“第三国际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等谬论。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下，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打电报给毛主席，提出“解散共产党”、并取消边区割据”的狂妄要求。国民党中央社竟公然将这种明目张胆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通告中外，又一次为发动内战制造了反革命舆论。

国民党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就此开始。这次反共高潮的来势凶猛，重点是打击陕甘宁边区。为此，国民党顽固派除包围边区南线的10余个师虎视眈眈地作好进攻准备外，还从大荔、华县一带将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第一、第十六和第九十三个军中的两个军调往陕甘宁边区边境。国民党第一军之主力第七十八师和第一六七师从华阴、渭南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十六军的重炮营也由河防开到耀县。还有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到陕西中部，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也开到了淳化。这时，在边区周围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兵力猛增到60万人，而且尚有很多部队正在待命出动。在陇海铁路上，咸榆公路上，西兰公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尘嚣九天，民众惊骇，奔走相传，中央大军就要大举“剿共”。于是，边区上空战云密布。

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等来到西安，同胡宗南一

起研究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战略部署。当时国民党的计划仍是先夺取关中，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旬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二十二军配合进攻神府。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师级以上指挥官会议，对进攻边区又作了具体部署。7月上旬，他们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在我关中分区开始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4日，第五十三师一个营即向我边区富峪口进行袭击，被我军击退。6日，第一六七师师长到关中分区南部边境职田镇察看地形，进行挑衅。7日，第一六五师两次向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14日，第一六七师的一个营炮击我陇东分区阵地。17日，第九十军驻牛村、朱村的十六师向我警戒阵地发炮10余发。23日，第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连续三次向我富县境内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此时，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内战危机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国内外发出了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就胡宗南部突然撤出河防，进攻我边区的行动，朱总司令两次向蒋介石、胡宗南发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的通电，留守处肖劲光主任也致电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弥内战危机。7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全

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的社论。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与此同时，我边区军民紧急动员了起来，前方后方都作好了随时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边区部队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枕戈以待。

由于我党及时地大造革命舆论，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他们在全国人民中被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我边区军民又充分作好了迎战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偃旗息鼓，暂时搁置闪击边区的阴谋。来势凶猛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顽固派在接连的失败面前，仍然坚持其包围、封锁和破坏边区的反动政策。驻正宁县山河镇的国民党部队，为切断我关中分区与陇东分区的联系，侵占了我边区杨家畔、宋家畔等地，并继续向西坡店进攻；驻宁县朱家桥的国民党部队向我新正县保安队发动伏击。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边境挑起的军事摩擦事件就有100多起，而且又从抗日前线调回了三个军的兵力，加强对边区的包围封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又一次企图夺取我关中分区。7月间，胡宗南借口其在淳化组训的三团民兵“叛变”是八路军煽动所致，竟调集6个师兵力分三路向我淳化地区发动进攻。21日，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向我爷台山阵地发起攻击。23日又投入了预备第三

师。我警一旅三团一营和关中保安总队赤水大队、淳耀大队、总教导队，从7月21日至26日扼守在爷台山主峰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爷台山保卫战，打退了敌人两个师兵力的几十次进攻。为了避免过多伤亡，我守军奉命于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胡宗南部在100里的正面上，侵入了约20里的纵深。

淳化事件发生后，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于7月23日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予以制止。7月26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及国民参政会，宣布淳化事件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并组织社会团体作公正调查，以明真相。我军还邀请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前来爷台山地区察看。8月7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申明淳化事件真相，要求撤退进犯我边区之部队，并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但国民党当局对我方的多次要求置若罔闻，胡宗南部队继续向旬邑、耀县等地进犯。为给不知改悔的来犯者以必要的教训，我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集中三五八旅的八团、新四旅的十六团和警一旅的三团一营，于8月8日对爷台山进行反击。经过激战，于9日全歼守敌5个连，俘敌100余名，收复了爷台山阵地。11日，我军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赶出了被侵占地区，取得了“爷台山保卫战”的全胜。这是抗战时期我留守兵团反摩擦斗争的最后一次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

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至此，我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也光荣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神圣历史使命。

(四)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留守兵团所属部队、三五九旅和保安部队以及边区广大民兵的英勇善战外，最根本原因和条件是：

一、依靠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替代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一切斗争都要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同样要服从于这个大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要尽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就有必要讲究反摩擦斗争的方针、策略。我党就是在反摩擦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全正确的反摩擦斗争的方针、策略。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正是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方针、策略，才赢得了反摩擦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全国人民都是要抗战的。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总要伺机兴风作浪。因此，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的特征是，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打出手，一般的军事摩擦，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像在

三次反共高潮时那样。这样就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存。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就要采取适当的对策。1938年春，“抗大”一大队（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奉命由延安进驻瓦窑堡。临行，毛主席针对当时国民党“摩擦专员”何绍南，在绥德反共闹得很凶的情况，在对他们讲话时说：“同志们要离开延安了，送给你们一件礼物，送给你们一条打狗棍。这个打狗棍，不是别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提出的这“十六个字”，是依据斗争的实践提出来的，它既是反摩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又是具体的斗争方法。它是在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原则基础上产生的策略思想。是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错误方针的否定。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使反摩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更加具体化和完善了。顽固派要捣乱，我们就跟他斗；斗，是为了团结抗日。只要大家共同抗日，他们不来惹我们，我们便不惹他们；甚至他们在这个地区惹我们，在另一地区我们也不去主动惹他们。如果他们公然破坏抗战，则必须彻底予以揭露；他们来进攻我们，我们则坚决予以反击，直到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直到把他们打疼了，答应不破坏抗日，我们就适可而止。这就是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没酿成全面内战，而且每次都取得一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同时依靠政治斗争。我们在边区的军事力量，比国民党顽固派小得多，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可以说，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为了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就应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必须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要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顽固派无机可乘；另一方面还要抓住时机大造革命舆论，对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时甚至要以政治斗争手段为主来取胜对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在统战区的绥德地区，就是先采取在会场上展开唇枪舌战，在大街上进行“标语战”，继而深入乡镇，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揭露何绍南一伙的反动真面目，先从政治上把他们孤立起来，再从军事上收拾他们，我们就是这样把何绍南赶跑的。在陇东、关中分区，顽固派在边沿一带集结重兵，这里的反摩擦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我们便主要采取政治攻势。如在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在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到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们的支持，终于使顽固派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就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无形中加强了我们的力量。比如驻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以及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因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有矛盾，他们在摩擦斗争中就并不都听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

我们便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的中立。这就成了保证北线比较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何文鼎之所以未敢从北面进攻，与我们争取到邓宝珊部十一旅的中立也不无关系。当准备抗击何文鼎部队的三五九旅的一些部队返回原防地，路过延安，毛主席去看望他们时曾说：“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无疑也是政治斗争的胜利。

三、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只有依靠民众才能进行战争，赢得战争。边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没有边区保安部队同留守兵团部队的并肩作战，没有边区广大民兵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那是不可思议的。边区的人民群众对保卫边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有着极大的热忱。边区各级政府十分支持和爱护群众的这种热忱，及时地组织了各种民众斗争团体：在县级建立了自卫大队，在区、乡建有自卫队。这些民众武装力量能有效地做到村自为战，区自为战。在边区各地青、妇、救各种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连少年儿童也组织了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保卫边区的民众大军。顽固派搞小摩擦，群众就会主动起来把他们斗垮，顽固派发动军事进攻，群众就会奋起支援和配合我抵抗部队，进犯的敌人就会象冲进火阵的野牛，随时都会被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所烧死。

四、顽固派搞经济封锁，我们就依靠“自力更生”。反摩擦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中也包括经济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被我揭露，在军事

上又吃不掉我们，便想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民以食为天”，“军无粮草不行”，没吃没穿，什么事也干不成。党中央、毛主席早看到这一点，发出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广大军民随即热烈响应。1938年7月，延安留守兵团第二次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上决定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随着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尤其是蒋介石于1940年9月停发八路军的军费之后，大生产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在1942年形成了高潮。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1943年，全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去总消耗量160万石，余粮21万石。整个边区面貌为之一新，军民丰衣足食，为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和最后取得抗击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在1939年10月4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无不都是依靠了这三件法宝，抗击战争中的反摩擦斗争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亲身参加者，通过历史的回顾，重温了上述的一些经验，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一些的教益。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

李 强

我原来是搞科学技术工作的。1926年，在上海做过手榴弹和炸药，后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工作。1927年10月，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周恩来同志也回到上海，我又在他领导下工作。1931年，我转赴国外学习和工作。于1938年3月初回到延安。此后，在延安搞兵工前后八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史和工人运动史，是革命史册中光荣的一页，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时期，有义务和责任来回忆这一段历史。

(一)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是在落后的乡村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不但没有公营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薄弱。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仅有一个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抗战以前，加上被服厂、印刷厂等，不过270多名职工。1938年，我党开始注意在边区内建设公营工业。这时，我回到了延安。当时，延安仅有一个兵工厂，只有几台机器，几十个工人。周建祥是厂长，他原来是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厂长，是长征

过来的。工业专家沈鸿同志比我早一天到延安。抗战开始不久，他从上海把一部分机器迁到武汉，想为抗战出力。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尽力抗战和发挥他技术特长的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他经西安辗转到延安，带来了10部机器和7个工人。工人中，我现在记得的有黄海霖、曹金木、陈绍力、姜载愉等。我和沈鸿同志的合作是从筹建机器厂开始的，因为只要有了机器，就可以扩建别的工厂，制造很多东西了。就在这一年，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倡导和骨干作用。比如，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创办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这个工厂发展很快，开始只8台机器和10个工人，到1938年年底，发展到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而到1942年年底，职工总数扩大到370多人，房间120间，窑洞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计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4台，络纱车一百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等。这些机床、车床，有些是买的，另一部分是沈鸿那个机器厂制造的，还有些是难民纺织厂技师朱次复同志和工人改造制成的。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至1943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厂已发展到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量3000多匹，可供部队、机关、学

校人员所需要量的70%。发展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政府系统15个厂，军工系统8个厂，中央管理系统16个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厂，各地驻军有35个厂，各地专署有9个厂，各县政府有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20个厂。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很快地为边区公营供给工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起到了支援抗日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的伟大作用。拿军事工业来说，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〇师）一部分机器及延安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内部队枪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部队所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掷弹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供给前方底火儿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需的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月产10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之百的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供给80%到100%。

（二）

这些成绩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是由于我们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建设碰到很多困难。客观上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援断绝，完全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我们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亟需物色和训练。为了抗日战争和建设边区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下最大的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关。

第二，团结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了他们高度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艰苦奋斗。没有他们的忘我劳动和牺牲精神，我们边区的工业建设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当时，边区工厂的管理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象周建祥同志；有从东北来的，象郝希英同志，他原是张学良沈阳兵工厂的，入党以后，来到中央苏区，又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刘鼎原在苏联学过军工，到延安后分到军工局当副局长。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大都是旧式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好的知识水平，如钱志道、吴崇凌、王勋、林华、徐驰、陈振夏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成为延安各厂的厂长。各厂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些是在红军打长沙时参加革命的。如赵俊同志，他原来搞过兵工厂，有技术，朱总司令有一支驳壳枪，是南昌起义的纪念品，枪柄上的“南昌起义暴动”几个字就是他刻的。还有樊钟秀是“红枪会”的，他带一批工人从河南到了广东，被

孙中山收编了，后来参加了革命，长征时在修械所里工作，很有本事，没有机器也能制造出驳壳枪。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工人来的也不少，有的用手刻下的模子，铸出来的产品与机制的一样。还有一部份工人是从太原兵工厂和重庆兵工厂来的。这样，工人和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在建设公营厂矿企业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重点是做团结工作。当时工会的工作，主要也是做团结教育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李颀伯，还有边区总工会的许多同志，都经常深入下层抓这项工作，以后工会还发通知，开展向劳动英雄赵占魁学习的运动，各种思想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生产也搞上去了。

第三，注意改善职工生活。在这方面工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工会的领导到一般干部，都下到基层去抓职工生活。当时，工人的待遇比干部高，干部是津贴制，工人是工资制。津贴制按等级发给，一般干部拿1元到5元，技术干部可以拿到20元，而工人的工资最高可以拿到28元，一般的是十几元。我和沈鸿是津贴制，拿最高的20元。那时边区的钱很值钱，一两角钱就买一个炒肉菜，工人常有余款，有时还捐献给前方将士。

(三)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总的来看，收获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公营厂矿企业中，生产效率提高的程度很惊人。在运动初期，难民纺织厂的生产率提高了63%，化学工

厂的生产率提高92%。但是，在整风中间，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整得过头了，搞得很不好，对工厂的生产工作有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有的工厂生产下降得厉害。主要是在“抢救运动”中，乱控告，搞逼、供、信，把一些知识分子当特务来“抢救”，象徐驰、王立、汤钦训、龚家宏这样一批抗战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都被关起来了，有的工人说一两句错话，也被“抢救”了。天天晚上开大会批斗，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幸亏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很快加以纠正。后来，又做了不少赔礼道歉工作，生产下降的情况很快扭转了。

我们搞工业建设没有知识分子行吗？不行呀！我们边区开始办工业，得有专家、技术人员啊，得有象沈鸿、钱志道这样实干的知识分子，得有象徐驰这样的知识分子。1939年，因为没有铁造枪，我还到西安去买了30支步枪。光靠外来怎么办？光靠边区民间的废铜烂铁不行啊。以后我们要自己炼铁，要炼铁还得找沈鸿和徐驰，可是徐驰正被关着呢！我通过组织去找他，让他出来搞个炼铁部，筹建高炉炼铁。我说：“你出来吧，先炼出铁再说。”他出来了，他和沈鸿同志合作，很快建起高炉，把铁炼出来了。当时搞化工的专家、技术员特别缺，后来，一些搞化工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可是不久，他们都成了“抢救”的对象，造成不小的损失。我们光有粮食却不知道怎样做酒精。我们做手榴弹、迫击炮没有炸药，日本飞机投下来的炸弹没有爆炸的，我们可以去卸它的火药，可是日本人不投弹时怎么办？投下来都爆炸了怎么办？可靠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制造炸药，靠专家

们来研究试制！历史经验证明，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后方建设中，我们要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今天，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也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老是搞政治运动，不能光整人，不教育人，不搞生产。这些可以说是个沉痛的教训。当然，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只是坏人利用整风的一个“插曲”，整个整风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党取得了伟大成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如同毛泽东所说：“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现在，我们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制定的路线，用延安精神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好。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07页。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田 方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我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封闭。我经组织介绍，从重庆经洛阳和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于8月间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当年5月创刊的《解放日报》，担任采访通讯科编辑兼记者。报社地址在清凉山，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余光生。当时，采通科不到10人，科长是郁文，后来他调到《晋绥日报》担任领导，便由杨永直继任科长。我在采通科以编辑工作为主，除处理通讯员来稿外，兼作采访工作。那时，县、区、乡通讯员很少。夏天，洪水暴涨，延河水位上升，南关外通讯站的邮递员不能过河投递邮件；冬天，冰雪封山，交通邮递受阻。每到这时，我们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便要出去采访。我们沿着延河的东岸和北岸，往北经王家坪到杨家岭；往东经飞机场到桥儿沟、柳树店一带去采访机关学校有关学习、生产的动态新闻。有时，一个记者一天要写五六条新闻，才能填满“边区版”的篇幅。由于报社无人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会议，又没有基层通讯员，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很难知道，所以很难写出受读者欢迎的好稿子。

当时，在延安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外，还有《边区群众报》。此外，延安以外各专区的地委也大都有关报，如绥德专区的《抗战报》、三边区的《三边报》、陇东专区的《陇东报》、关中专区的《关中专报》等，延属专区因为已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所以没有办报。各专区的报纸除《抗战报》是铅印的以外，其它都是油印或石印的四开小报。由于稿源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从专区报纸上选录一些重要的新闻在《解放日报》上转载。

我从1941年8月起一直在边区从事新闻工作，直到1949年6月由担任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社长任上调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为止，前后历时8年，亲身经历了《解放日报》社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事件。

1942年，我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月1日《解放日报》的宣告改版，也可以说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历史作用的直接体现。

一、《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对报社以往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社论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社论最后特别检讨说：“对于边区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全面的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社论列举的这

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当时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即：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却只占四版的上半版，下半版则是副刊。任何重大新闻报道，一律按上述安排“对号入座”，就连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报告的新闻，也只能在三版左下角一隅。所以，整风学习一开始，读者对《解放日报》就提了很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批评报纸“立论空泛”，“同日常工作与生活联系太少”等等；希望报纸今后能“密切联系边区建设的实际”，“帮助解答每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党中央根据毛主席于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也一再指示《解放日报》，要克服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观主义作风。据此，《解放日报》编辑部多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报纸改版方案，又在《致读者》的社论中，宣告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开始。

改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在《解放日报》改版当天发表的《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致读者》的社论中，在《解放日报》于这年9月发表的《党与党报》的社论，于1944年2月发表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以及其它几篇社论中，先后明确提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在《致读者》这篇社论中，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党报所必须的品质”为：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要密切与群众联系；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这就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为首的办报方针。《解放日报》并根据毛主席于1942年

3月在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指示，通过一篇题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的社论，直接向各部门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了要求：“请你们也记着，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这也是你们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大家来动手动脚，我们的报纸才能办得更好”。

1942年9月，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为此发出了《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解放日报》也配合这一决定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着重从党的领导的角度谈了帮助党报的问题，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编辑、记者的意见和兴趣办报，“那就一定党性不纯，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1945年5月，《解放日报》在《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的社论中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是报纸的作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党的报纸所必须具有的本质。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气象

《解放日报》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即：一版，以解放区消

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国际消息版；四版，综合副刊版。这样，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改版两年后，《解放日报》编委会又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版面的计划：一版，要闻及战况；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内消息和副刊；四版，国际新闻。这两次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它使报纸的报道同客观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特别是第二次版面调整时，正值延安整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于是，《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日报》所发文章也逐步树立起新的文风，对废除党八股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同时，《解放日报》还下大力抓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报纸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报社编委会议上，谈到通讯员工作时提出：今后这项工作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解放日报》随后也发表了《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论述了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有力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陆定一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指出：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广大通讯员相结合，“是《解放日报》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我们就可以办出一张头

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为了培养通讯员和记者，报社除通过所发社论和文章进行思想指导外，还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编了《新闻通讯》专刊，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这就使《解放日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了近10位同志担任记者，部主任相继由缪海稜、丁浩川担任，以后还从地方上调来担任党政领导的裴孟飞当部主任。报社还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我和另两位同志被派到绥德分区。行前，社长博古和我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

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说：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

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别强调地讲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

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象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象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博古接见后，“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了我们响亮的口号。不久，我们满怀激情告别了延安，分赴各个专区去了。

三、报纸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2年9月底，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绥德，直到1946年调回延安。在3年多时间里，我在绥德专区各县农村和通讯员一起，对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劳模人

物、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移民运动、文化教育、保卫边区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同许多通讯员、农民交了朋友，学习了许多活的知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报纸宣传工作很关心，经常了解我们通讯处的工作情况，帮助通讯处解决具体问题，让我们参加地委有关会议；最使我难忘的是1943年4、5月间，我参加了仲勋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调查组的成员还有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认识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之后，我们遵照这一精神，到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中心，根据绥德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调查了移民运动、组织变工队以及锄草、夏收中的农作物和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调查方式灵活多样，有分有合，有时和农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就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是郝家桥群众在一次由习仲勋同志主持的调查座谈会上把他推举出来的。就这样刘玉厚的名字很快从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我除了结合农时报道了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外，还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和《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

关于移民问题的调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以南地区人少地多，而绥德地区则是人多地少。为了合理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

根据陕北群众素有“下南路”的历史习惯，发动组织开展移民运动。历史上陕北一般的雇农、赤贫者常因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得下南路去开荒种地。边区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但广大贫农的生产力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活还相当艰苦。所以，经过边区政府的鼓动和奖励，经过各级干部的具体组织，广大贫农响应政府号召，向南路进军，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荒地。为了在整个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开荒运动，我们就移民对象，他们在生活、生产上可能和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周密的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到贫农中，唯有下贫农劳动终年，解决不了全家吃粮问题。对他们来说下南路移民是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确了移民的主要对象后，我们还明确了需要帮助他们筹划路费，准备口粮和衣被等等问题。就在从郝家桥调查结束回到绥德后的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审阅，得到了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米脂县开展移民工作等新闻报道，和《马丕恩在召唤》等通讯。1944年春，佳县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东方红》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了热烈的迎送晚会，移民们即席编唱了多首陕北民歌。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的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详细介绍了《东方红》的全部歌词，发表在《抗战报》上。虽然歌词内容确实含有陕北农民朴素的感恩思想，

但在当时却也真实地唱出了陕北农民心里的话。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卫延安自卫战争开始时，我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派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随军记者，从此，告别了延安。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

王 焰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怀着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永垂青史的信（即大家所说的“意见书”），结果遭到毛泽东对他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批判。这一事件，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一次最大的波折，使他的后半生遭受极大的不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真理终于战胜谬误。随着这一冤案的彻底平反，随着“意见书”的公开传播，人们愈益感到彭德怀那种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美德之可贵，愈益对彭德怀这个名字产生由衷的敬仰。“意见书”不仅是整个庐山事件的导火索，而且代表着彭德怀对当时“左”倾错误的根本认识。本文所叙述的就是彭德怀的认识发展情况和《意见书》的思想形成过程。

一、考察访问

（一）东北之行

从1956年春开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党中央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这

些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设想我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不是可以搞得快一点，是不是可以采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也是为中央全体成员所拥护的。但是到了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于片面地强调了多快好省的要求，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某些中央领导人的“反冒进”的正确观点。随后，又在党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发表长篇的讲话，从许多方面发挥他的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了提倡勇于追求高速度，他曾讲，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为了实现高速度，他号召干部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做古人和洋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主张“只有不断打破平衡，事业才能前进”等等。他这些讲话的浓厚理论色彩和高度革命热情，加上他当时在全党中的崇高威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他又多次在会议中，错误地批判了某些实事求是的中央领导人为“右倾”、“促退”，以至于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提出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这样一来，就又从另一方面阻塞了绝大多数干部提出不同意见的言路，助长了虚报浮夸的风气。特别是根据这些讲话的精神，在一系列会议上又形成了一些含有不少错误内容的决议，这就从组织上对全党全国产生了重大强制力量。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直接导致了1958年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掀起了一个狂热的“大跃进”运动。

彭德怀“意见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关于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是非功过和经验教训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一开始就清醒的，也是有着一个曲折过程的。

在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从批评“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事后他对“大跃进”这个提法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既然叫“跃进”，就应当代表一种质的飞跃、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表现多快好省或者工农业的产值增长幅度比较大一些，那就只能叫做量变，不能算作质变，也不应当叫作“大跃进”。所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别人都用“大跃进”，而他则用“大发展”。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一文里，曾经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可是，彭德怀在同一天为《解放军报》写的一篇文章里，则写道：“195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头一年”，“我们军队的任务，就是克勤克俭，节约用钱，增加工农业建设投资，加强这个大发展；精简机构，腾出人力，参加工农业生产，支援这个大发展”。

后来，当“大跃进”这个口号被党中央正式通过和在文件中正式采用时，彭德怀就无条件地同中央的提法

保持了一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从这以后，彭德怀不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发表讲话，也都不再使用“大发展”的提法。

不过，他真正在思想上接受“大跃进”这个口号的时候。还是在3月间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听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长篇讲话，听了各省省委书记的汇报以及毛泽东听汇报时的几十次插话以后，才确实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认识，真正从思想上承认了“大跃进”的提法。成都会议后期，他不仅作了一次关于国防建设工作的发言，而且还专门作了一次关于个人认识问题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并且由衷地赞扬“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伟大的收获，不仅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了比较深刻一些的认识，而且对于解决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等矛盾的方法，也有了正确的措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亿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新发展”。这些看法，正是彭德怀一度赞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一个开端。

到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当毛泽东继续发挥他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反对“反冒进”的思想，进一步把

一些不同意生产指标过高的意见说成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时，彭德怀就没有再发表反对意见了。

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规定通过鸣放辩论，由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并设想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和全民大炼钢铁的途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早日摆脱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彭德怀对于所有这些决议和决定都是参加了讨论和表决的，但他也都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这时的思想状况，正如他在“意见书”中所说，“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

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的三个多月里，彭德怀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深入部队、深入农村，围绕着中央的上述重大决策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北戴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到达哈尔滨，开始了对军事工程学院、东北驻军和军事工业的考察。

军事工程学院，是直属解放军总部领导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学校的规模和设备当时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这所学院中的工作人员对“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在全军科学技术人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彭德怀到了这里，几乎没有休息，就深入到每一个

教学系，甚至每一个专业教学组去听取教授们的直接汇报。在这里人们向他汇报的，完全是从领导干部到广大教职学员大干苦干的感人事迹，各个专业雨后春笋般的创造发明。

在某地军械靶场，人们向他汇报，全场人员正在加紧准备大搞钢铁生产，根据现有条件预计，每年可以生产3万到5万吨钢；靶场党委还决定，利用靶场的100多台精密机床设备，每年生产300到500台车床。

在视察途中，彭德怀还看到了波澜壮阔的群众炼钢场面。在东北的辽阔原野上，群众炼钢的小土高炉白天烟雾缭绕，夜间火光冲天。村镇街头布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标语，张贴着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

群众的情绪，特别是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的号召的情绪，对于一个党的领导人是具有特殊感染力量的。即使象彭德怀这样一向不肯盲从的人，处在当时那种群众运动炽热情绪的氛围中，也没有避免为那些虚浮夸张的汇报所迷惑。他在东北地区许多场合的讲话，都充满着动员群众进一步大鼓干劲的情绪。甚至在他写给党中央和军委的视察报告里，也同样反映着这种过份乐观的情绪。

在关于视察军事工程学院等单位工作给军委和中央的报告中，他以非常兴奋的语气写道：“两三个月来，学院在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号召下，基本上树立了‘以我为主’和大胆创造的思想”。“现在已经设计出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有些是达到了或者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报告中还举例说：“学院办了一

个规模较大的实习工厂，组织全院工作人员去轮流参加劳动。这个工厂已经试制成功‘松花江八号’拖拉机（28匹马力，可以烧煤，也可以烧谷糠，每台售价6000元），质量很好，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如材料充足，今年内可以完成700台的生产任务，明年可以生产4500台”。显然，这些带有很大夸张成分的汇报，彭德怀也信以为真了。

彭德怀对于自己在重大问题上，有时在开头一段时间里头脑不够清醒的情况，曾经有过坦率的自我剖析。他在一本笔记中曾写道：自己“由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具体科学知识不够，往往对于错误的东西不能及早察觉，甚至有时还要在跟着错误路线走上一段之后，才能在实践的教训中回过回头来”。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彭德怀这种自觉的严肃对待自己缺点的精神，也是他忠于党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庐山会议上，有人批判彭德怀，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跑遍十几个省，到处收集反对大跃进的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事实证明，这毫无事实根据。相反的，彭德怀在视察东北地区期间，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他不仅没有收集什么反对“大跃进”的材料，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反对“大跃进”的言行。

（二）萌 发 疑 虑

彭德怀从东北回到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开始赴内蒙和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他首先乘飞机经过呼和浩特到青海，处理青海地区藏族少数反动头人和暗藏的反

革命分子相勾结，企图阻止民主改革煽动群众叛乱的问题，随后便转赴甘肃、陕西去考察地方上的生产情况和军队中的思想状况。

在甘肃敦煌，他第一次了解到农村人民公社初期的一些情形。县委书记刘孟晋告诉他，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多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书记陪同下，参观了郊外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他向县委书记说：“你看这些棉花多可惜，应当派人拣回来。丰产了，也要丰收才行吗！”到了村里，正好看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早饭，他走近锅台，用勺子舀起锅里的面糊糊，发现里边掺有一些土豆，顺便询问炊事员：“社员每顿饭都吃这个吗，小孩子也吃一样的吗？这么多人一块吃饭究竟行不行？”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他这个幼年饱尝饥饿之苦的人，表示非常怜惜，说：“应当把这些收拾起来，有些大叶子晾干，以后还可以吃吆！”总之，杨家桥公社

化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可是，到了兰州，省委的领导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燕滩公社。这个公社的生活条件显然比较好，在组织和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又使他消除了不少疑虑。特别是在参观以后省委负责干部的谈话，给他增添了欢乐的情绪。他们告诉他，全省当年的粮食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1500斤。还有洮河引水工程正在铺开，竣工之后，大片的黄土高原可以不再靠天吃饭。这些美好的前景，都是十年以前他在这里的时候所不敢想象的。在谈话中，彭德怀特地向大家叙述了一段往事：解放兰州之前，他在城市外围察看地形，走进一户人家，只见全家5口人，不分男女老少赤身蜷缩在一个炕上。据说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那种凄惨情景，现在不仅已经永远成为过去，而且竟然变成如此富足的生活，他怎能不百感交集！

随后，彭德怀又转赴西安视察了军队后方机关，赴延安考察了群众生活。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给予重视。

彭德怀考察西北地区这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普遍建立，许多城市也纷纷要求急起直追；全民大办钢铁，已有几千万人上阵；不少省份已经提出吃饭不要钱，穿衣发代金；陈伯达这个所谓“理论家”则主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全民实行供给制，甚至要求废除商品、货币。有的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宣扬大闹共产主义。在这种举国沸腾的情况下，彭德怀虽然感到了一些值得疑虑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他对全国的形势的看法，仍然和许多人

一样是比较乐观的。

不过，彭德怀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办事的人，即使是在当时群众强烈要求和舆论威逼的气氛中，他还是冷静地处理了军队在“大跃进”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当时下边部队给他写信，提出军队也应当改为公社，许多干部对此认识不清。对此，彭德怀及时向大家指出，“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不能把军队本身的组织形式改变为公社的组织形式”。当时在干部中对于军队是否改行供给制，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还有几名团政治委员写信要求军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彭德怀也明确地答复说：“要军队带头改行供给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现时的分配原则，还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后来译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此外，他还针对军队里许多单位无条件地大炼钢铁的做法，明确提出，军队单位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脱离本身业务太远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如军医学校办炼钢厂，就不如办制药厂或医疗器械厂。彭德怀这些意见在军队中的及时传达，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工作混乱和思想混乱。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的明显变化，是到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时才开始的，首先是在当年粮食产量问题上。这次会议继11月毛泽东召开的郑州会议之后，进一步批评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错误，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危害，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反映了近两个月来党中央在纠正公社

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彭德怀对于这些都是满意的。但是他对于会议就当年粮食实际产量所作的估计，有不同看法。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时，许多人赞成公布10000亿斤，有的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了。彭德怀则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样多”。因为这时他已开始意识到，北戴河会议以后接连提出的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工业、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交通运输等不切实际的任务，都是和过高估计粮食产量，认为粮食已不成问题的看法有密切联系的。当时就有人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他则解释道：“公布的数字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会议考虑了他的意见，决定公布当年的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彭德怀当时表示同意。但心里对此数仍然有所怀疑。为此，他于会后便回到家乡深入调查弄清究竟。

彭德怀从武昌先到长沙，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回到湘潭县卫国公社，即彭德怀家乡彭家围子所在的公社。周小舟也是湘潭县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跟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由于毛泽东叫他“小周”而来的。这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

从长沙到卫国公社的路上，周小舟和彭德怀同车，沿途边看边谈。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把次年的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被拔过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

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拔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一些。周还告诉彭德怀，湖南全省共办起50000多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农村的公共食堂，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很多人力、物力的浪费。因此，周认为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周的这些意见，同彭德怀在甘肃看到的情况颇相吻合，使彭德怀更加感到这次回乡深入考察十分必要。

为了更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面对家里来的满屋子的乡亲，他向大家宣讲了武昌会议的精神，要求大家讲真话。在公社和大队干部的调查会上，他详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生产情绪。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附近吴公塘生产队亩产千斤时，彭德怀立即同干部们徒步来到数里以外的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子扯起禾茬，数着一兜禾茬有多少根稻秆，计算着每兜稻茬有多少稻穗，估计着每亩稻谷的产量。他向干部们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每亩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他这种追根刨底的行动和推心置腹的话语，鼓起了干部们讲真话的勇气。

他在旧居还召开过一次调查会，请来的全部是普通社员，这使他了解到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和不满情绪，以及不少对干部领导作风和管理方式的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他对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认识。

他到乌石学校，看了教室和宿舍，尝了学生吃的饭

食，盐水煮青菜，没有一点油味。他回头向周小舟说，学生口粮太少，这样下去会把孩子们身体搞坏的。

他到赵家弄子大队参观了幼儿园，感到设备过份简陋，缺乏各种生活必须的用品；遂捐赠了200元。

他到许安塘大队敬老院看望了老年人，在同少年时代的伙伴们亲切交谈中，得知他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16两为1斤），数九寒天还睡着光光的篾席，被子也破烂不堪，他忍不住对干部们说了一句：“这叫什么幸福院”！也捐赠了200元，让为老人们购置一点铺的东西。

听公社干部讲炼铁厂炼出了640多吨铁，他便又去看了公社的炼铁厂（小土高炉）和公共食堂，参观后，他向干部们讲，这种小土炉，是由于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和武器用铁，才这样搞的。现在还这样搞，炼一吨铁需要花十几倍、几十倍的成本，看来不是好办法。他还扳着手指给大家算了一笔帐，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了社、队全部的壮劳力，丢开了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的许多房子，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还打碎了社员的铁锅等用具。实在是很不合算。

在家乡的两天里，他亲眼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他对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另外，使他感触更深的，是乡亲们向他反映的农村干部对群众的态度问题：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以来，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就越来越坏，打人骂人，训斥体罚，强迫命令，不讲民主等现

象，甚为普遍。为此，当他最后离开彭家围子时，还殷切地向送行的干部们叮嘱：今后再也不准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干部和群众在20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都清晰地记得他的“八不准”。

农村干部领导作风这个问题，直到他回到北京以后，还使他放心不下。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向乌石大队的干部作深情的寄语。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磁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便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败”。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怎能不使受信干部刻骨铭心。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又到毛泽东故乡——韶山公社参观一天，所得印象，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彭德怀又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可是在这里他没有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仍然集中精力考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其中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即把1957年粮食高产的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产量。他后来忆及此事，不禁感叹：“如此造假，真令人可怕！”在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他终生难忘：有一位红军时期残废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①”

彭德怀后来在一本笔记中写道：“这是当时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啊！”

在株州，彭德怀恰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自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说，“可以给中央发个电报”。当天彭德怀即发一电，向中央说明不能征1200亿斤，最多只应征购900亿斤。

^① 鼓咙胡：语出《后汉书》其书按曰：“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和咽语。”本文用典意为，这位老战士请彭总为人民私下里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小声讲讲话。

彭德怀这次考察，是经过南昌和合肥回到北京的。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到东北至这次回京，为时3个半月，他共到过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10多个省考察。

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之所以无法自抑地要写那封信给毛泽东，那封信之所以能够如此经得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从他这3个半月的考察活动中可以看出，绝不是偶然的。

（三）上山之前

到1959年上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断发展，运动中的许多弊病愈益明显，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形势愈益紧张，因而彭德怀内心的疑虑逐渐变成了忧虑。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全国工农业建设脱离正常轨道的情况虽然在1958年冬即已有所察觉，并且在那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对运动中的许多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出现在工农业生产上和城乡人民生活中的紧张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这就愈益加重了彭德怀忧虑的心情。

彭德怀在这半年里，参加了党中央第二次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还率领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了东欧各国。这些政治活动，对于他进一步看清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在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由于忙于处理

西藏反动集团叛乱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作系统的发言，但是所有的小组会议讨论，他都是参加了的，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同别人进行过交谈，还同有些同志进行过争论。在上海开会期间，他和陈云同住在瑞金二路5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修改和调整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称赞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并说有时候真理是在一个人手里，会后即行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研究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的问题。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都是很敬佩的。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上海会议，还有一件事引起彭德怀的极大重视。这就是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这时，他脑子里是否萌发着“诤谏”的念头，别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他从海瑞身上发现某种美德值得共产党人学习，是可以肯定的。

追寻彭德怀“写信”的来龙去脉，还应特别提到毛

泽东在4月29日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信中着重谈到讲真话的问题。其中写道：“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作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作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边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这个通信，彭德怀在国外访问时就听别人转述过大意，返京之后，又特地找来细读。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可见这篇通信，对于他这个一贯以讲假话为可耻的人，曾经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4月下旬到6月中旬，彭德怀在东欧各国访问期间，同各国领导人谈得最多的事情，是1958年秋天我军炮击金门，和1959年春天西藏反动集团制造叛乱。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情况，则很少提及。只有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萨拉扬、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在非正式会见的场合询问过中国的人民公社，彭德怀仅仅向他们做了简单的介绍，就把谈话转移到别的问题上了。再有就是军事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看望中国留学生时，他才比较详细地谈过一次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某些情形。除此之外，在国外的所有谈话“都撇开了”，根本不谈国内经济情况。可以看出，他在对外宣传上，当时已经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但是，在各国参观或会谈当中，依然不时地联想到国内

的问题。特别是在访问匈牙利的时候，直接听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情形，更使他感触颇深。当军事代表团一离开匈牙利到达罗马尼亚，彭德怀即从布加勒斯特专门打电话给黄克诚，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显然，这是和他访问匈牙利的感触有着直接联系的。彭德怀的这种心情，回国之后也不止一次地有所表露。他在一次中央常委会和在赴庐山的火车上，都曾联系着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说过，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到40斤肉，还出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要请苏联红军去镇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人好，农民好，党的威信高，不然出了匈牙利事件，红军可没有那样多。出国访问，更增加了他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忧虑。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不顾在国外连续50天参观访问以后的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他向黄克诚讲了访问八国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情况和军队思想状况。当时有些地区缺粮和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尤为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之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他当即同黄克诚商议了紧急办法，决定尽量抽调军队的运输工具，帮助政府向灾区运粮，救济饥民。

彭德怀上班没有几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到庐山开会。临行前的几天和赴庐山途中，他集中阅读了上海会议以后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以便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群众能有更多的了解。彭德怀

从北京赴庐山，是和贺龙、康生、张闻天、习仲勋、李富春、贾拓夫等同乘一组专列火车，经过武汉，转乘江轮到九江，然后上山。在火车上，他连续两餐吃饭极少，回到自己车厢，面对窗外闷坐不语，使得保健工作人员甚为不安，为了弄清原由，他们即在彭德怀吃饭时守在旁边，结果看到他吃上几口又放下了碗筷，离开了餐桌。

“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保健人员忙问。

彭德怀用手向窗外指了指，“你向外边看看，这叫
人怎么能吃得下去！”

原来窗外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他们都是被治安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

彭德怀就是在这样的景象中、怀着这样的心情上山赴会的。

二、庐山诗谏

（一）庐山呐喊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缓和，但仍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并且得到了部分贯彻，获得了某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相当满意。

但是，还应看到，由于当时所有的调整工作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是很不彻底的。而且就是这些并不彻底的纠左措施，在基层的贯彻执行中也不是很落实的。结果是虽然修改了一些脱离现实条件的高指标，但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虽然批评和反对了平均主义，但在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类平均主义的东西；许多“左”的做法，仍在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便产生了彭德怀和一部人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的正确主张。

7月2日晨，彭德怀到达庐山，听了毛泽东谈的会议内容，忧虑的心情有所减轻，在上山的头几天，他还到含鄱口看过日出。但是对于这里名闻遐迩的白鹿洞、五老峰、三叠泉等匡庐胜境，一概无心领略。“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奈天下有忧何！”在人民遭受困苦的时刻，他实在乐不起来。在山上，他除了去毛泽东住处参加会议以外，就是整天翻阅中央和各部、委的文件，以及参加小组会议的讨论。

在庐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正式开始。毛泽东到达庐山较早，在6月29日已向先期上山的部分同志提出了13个问题，让大家讨论。会议正式开始后，他又把问题增加为19个。这19个问题是：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

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①；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讲话和他提出的19个问题，其目的就是继续纠左，但却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在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供给制的原则下，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改正一些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便求得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尽管如此，彭德怀听了以后，很受鼓舞，满怀希望，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每次小组会议的讨论。

全部到会人员划分为6个小组（按照大区划分），中央领导人分别参加到各组，彭德怀参加西北组。开会的方式是围绕着19个问题，分组进行自由轻松的漫谈，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7月3日除西南组因人未到齐没有开会以外，其余五个小组都已开会。

在小组会上，彭德怀态度积极，频频发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里，他作了7次发言，发言中提到的主要问题有：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

^① 即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它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955年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在广大农村依据这一政策，开始了对粮食的“三定”工作。

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3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在这几天里，彭德怀还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上，作了两次插话。一次是在大家谈到全国粮食情况时，他为使大家高度重视粮食紧张的问题，便说，东欧各兄弟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可是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另一次插话是当大家说全民炼土铁，国家需要补贴20余亿元，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共计50余亿元时。彭德怀说，这个数字很大，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购买消费物资，把它堆积起来，恐怕有象庐山这样高。毛泽东则说，

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可以看出，毛泽东听彭德怀的插话是不舒服的。

彭德怀的发言和插话，态度严肃，语气沉重，无非是想提醒大家重视当时的问题，促使大家认真研究，纠正错误，定出措施，扭转局势，以减少给人民带来的疾苦。遗憾的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几天后，会议按照既定日程，由工作人员集中整理各小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写出了《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草案）》，随即发至各小组研究修改，以便最后定稿，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贯彻执行。这个文件共写了1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形势和任务”，其余十一个问题都是写的具体工作，如“读书”、“宣传”等。在第一个问题中，讲述存在的问题时，仅仅是讲到“比例失调”、“共产风”和“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现象，既很少讲到上述问题引起的严重后果，更没有深刻检讨产生上述问题的思想原因。因而，各小组在讨论这个“议定记录”时，有一部分人感到不很满意，认为远未解决当时的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组长会议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着的紧张局势，很少提及。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上，他的设想

也仍然是过高的。

“议定记录”和毛泽东讲话所反映的这些看法，同彭德怀希望庐山会议所解决的问题，显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在这几天里，庐山会议的整个气氛，也使彭德怀很有感触。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不很浓厚。有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正在彭德怀为这种会议情绪所苦恼的时候，又听说会议时间安排到15日为止，即将结束，他的焦虑心情就愈益加重。

7月12日上午，彭德怀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想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毛泽东谈谈。但是不巧，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刚刚睡觉”，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当晚，他从周恩来处开会回到宿舍，同随行参谋闲谈说，这次会议开了10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发言。他在西北组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这便是他第一次流露要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

（二）直接上书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一份谈话提纲，向随从

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要参谋笔录以后整理成信稿。然后经过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加以誊抄，在14日下午由参谋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在这封信受到批判以后，彭德怀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一直说是自己在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任何时候都不讲参谋拟稿这件事）。信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彭德怀列举了一些工农业生产增长的数字，肯定了北戴河会议以来的成绩，他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大办钢铁，他认为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虽然是付了一笔学费（补贴20余亿元），但也是“有失有得”的。信的第二部分是讲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联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增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

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他提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要彻底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在信的结尾，他特别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彭德怀这封信，是他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亲临10多个省进行考察的结果，也包含着访问

8国当中的某些感受。此外，最直接的则是上山以后听了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形成的深重忧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那就是11日晚周小舟到他住处的一次谈话。

周小舟在庐山会议前期，曾经两次去看望彭德怀。第一次谈了湖南近期的经济情况；第二次谈到庐山开会的问题。周表示庐山会议注意总结经验不够，有压力。他颇有感触地说，有人在中南组发言提到“以钢为纲”的口号，是否今后还应这样提？话没说完，别人就把他的话插断了；还有人在西南组讲到一个公社有两本帐，一本真，一本假。讲到这些情形，许多人不愿听，就说不下去了；还有一个人在中南组讲他在湖南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的情况，先讲到成绩，还没有什么，后来讲到缺点，组里有些同志就不很同意了，使他很难再讲下去。彭德怀也谈了自己对会议的感觉，并说自己的意见已在小组会上零星讲了一些，但有些则不便讲，就没有讲，想写一封信给毛主席参考。周说，可以去向毛主席直接谈谈，并且告诉彭，他同周惠、李锐3个人昨天曾经去毛主席那里谈过一次，谈得很好，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的话，毛主席都听得进去。毛主席还讲了蒋干盗书的故事，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意思就是应当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彭德怀则说，“我同别人谈话，总是谈不完全，言词生硬，容易顶撞人。主席虽然是很好谈话的，但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如果对问题不作很好地调查研究，就去找主席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也容易引起他的误会。”

周说，那你就把西北小组发言整理补充一下送给主席，不就行了吗！彭德怀开玩笑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这次谈话，后来便成了周小舟被列入“反党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这件事，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应成为什么问题。因为他的信条是，党内同志之间，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何况两个人又都是中央委员！

上述这封信的形成过程，充分说明，彭德怀在庐山的净谏，体现了作为中央的一个领导成员、作为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高度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他这封信的内容极为中肯，态度诚实忠恳，实事求是，在方式上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同别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他说，目前少奇、恩来同志都不便讲话（陈云、邓小平都未参加这次会议），只有他自己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无关大局，顶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当然，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实际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弄到后来那样严重的地步。他把信送给毛泽东以后，对于这封信将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主观了解，是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谈；二是在常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参考。可惜的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会招致对他进行一场那样严厉的批判。

（三）各抒己见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在案头放了两天，郑重考

虑了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于7月16日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同时告诉中央办公厅，将会议的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

17日，彭德怀的信发到各组后，小组的讨论主题在开始两三天还是一边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一边评论彭德怀写的信。但后来两三天便逐渐过渡到完全对信的评论了。

彭德怀的信，象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使会议气氛活跃起来，许多人讲出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把小组的讨论引向了深入，把人们模棱的观点引向了明朗。把会议一开始就蕴含着的两种意见分歧，引向了公开的争论。

关于当时大家对这封信的态度，彭德怀曾有一段简要的追记，他写道，各小组从17日到22日共讨论了6天。在讨论中，多数同志是基本同意的，但在同意的人们中，有同志说个别文字上、词句上值得斟酌；有的说信的第一部分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的，但第二部分对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讲得严重了一些。对这封信完全同意的或者基本反对的，两者都只有个别人。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发言，这些同志的意见不得而知。

赞同这封信的同志中，有几个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秀才”，认为信中的观点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中有人赞扬说，“只有彭总才有胆量写这样的意见”。他们在小组里听到有人说信里“政

治性”的提法不妥时，还为彭德怀辩护说，“政治性一语关系不大，因为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曾经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不过，他们之中也有人担心，“这封信可能会出乱子”。由于他们都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比较了解全面情况，又在起草文件中对这些情况进行过分析和研究，因之他们的看法是相当说明问题的。

在第四组有一位赞同者的发言，还对彭德怀的意见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说，“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许多工作。缺点的性质；从理论上讲，只要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左’即右。‘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就是‘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都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这封信当时甚至使有的人深受感动，联系自己思想进行了检讨。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但过去的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做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

果，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我深表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在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要算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三个人了。他们都因此而在后来被列入“反党集团”。

黄克诚17日晨才到庐山，19日在小组会上即有一个发言。他首先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是中间一句，两头是一致的。他说，会议“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同意，再补充以下几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他认为，作风上的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缺点造成的影响是：1. 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2. 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3. 党在国际上的威信受到点影响。

周小舟19日在第二组发言，说明了自己对“大跃进”以来国内形势的看法。他赞成把“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认为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说，基层干部的浮夸作风，强迫命令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表示：“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张闻天21日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分作11个部分，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

验和教训的看法。最后讲到对信的态度，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他对信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张闻天在小组会上讲完以后，于晚8点钟左右派秘书把稿子送给彭看（因他们不在同一个小组）。由于讲稿字迹模糊，改得较乱，彭德怀即要参谋念了一遍，听后，他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只是说了一句“张闻天讲的不少呀！”

反对这封信的意见，虽然很少，但态度也是很鲜明的。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精神，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彭总在信里也讲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但从他的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在这几天里，有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也开始提出更加吓人的疑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指谁的？还有“得心应手”这个话，也是有所指的。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这些议论，不仅是对信的内容有意见，而且已经怀疑到写信的动机。

彭德怀在讨论过程中，心情表现很复杂。他在一篇笔记里写道：“我开始一见到自己的信印了出来，并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就不高

兴”。但是，既然已由毛泽东批给“各同志参考”，有可能引起会议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也有好处。就在小组会上表示，请大家对他的信多提意见。同时对于信的某些内容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他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一点也不怀疑，大家也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来源来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缺点的性质，他说，去年底、今年初的一段时间，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农民各阶层之间、富队和穷队之间，都引起了相当的紧张，不紧张的是少数。凡是属于社会性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带政治性的。如果不是毛主席很快地、坚决地纠正了这些缺点，再延长两三个月，总路线就可能被破坏，局面也许会弄到很严重的地步。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在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这种“左”的倾向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另外还谈到，有些口号的提法是值得考虑的，如全民办这，全民办那，以及这也要第一书记挂帅，那也要第一书记挂帅等等。

在7月21日的小组会上，他再度发言进一步解释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成绩之后，就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

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

他建议，在今后三年内（1960—1962年），国家应逐年平均拿出200万吨钢和铁来支援农业，并增加化肥、农药的生产，以便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解决目前粮食紧张和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增强广大农民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对工农业的要求，不搞个比例，农业很容易被挤掉。可是最好不要提以农业为主的口号，以免发生误会。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

由于各组在讨论中，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发言，大多数人都提出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因之他谈到了写信的直接起因说，信是他听说15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成的，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能够准确地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几份存入档案。

在这几天里，毛泽东没有公开表示态度，但对各组的讨论情况十分关切。他分别召见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大区的领导人谈话，听取各方面反映，并指出他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引导会议向着既定的方向发展。

从17日到22日的小组讨论，是庐山会议各抒己见的阶段，也是会议后期展开思想斗争的准备阶段。

三、风 云 突 变

（一）山 雨 欲 来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了。这篇讲话，使会议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明，

他的意见，是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以后产生的感觉。他说，他感到有那么两种倾向：第一，是触不得，听不得反对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第二，是另一部分同志看问题的方向有点问题，要劝这些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他讲到人民公社运动时说，河南遂平县嵒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他，去年七、八、九3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3个月就是27万人，到他们那里。还听说徐水县和七里营，也是这样多人。除了西藏，都到那里去取经。对那种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不能完全这么说。他们无非是多搞一点，搞快一点，无非是多快好省。他还说，全国有70万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办10件事，9件是好的，1件是坏的，就是70万件坏事。把坏的统统登在报上，假定这样，国家就要灭亡了，而且应该灭亡，我就赞成灭亡。那我就跑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个政府。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当他讲到大炼钢铁时说，9000万人上阵，去年小土群，今年小洋群，补贴40亿。有人认为是“有失有得”，“得”放在后，“失”放在前，这是斟酌了的。我是不准备给戴帽子的，如果要戴的话，我看要戴资产阶级动摇性。他接着说，这些同志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因为右派欢迎这种论调，不欢迎才怪！不过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看有些问题这一次不能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他的观点。那么就拖吧，无非是两个可能，有可能放弃，有可能不放弃。两种都可

以，何必怕呢！毛泽东这些沉重的语言，表现了他对彭德怀意见的极大反感。

毛泽东这次讲话，虽然没有公开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彭德怀的信，没有强制彭德怀必须承认错误，但是它使所有到会人员都面临严重的抉择，是实事求是进行争辩，还是照顾团结进行妥协。在当时，由于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极少数人的推波助澜，结果，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各组对于彭德怀信的评价，便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集中批判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是所谓“右倾”。

彭德怀听完这个讲话，真如霹雳贯顶。正如他在笔记中写的那样：“我的心情当然更加沉重”。

散会时，彭德怀先走出会场，由于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到总理住处开会，彭德怀回头在人群中正好看到毛泽东同几位同志边走边谈。他同毛泽东打了一声招呼后说，“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误以为是向他提出质问，于是答道，“你没讲不要我印发吧！”听了这句回答，彭德怀脑子里顿时涌出无限感慨。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就餐。

两个人面对面坐下，谁也没有说话。黄克诚只吃了一口饭，一言不发，即离席而去，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彭德怀见此情景，更吃不下，也抛下筷子回到自己住室。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纸烟，吸上两口，很快把它弄熄掷入烟灰缸。接着又点燃一支，又弄熄、扔掉。显得无比烦躁。把桌上堆积的文件翻了一下，怎么也看不进去，整个脑子已被毛泽东的讲话所占据，他反复思考，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本来别人是根本无法知道的。但是他当时的笔记，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人们看出一些他的内心活动。

从这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内容还是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接着他还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他写道：“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往下他又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词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就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从以上所有这些想法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是茫然不解，是想不通的、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又进一步考虑到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后果。彭德怀在另一篇笔记中写道：“其实，目前‘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是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等，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这种作风蒙蔽着真象，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据我看，这次讲话批评得不

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他想到对全党的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接着，在想到这次讲话对他个人的影响时，他写道：这次批评“对我来说有鞭策作用。象我这个人，11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能明哲保身的，挨打也不应该屈服。在现在的情况下，有意识的让步也是需要的”。

他为什么下决心让步呢？他写道：“主席讲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笔者注——原始记录是‘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这里明白说出，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最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会转过来的。过去的事实证明过；这次我太急了”。

他和毛泽东相识31年，其中有些时候，他们更是朝夕相处，行军作战时，比肩并辔，驻军宿营时，同室同餐。他向毛泽东无话不谈，有意见就提，不同意就争，从来都是以肝胆相照的。他们一起战胜过强敌，共同享受过胜利的欢乐。30余年的战友之情，全国6亿人民利害之所系，使他对毛泽东这次讲话深表惋惜。他曾写道：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衔

接和转变是正确的，一整套建党建军原则是正确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总之，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论者。但是，你这次犯了一个比较严重一些的个别错误。照你自己的话说，就是热得多了一点。促使这热得多了一点的原因，是‘一穷二白’和全党缺乏经验所致。既是‘一穷二白’，就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是需要有时间才能积累起来的。对于这一点认识不足，就使你对于盲目乐观主义者的话容易听进去，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同志的话听不进去。你这次站在‘左’倾的方面，反对所谓右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反对的主次颠倒。结果不是保持波浪式的跃进，而是将要促使大马鞍形的出现。这种形势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来，因为原材料和生活物资都还有库存。但这些库存用到最后一点时，这种大马鞍形势必暴露，粮食不足、市场紧张的情形，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倾，等待事实证明”。彭德怀看到这种可怕的局面将会出现，可是他的处境又使他无能为力，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

当天晚饭后，由于室内闷热，彭德怀走到院外林荫大道散步乘凉。正漫步沉思，忽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哎，老彭，在这儿做什么？”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而来。

“在这儿散步。”彭德怀答。

“毛主席今天上午对你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

度，你是怎么考虑的，考虑成熟了吗？”

“一下子也说不清楚，那就只好是，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老彭，你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对党有利。写成稿子，再到大会去讲。”

“现在我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必参加小组会，把你的意见讲给秘书，要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修改。可以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周密些。”

“本来没有准备在会议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只有一个军事参谋来了，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你就赶快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叫秘书立即来庐山，可不要再迟延了。”

“好吧！”彭德怀理解聂荣臻的好意，由衷地感激他。

（二）初 次 检 讨

毛泽东讲完话，各组展开讨论，大家的发言开始集中对彭德怀的信提出批评，会议转入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阶段，也称为庐山会议“后期”。但在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的态度还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批评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脱离信的本身和写信的动机；只有个别人提出这是一场“路线之争”。直到7月26日下午彭德怀进行第一次正面检讨前后，大家的批评基本上还是按照对待党内思想问题进行的，尚没有人公开提高到党内对抗性矛盾的程度。

这几天有些人的发言，是带有“转弯”意思的。例如说：

“对于彭总的信，开始只觉得观点有些不对头，说过啦，讲歪啦。现在看清楚了，彭总的信是有代表性的”。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只看出一些错误提法。经大家讨论，特别是主席报告后，越看问题越多”。

“对彭总意见书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初读，觉得过火，但大胆指责缺点错误，精神是好的。听主席讲话以后，才明确认识这个意见书是方向问题”。

这时有些人发言已经把问题提得相当严重。他们说：

“彭总的信，属于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彭和张（闻天）都是一味批评责难，有意夸大缺点错误的程度和性质”。

“彭总不只一次地说，主席也热过，不过他比我们都冷得早。就是说主席也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群众自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上而下依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人为地搞起来的”。

但是从更多人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出，对于彭德怀这样一个素以耿直刚正，忠贞不贰著称的人，要人们一下子就说他反党、反毛泽东，或者是把他善意写信说成是别有用心，这个弯子是很不好转的。在当时的讨论中，大部分人不论对彭德怀的批评讲得怎样严重，而对他写信

的良好动机基本上还是没有否定的。

23日下午有人发言说：“上次发言，我已说过，彭总的信不是词句的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不同意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当然彭总的信，对于此次会议有贡献，推动了讨论。提出意见还是为了搞好工作的”。

有的发言说：“有些同志忧心忡忡，但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的某些错误思想应该检讨。但他们还是好意，是为了积极解决问题”。

直到26日，甚至还有人发言说：“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是谁都无法否定的。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成绩”。

几天来，彭德怀反复考虑着对毛泽东的讲话应该作什么表示的问题。25日上午，他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说：“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也伤过不少人，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总是要讲。去年经济工作出了不少问题，我讲一下是有好处的。挨点批评，我是不怕的。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有些问题大家一时还体会不到，批评斗争一下不要紧，就是开除党籍也不可怕”。并说，“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总觉得给主席写得还是很诚

愿的，是向主席请教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者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甚至批评一顿也可以”。

到了下午，他又叫来了随行参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稿，并把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抄清后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说那封信的词句确实也有错，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需要作个检讨，还是在小组里讲讲好。并且向参谋解释自己检讨的基本态度说，

“信里有些问题写的是不够妥当，主席又讲得那样厉害，我要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不好转。可是信里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我还要坚持”。

彭德怀在26日下午的小组会上，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作了第一次的检讨。他说：

“由于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表现在信中对于如何肯定大跃进中的成绩和正确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

讲到写信的动机，他申明自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的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面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

“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为什么就贸然给主席写了这封信？当时只感到这次庐山会议截至13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还很不

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写了一个供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

他检讨到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对彭德怀这个检讨，有些好心人是同情和赞许的，特别是温厚和善的朱德同志，认为倔强的彭德怀能够这样检查自己，已属不易，写信的问题应该到此结束了。他满怀战友之情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那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

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朱德这番话显然是把会议形势估计的过于乐观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他的个人的良好愿望。

彭德怀作过检讨，回到住室，情绪极其沮丧。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从他的笔记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难过，主要不是担心什么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个检讨会助长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看法，因而产生更加严重的恶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诤谏一次。为的是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形势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缺点已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是严重的，对于群众的命令主义已成风气。切不可由于他的检讨而放松对这类错误的纠正！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再找毛泽东去谈，因为他想到这里时，“马上回想到，这些意见不是已经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吗！现在要开八中全会，把这封信当作反党纲领，事先也没有找我谈一下。这时再去找主席谈这些，是毫无益处的”。于是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像以后那样发展，他认为：“会议快要结束了”，而根本没有想到，

对他的批判还仅仅是一个开头。从23日毛泽东讲话那天起，他再没有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使他同外界无形中隔绝起来。他不知道，就在这几天里，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正在陆续来到庐山。“彭德怀的信里有刺”，“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等说法，也都传开来。庐山上下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的气氛。

四、委曲求全

（一）问题升级

7月26日，毛泽东就另一位同志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写了一篇评论，有2000多字。据他说，这些意见，大体上已在7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没有讲完，这次是那次讲话的补充。

写这封信的人，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庐山会议前不久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在党内的地位虽然与彭德怀相差甚远，但是对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彭德怀少。因之这封信引起毛泽东的相当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

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

但是，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他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这篇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彭德怀的调子又有所升高。有的发言已经提出，“不管彭德怀同志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有的则进一步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仅是个立场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其锋芒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出的一个挑战书，是想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有的甚至还说，“对党的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以彭总为主帅，以张闻天同志为副帅，他们两个发言都是带有反党

纲领性的”。这个时候，关于彭德怀在党内历次重大斗争中都犯有错误的说法，也在发言中出现了。在这样偏激情绪的煽动下，有人喊出了：总路线必须坚决保卫，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必须坚决维护，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坚决保护，右倾言行必须坚决反击。这样一来，庐山这场错误的批判，势必非要扩大进行下去不可了。

7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准备举行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意味着对彭德怀的批判不仅要扩大范围，而且可能要在中央全会上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

这时会内的紧张气氛，也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立即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并且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小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自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什么要去自绝于人民呢？

30日这天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据彭德怀回忆说，“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

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且会更加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召开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中央常委找发表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集体谈话。

30日一早，毛泽东等也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去，谈了一个上午。毛泽东先谈了过去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然后又批评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什么“父子关系”、“湖南小集团”、“军事俱乐部”等。黄克诚作了辩驳。他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你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我和彭德怀完全是革命同志关系，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黄克诚一生由于对重大问题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只一次地受到错误批判，甚至撤职降级。但是他不怕挨斗，不怕处分，只要有说话的机会，他还是要把自己的意见都讲出来。

第二天，毛泽东的秘书电话通知彭德怀到主席处开会。他走进会场时，已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

彭真、贺龙等就座，另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批评彭德怀在历史上犯有几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并说长征中会理会议时也有错误。毛泽东还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对此，彭德怀说，“我是是非各半的人”，意思是和毛泽东的关系是对半开。彭德怀还说，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因之对有些问题不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毛泽东则仍然坚持三七开的说法。两人争执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说，你这次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接着是林彪发言。林是在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上庐山的，在他的发言中，罗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一些所谓错误，附和了毛泽东对于彭写信动机的指责。为着同彭德怀划清界线，他特别解释说：会理会议时，他写信要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同志离开军队指挥岗位，由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不是和彭德怀一起反对中央领导。这次常委会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5时。会后，彭德怀用一种鄙视的口吻说，这次会议上，林彪为了洗清他自己，害怕和我沾边，总算说一点实话，把20多年来毛主席的误会给澄清了。

8月1日上午，中央常委继续开会，出席和列席人员都和昨天一样。这次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又有升级。还是毛泽东首先讲话，说是昨天没有讲完。开始就讲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延安华北

座谈会^①以后，才想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又说，昨天讲的也有点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指县、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实际上不是。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着省、更不是向着群众。信中讲“得心应手”这个话，就是指的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中央。写信就是准备发表的，以便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彭德怀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接着又说，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23日）讲话说的是无计划、无组织、无准备，看来不对了。言为心声，照信的后一部分讲，中央领导和党就不行了，你要打起无产阶级的旗帜了。林彪紧跟其后也抢着定调子，大批彭德怀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差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最后，毛泽东在再次发言时口气有所缓和，提出对彭德怀，要一看二帮，一下子改正不可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慢慢改。

晚上，彭德怀在宿舍走廊坐着，以极其痛苦的心情向秘书们谈起这两天常委会议的情况，他说，主席批评我这次写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时，彭德怀似乎已经感到斗争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于是他说自己在小组会上已经明确表示，

^① 指1945年2月1日，为着从路线上总结抗战以来的华北工作，为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在延安召开了由华北地区部分地方工作和军队系统领导同志参加的，旨在总结工作、统一思想的座谈会，会议断断续续开了约40天，在7月下旬结束。

不管最后做出什么结论，都保证做到三条：一，决不当反革命；二，决不自杀；三，以后不能做工作就自食其力。

8月2日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会那天早晨，彭德怀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完，就大步出门开会去了。

（二）全 会 决 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在庐山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7人，还有部分省区的主要干部15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时讲了话。全部内容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问题，讲得比较简单；主要是讲第二个问题，即路线问题。他说，初上庐山，7月上半月有些神仙会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已经有明显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会议确定了方向——反右，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调子升级到了新的路

线斗争的高度。

同日，毛泽东在对张闻天给他的一封信的批语中，提出了一个“军事俱乐部”问题。说什么“张闻天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这就使会议的批判，在追逼他们的组织联系上提出了新的题目。

到会人员划分为6个小组，彭德怀仍在第4组。另外又以第2组和第4组为基础，组成两个临时小组，吸收有关同志参加，每组扩大为50多人，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进行批判。

8月3日到8月10日，全会连续举行小组会议。在会上除了围绕彭德怀的那封信和他的一些发言进行批判以外，还要交待他在庐山与其他人的交往和谈话。并对彭德怀几十年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所谓“路线错误”，逐条进行批判，实行“老帐新帐一起算”。这种检查所谓什么历史根源的作法，就使批判的重点，离开了彭德怀那封信的是非，从而把党内争论变为对个人的清算。在整个小组会议进程中，会场气氛紧张，人们心情沉重。

在这几天的发言里，有一部分彭德怀的老部下，他们的讲话最惹人注目。他们不得不表示同彭德怀划清界线，对他进行批判，同时又不得不说明过去受到彭德怀的影响，对他有着许多好的印象。这些发言，使人们看到彭德怀在他许多部下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例如：

有人发言说：“我从很小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挨过他不少骂，对他的作风有意见。去年军委扩大会议，

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可是后来他却表示，我的大字报提的意见是善意的。高级干部政治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骂战士……”

另一位干部发言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时期，我高兴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

还有的说：“彭德怀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13年。总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对党忠诚，是毛主席的助手，对敌斗争勇敢，对革命有贡献，生活很朴素。当然对他那一套待人粗暴，领导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主观，不听人家的意见，也深有感觉。对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一次是换了一个脑筋。如不参加这次会议，凭我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

还有的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从彭德怀同志平时表现情形看，觉得他这几年有很大进步……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不很长，但为他外表的坦率、正直、艰苦朴素所迷惑。尤其是他近几年来在党内的地位，党对他的信任和他在军队建设方面的许多言论的假象，我认为他在毛主席长期耐心教育下感化过来了，政治上已经成熟了。在过去我也是受他这方面影响很深的人”。

更有一位干部说：“我是在1929年8月间被调到四军才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未认识前，听人说彭总很厉害，爱骂人。在‘七大’时也听到过华北座谈会一些情况，对他印象不那么好，认识他以后，又感觉他很坦白直爽，艰苦朴素，并常讲要加强军队中党委集体领导下

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因此对他的印象是又怕他又尊重他”。

这些发言，非常引人深思。在那样严厉的批判会上，把彭德怀几乎作为革命罪人来清算的场合，竟然能有这么多的干部讲出这么多的赞美言词，而且内容涉及到彭德怀的政治态度，革命功绩，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等各个方面，确实令人深思。可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这些发言是为彭德怀“评功摆好”或“界线不清”。可以想见，至少彭德怀在这些方面的美德懿行，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否定的。

彭德怀在八中全会这些日子里，每天按时参加小组会，答复大家的质问，听取大家的揭发，接受大家的批判。他当时曾经用以下的话表明他的基本态度：“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争我，我受得住。你斗就斗，只要不开除党籍和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还可以参加劳动生产”。

8月6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即席检讨，对大家提出的批评表示了愿意接受的态度。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又找他谈了一次话。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今后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则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当天晚上彭德怀即要秘书代他给中央写一个报告，要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

8月10日前后，彭德怀在写书面检讨过程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会后的问题，一再谈论他所耽心的军队

工作。他向秘书们说：“不当这个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把它撤掉，我是很愿意的。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把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那就好了”。

“我国的民兵制度是有历史传统的，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几年已经摸索到了适合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的组织形式，假使因为我的问题把它废弛了，可太可惜了”。流露出他对这一支和自己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军队，怀着难分难离的惜别之情。

8月11日，由小组讨论转入大会发言，当天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讲话。他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把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奋斗几十年，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等，从根本上否认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了他们的一切革命活动的动机。毛泽东这次讲话在彭德怀的思想留下深重的创伤。13日，彭德怀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系统的检讨，宣读了自己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发言稿。接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也都在大会上进行了检讨。

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政治上对彭德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决议除了指责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和在党的历史上屡犯所谓路线错误以外，还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

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同时，全会还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这次中央全会于8月16日闭幕，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性质，作了最后结论。他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的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还讲，彭信有国际背景，他是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宝回来才写的。这样一来，就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引入到党内进而推向全党。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9月间，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继而传达到党外。消息传到彭德怀家乡，乡亲们根本不敢相信，待消息得到证实，他们一方面感到迷惑不解，一方面后悔去年冬天不该向他反映那么多的严重情况。消息传到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太行山区，麻田村的老党员们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听脑子就‘炸’了，老彭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

在彭德怀长期住过的武军寺村，有一位劳动模范被省里指定去太原参加会议，肃清彭德怀的“思想流毒”，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在会上一言不发。消息传到军委和总参谋部，当不少干部听到“彭总犯了反党错误”的传达时，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这能会是他吗？”

（三）不 白 之 冤

在军事系统，为了深入讨论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消除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央和军委在全会尚未结束之前，即于8月11日发出通知，决定8月18日开始在北京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要求全军师以上单位的军政两位首长都来参加，以便直接接受教育。参加会议者为1070人，共划分为14个小组。

会议的前10天，主要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庐山会议的主要文件。当在大会上传达到毛主席说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时，“会场一片沉寂”。许多干部说，“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几个人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从8月29日起，由14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小组，彭德怀、黄克诚各参加一个组，接受大家批判。

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综合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揭发和批判”涉及的问题极其广泛：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写信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到炮击金门的组织指挥；从红军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

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成员等，无一不在严加怀疑和追问之列。综合小组会一直持续到9月8日，大会秘书处才通知彭德怀，“为了使你有时间作检讨，这几天你可以不再参加大会”。

林彪是庐山会议后被指定的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和新的国防部长，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个善于在关键问题上颠倒黑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不止一次地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彭德怀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中的基本态度，不仅同八届八中全会一样，是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的事业，他就“要什么给什么”，而且有意识地加重检查自己，以便让那些对他一贯存有好感的部下永远把他忘却。但是唯有对于两个无中生有却又影响深远的问题，即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问题，则坚决抗争，寸步不让。他深知，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讲出或默认任何虚伪的情况，都会给全党全军带来严重的恶果。因而在这两个问题的辩驳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震怒不已。

9月3日的上午和下午，都是追问彭德怀关于“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在开始说明这个问题时，他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是“怎么搞的，你进入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他们在思想观点上比较一致，预先更没有什么策划。但是有的人却硬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组织名单，在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俱乐部就是4个人，就是以

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他再也没有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来报名嘛！”惹得全场哗然。继而群起围攻，严斥彭德怀的态度极不严肃。此时即有人质问：

“你只承认4个人，以后再查出来怎么办？”

“查出来以国法审判，按条令处理，现在审判也可以！”彭德怀也不示弱。

过了一阵，他缓和地说：“交待组织，就是那么几个人嘛！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

其实，这个所谓“军事俱乐部”，后来经过审查彭德怀问题的专案组周密调查，始终没有发现存在过这么一个具体组织。

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是有人在9月1日的大会上首次提出来的。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庐山开会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在决议中也根本没有涉及，而是到这次会议才突然提出来的。显然，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足以置彭德怀于死地的问题，虽然提出的人极不严肃，毫无根据，但是彭德怀对此却不能不严肃对待，给以坚决驳斥。

围绕这个问题，第一综合小组后来还用了两天的时间专门揭发和追问。在人们的质问中，彭德怀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抗争。他解释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的任何谈话都经过别的人翻译，我怎么能去密谈？！”对所提出的具体事例，他都尽量详细地予以回答，加以澄清。不仅如实地叙述同外国人会见时谈话的主要内容，而且恳切地列举会见的时间、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他清楚地知道，这条“罪状”对他来说是根本

站不住脚的。可是这种诬陷对他的侮辱，不能不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的伤害。正象他所说的：“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到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追查，与别的问题大不相同。别的问题都是大家把意见讲完即告结束，而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则是会内揭发密切结合会外调查，重要“疑问”一经提出，或则立即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对（外事工作会议系批判张闻天的会议，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举行），或则立即向国外使馆发报要求说明真相。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为止，对此问题仍然一无所获。然而，这个问题，从此却成了历届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久久折磨困扰着彭德怀。为此，他曾经痛切地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郑重声明：“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直到1974年他病危期间，在舌头已经僵硬的情况下，还在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清白的”。他对这个诬陷是死不瞑目的。

9月9日那天，彭德怀预感到军委扩大会议行将闭幕，于是一面起草向大会提交的检讨，一面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首先表示，接受这次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接着提出今后自己对工作和学习的打算。他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能允许他去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见到这封信，立即批示，印发各级党组织和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个会议的各同志。并写道：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决定”。

9月12日，彭德怀又向大会送去一份书面检讨，违心地表示了他对会议提出的各个问题的态度。结束了近3个月每天接受批判的处境。一场大的政治灾难暂时告一段落。从这时开始，他决心去过一种名符其实的平民生活，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统统都交给公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前夕，他的元帅大礼服、国内外授给的勋章、以及红军长征时期他积攒的几块银圆，全部被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他自己仅仅携带了准备日后阅读的书籍，从中南海搬到了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完全结束了他30多年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的生活。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给全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给后人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1959年庐山会议纪事

陈诗惠

邓小平同志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的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这一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恶化的过程，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其中一个看似偶发、实则必然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使从反右派肇始，在“大跃进”中普遍发展起来的“左”倾观点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对整个经济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破坏，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本文就这次会议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纪事如下。

一、庐山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左”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1955年冬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已为建设伏下了冒进的根子；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被纠正后，毛泽东又多次尖锐地批评“反冒进”犯了右倾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2页。

错误。这种错误地批评，促成了“左”的思想日渐滋长。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左”倾思想又从政治思想领域逐渐波及到经济工作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占上风。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论断，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向“左”的转折。接着，党中央在1958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如“一月南宁会议”、“二月北京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都接连不断地反右倾，使“左”的空气越来越浓。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以高速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大跃进”运动由此逐步展开。特别是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钢铁当年翻番和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之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竟动员八九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在全国农村一阵风似地把74万个合作社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一下子把“大跃进”推向了高峰。结果，许多超越阶段的空想的东西，甚至神话般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和“共产风”，在城乡严重地泛滥开来。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客观的比例关系被打乱，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被动混乱的局面，政治空气也趋向紧张。

大炼钢铁和公社化高潮，时间虽不长，但破坏性极大。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使城乡形势急转直下。情况的变化使党中央有所觉察，并下决心纠正当时发现的一些错误。在毛泽东提

议和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召开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以纠正高指标、“五风”错误。这使人们过热的头脑开始降温，“五风”有所收敛，紧张空气有所缓解，形式逐步好转。总的说，这只是一种应急性的权宜性的纠正。

但从全局来说，党仍然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独特创造，是不能动摇和不容怀疑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承认犯了“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并说“党内的主要错误还是‘左’”。然而那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至于全局上体现“左”的指导思想的“三面红旗”^①，则仍是要坚持和高举的。这是贯穿于当时历次会议和各种文件、讲话的基调。即便是钢铁、粮食等主要指标作了几次调整之后，各项指标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规定1959年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为1亿担；1959年2月，中央还发出文件要求力争超过上述指标，粮食达到13000亿斤、棉花1.2亿担）；“一平二调”^②、剥夺农民等问题虽受到批评，但是一些地方“五风”并未完全停下来；急于过渡的步子虽放慢了一些，把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推迟到15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但这仍然是一个极不现实的时间表。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12月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所讲：至于

^① 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② 即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调”指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等。

进入共产主义，一定要苏联进入以后，我们才进入，我们要在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再等三五年再进入，苏联是15年，我们是2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样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有利，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即使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不宣布并不吃亏。这表明，虽然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已正确地指出：“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然而实际上，那时党的指导思想仍深陷在“左”的窠臼中，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仍远没有落到中国现实的土地上。这个基本情况就决定了纠“左”必定是艰难曲折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良后果进一步暴露。城镇粮食供应短缺，市场紧张，农村发生了外出逃荒，浮肿病流行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些同志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党反映情况和意见，表现出他们忧国忧民的热忱和为党、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有的同志向中央写信，尖锐指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的同志还认为，“超越阶段与平均主义是‘大跃进’中的两棵野草，它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和分配方式，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有的同志还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而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党内外都希望进一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

1959年6月15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讲了多少年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周恩来、李富春也在会上指出，“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很不够。这次会议强调综合平衡，进一步下调了钢铁的指标，为庐山会议作了一些准备。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庐山会议前，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所采取的纠正行动，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之中。这种纠正从根本上说，就是以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为界限，任何超越和偏离这个界限的纠正都将是不允许的。实际上，当时的纠“左”主要限于对过高的指标和对基层的某些过头行为的局部调整和抑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高层决策和全面指导思想上的纠左问题；对经济生活中一些严重失调现象的纠正，也没有触及导致或助长经济决策失误的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根源。不仅如此，还将这方面“左”的东西视为“正宗”并日渐强化，强调斗争而忽视党内团结与和谐，强调崇尚领袖权威而忽视党内民主，不少人对这些不正常现象已习以为常，不以为非。这就是庐山会议召开前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庐山会议的召开及其曲折过程

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包括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是八届八中全会。按照会议的实际进程，大体可分为三段。

(一) “神仙会”阶段

原来预计政治局扩大会议只开半个月，会议的设想是继续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即“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跃进。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还把“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到困难。去年做了一件蠢事，把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达到。象粮食的指标10500亿斤，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粮食能否每年增加1000亿斤？钢铁每年增加多少？能增加400万吨？毛泽东对粮食、钢铁生产建设虽然提出了问题，但他乐观地估计现在形势好转了，盲目性减少了，主观主义减少了，到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因此，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着重指出，去年安排国民经济的顺序是重、轻、农、商、交，我们搞过十大关系，就是要两条腿走路，可以说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应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毛泽东称赞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强调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方面安排好这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会有利于

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他明确指出“大跃进”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等等。为了深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结合实践认真读书，好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的安排是，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山观日出、游览风景、名胜古迹；有的作诗填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小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议论形势，总结经验、交流思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在一次发言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全党全民都得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他在另一次发言中又指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

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

朱德的发言强调，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我们对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吃了亏。食堂办不好，暂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在目前要巩固家庭制度，要让农民搞些家庭副业，农民有东西卖出来，也有钱买东西，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就活跃了，人心稳定了。六亿人口的中国，农村不稳定一切都不好办。

董必武在发言中强调要在党内造成说老实话的空气，建议全党学习党章，每个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

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讨论，几乎每次会都发了言，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1）应认真总结经验，按经济规律办事，防止骄傲情绪。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讲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一〇七〇’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认为，“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

验也容易忘记。”同时他也肯定“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很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2）对人民公社和全民办钢铁表示怀疑和否定。他说：“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公社没一个垮的，象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他认为“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的事情。”（3）提出纠“左”比反右难的看法。他联系党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容易产生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止3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了。”（4）要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率直地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他还提出，“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

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中央的其他同志、中央部委和大区、省（市）的负责同志，也相继在小组会上发言。总的看，这段小组讨论的气氛是认真的和平静的，大家都摆情况、讲问题、谈看法，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党心、人心所向。如对刮“共产风”、忽视比例关系、不尊重客观规律、用大轰大嗡、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生产以及多快与好省分家等问题，各抒己见，认真分析错误的程度和原因，总结应该记取的经验和教训。会上的主要呼声是继续纠正错误。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是护短的。他们强调的是“大跃进”的成绩，而且认定今年仍然可以“大跃进”，赶上英国决不要15年。他们虽也承认工作中有不少问题和某些方面的被动，但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责任不在毛主席、党中央，而在各业务部门和基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们看得轻而易举和过于乐观，认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也正在解决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被动局面已经有很大好转。所以，他们强调，不能把比例失调归咎于“大跃进”运动，不能把有干劲的人说成是主观主义者，不能用落实指标来掩盖保守思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纠正错误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需要强调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以便继续“大跃进”。讨论的情况表明，与会者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第一，对“大跃进”所造战的形势怎么估计，到底成绩有多大、究竟问题有多严重？第二，对八个月来纠正错误的程度作何评价，是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

还是改正得不够有力？第三，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努力纠“左”，还是应反对右倾保守？

7月10日，针对小组讨论中的问题，毛泽东在组长以上的小范围会议上讲了话。关于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认为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作这样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毛泽东还回顾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简单说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刮了“共产风”，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我们开了许多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人民公社，他说我不相信人民公社会垮，问题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总路线，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我总是对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以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他还提出要坚持农村公共食堂、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批判物质刺激。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会议下一步进程和开法，

他建议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结束，并请有关负责同志将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几个文件，交大家讨论修改后下发。

在这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研究问题，仔细算帐，落实主要指标，调整1959—1960年度的国民经济建设任务。

7月14日，由胡乔木等综合整理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以下简称“记录”）下发与会同志讨论。“记录”内容包括：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等12个问题。“记录”在“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里，讲了成绩之后，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有三：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二是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三是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记录”认为主要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的经济规律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于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记录”强调，在肯定成绩之后，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记录”还提出1960年

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当在作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翌日，在分组讨论“记录”草稿时，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基本观点，要求重新改写文件中“形势与任务”部分，对成绩要充分估计、概括有力。他们提出要鲜明地指出，195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按着高速度发展的转折点，一年之内完成了“二·五”计划中钢、煤、粮、棉4大指标，人民公社一个没垮，证明了它的优越性；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新发展；文件应理直气壮地鼓劲，同时，他们认为，缺点不能讲得太多，要指出缺点的本质是前进中发生的、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不是方针性的，并且已经逐步得到解决。目前虚夸等已不是主要偏向，而在调整、落实指标中的松劲现象，“气压下降”的情况倒更值得注意，特别应警惕部分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低估成绩、高估缺点的严重现象。他们坚决主张到1962年我国的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数量要赶上、超过英国。对“记录”草稿的讨论反映出，在小组讨论中已经表现出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对错误纠正的程度以及对当前主要思想倾向的估计等问题，不同意见仍然存在，并且分歧进一步明朗化了。在这期间，周小舟等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会上一些提批评意见的同志感到有压力，希望会议能开得更活跃些，广开言路，把问题进一步摆开，以利总结经验。周小舟等讲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发展的一年，估产过高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听到这些意见时，毛泽东并未表示反感，还说他自己

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1958年有些事他也有责任，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家会象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在谈到陈云同志管理经济历来稳重时，毛泽东讲了曹操打袁绍失败后想念郭嘉的故事，不无感慨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毛泽东最后表示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应该在肯定成绩伟大、保护“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听取各种意见；同时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要做到既批评缺点又鼓舞干劲；希望大家尽快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给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以相当的鼓舞和勉励。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接陈述意见。他听说会议很快就要结束，而不少同志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因此深为“左”倾错误不能得到进一步纠正而感到忧虑。他在给毛泽东信的开头就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上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他在信中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同时尖锐地提出一些仍然存在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他特别建议：要“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

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这样一封无论从政治上、组织上都符合原则、符合实际、合乎常情的信，由于它的尖锐、坦诚和直言不讳而招致了始料不及的不公正的对待。

（二）从纠“左”到反右的大转折

从7月16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尔后，彭信于7月16日被发给与会同志。

从16日开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打乱原来按大行政区划分的六个小组，重新编组开会。17日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和“得多于失”的讲话。会议继续讨论“记录”草稿，并着重讨论了彭德怀的信。在小组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虽有个别提法欠妥，但基本上符合实际，表示同意；同时也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疑问，表示反对。彭德怀参加第四小组并在19日发言中说明，他的信是仓促写成，是供给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他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不怀疑的，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他还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

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之内要消灭文盲，全民办这，全民办那，等等。这种“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在小组讨论中表示支持彭信的一些同志，赞扬彭为人刚直，对党赤胆忠心，认为他的信对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至于有些问题说得简单一些，有些词句欠斟酌，可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有的同志说会议已开十几天，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不是很浓厚，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夸大缺点。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

有些同志还补充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如说武昌会议前，人们只讲打破平衡、打破比例，不大敢说比例关系，没有很好综合平衡。应看到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相当严重的。有的同志尖锐指出，那一时期有骄傲自满情绪甚至不可一世，以为超英赶美不在话下，苏联也不放在眼里，有的滥用党和主席的威信，说的是政治挂帅，实际是主观主义挂帅。有的同志认为所有制变更过快，“共产风”刮的时间虽很短，但危害不小，有的地方热得过火，竟提出两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说这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算过分，尽管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还有的同志说，彭信中说主席处理经济问题“不得心应手”，如果指建设上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等等。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就彭信和“大跃进”中的失误，发表了各自的意见。黄的话不多，主要是在19日小组会上谈了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在别的场合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搞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

周小舟也在19日的小组会上发了言，他讲：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这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彭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是可以斟酌的。关于得失问题，总的来讲得大于失，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湖南去年建了50000个土炉，有两万个炉子根本没有生过火，某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些，我看就只有失而无所得。谈到总路线时，他说我们都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刮“共产风”也是想快一点搞共产主义，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应该引为教训。对于基层干部的浮夸作风、强迫命令，应该看到这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有很大关系。我们只是鼓下面的劲，某些事情办法不具体，或者我们自己的心也是“虚”的，然而也总是去鼓劲，这样发生的错误我们首先就负有责任。周小舟主张会议把缺点讲透，否则是难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把缺点讲透，找出

经验教训，不仅不会泄气，反而能够更鼓正确的干劲。

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他的发言明确、中肯，受到人们的注意。他先申明：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他首先表示成绩说够，我赞成；同时认为缺点讲透也很必要。他指出，认为缺点已经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再讲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经过了这样一段过程，事后诸葛亮，问题看得更清楚，回过头来严肃认真总结，印象才会深刻。至于说讲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那是不会的。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大家不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能上升。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与哪个算帐。对于缺点，他同意“记录”草稿提出的三条，还建议加一条：下放太多，体制紊乱。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认为缺乏经验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但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目的是为了今后重犯这些错误。他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它与政治、军事规律不一样），纠正那种不讲经济核算只算政治帐而不

算经济帐的偏向。在所有制问题上，他明确提出：集体所有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它的生命力，要把它巩固下来，不要强调改变。他主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缩小供给部分，反对搞平均主义。他说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张闻天的发言除了讲经济问题外，还讲了民主问题。根据党的历史经验，他深感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必须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指出：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党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能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接着，张闻天就彭德怀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彭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

不大。如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10年，彭说1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彭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说：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关于纠“左”是否比纠右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张闻天的这些见解是实事求是的，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对彭信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同志，发表的意见也很尖锐。他们认为彭对成绩只作了抽象的肯定，问题却讲得太多、太具体、太严重，不是鼓劲而是泄气，不是支持群众运动而是乱了人们的思想，再反“左”，今年指标就无法完成。因此，要大讲成绩，说去年成绩是空前未有的、史无前例的、永远不能改变的。这些同志强调，要防止冷冷清清，防止回到老路上去，认为在“大跃进”中出了“一个指头”的一点乱子，比“四平八稳”下出乱子好。有些同志进而指出彭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把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抛诸脑后”、“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纠‘左’比反右难”等等，是暗示党中央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会议的发言记录和材料，并找了不同意见的双方谈话，但就毛泽东本人说，倾向本来就是有了的，反映在他在会议开幕时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上。这个形势总估计是不能受到动摇的，对于具体的错误则可以做有限度的纠正。而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显然突破了这一个限制。于是，毛泽东断定，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怀疑党中央指导思想的，是针对“三面红旗”的。因此，他是很难接受和容忍的。于是，置人们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决心进行“反击”。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成为庐山会议风云骤变的一个转折点。他对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我们检查多次，你们就没听到。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无非是骂祖宗三代，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泽东劝党内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他

说有一部分同志也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注意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有些人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他们的论调。

毛泽东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1958年、1959年实在有一大堆事没有管，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下的决心，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赔了几十亿、“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办公社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刮了“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付出了代价。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人民公社会不会垮？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毛泽东还讲，总路线是他提出来的，有一股干劲比那些凄凄惨惨要好。他批判了彭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观点，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属于右的性质，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影响下，右起来了。

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持“左”倾观点的同志，打击了提批评意见的同志，对同情和支持彭德怀信的同志是一个警告。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

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他讲话之后，整个会议气氛急转直下，由纠“左”转向反右。原来持“左”倾观点的人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更加理直气壮、言辞激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毛泽东的批评下首当其冲，心情沉重。特别是彭德怀的沉重心情更难以用言语形容。他认为主席英明伟大，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这次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决定反右是不适当的，这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一大批人，而且在经济上还会出现一个大马鞍形。有些同志埋怨彭不该写信，并好心地劝他检讨。多数同志虽然不能不表态，但批评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与人为善的态度。

7月26日，毛泽东就一位持有与彭德怀相似观点的同志，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写了《对一封信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作为7月23日讲话的补充，给批右升了温。“评论”说：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些方面的材料感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还说：党中央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的估计成绩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9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错误并不可怕，就怕因批评而泄气，评论再一次强调：“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虽未达到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庐山会议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评论”要求党内那些在紧急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的同志“迅速转变态度。”

至此，庐山会议完全转向“反右倾”，不仅对事，而且对人，形成了一边倒的不正常局面。有的人态度越来越激烈，调门越来越高，帽子越扣越大。如说彭的信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挑战书，性质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方向、立场错误，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之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彭信通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只讲反面教训，不讲正面经验；只讲冷，不讲热；把局部暂时的东西说成是全面的长期性的东西；把几亿干部、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的说，主席讲形势是三句话，彭德怀、张闻天都是“吃红烧

鲤鱼中段”，他们的主体、重点是放在“问题很多”上面的，在讲成绩部分还埋有三颗地雷。有的说，彭信定性（指从分析形势到路线提出完整的一套右倾观点），张的发言定量（指夸大缺点、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冷潮热讽）；彭的信是纲、张等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

随着会议的“升温”，那些被视为思想模糊、摇摇摆摆的同志，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不坚定。有的说在主席讲话和写“评论”之前，自己在政治上害了感冒病，没有觉察到目前我们正处于内外夹攻的紧急关头，没有看出彭的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敲起警钟，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有的承认自己头脑里想的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到庐山来很想作些研究，对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右倾思想的发展和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没有看到和感到，这表明自己政治嗅觉不敏锐。有的表示要收回过去支持彭德怀的发言，表示要同彭划清界限。尽管在许多同志心目中并不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右倾反党，尽管他们感到这种政治定语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但在不断加温的政治气候下，他们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外，很难再作出别的选择了。

会议的发展已不允许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揪辫子，打棍子，以势压人。为揭穿所谓“右倾本质”，有人提出彭的错误是他在历史上一些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认为讨论彭的信只有联系他的历史才能讨论得透，清算他的旧帐比从理论上分析信的论点更为重要。这个意见立即被会议采纳。于是会议转而清

算彭的历史旧账，采取了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彭的历史错误，毛泽东归结一句话：彭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事实上，彭德怀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但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失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某些失误，可是这些问题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庐山会议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翻历史旧账，这就既不利于明辨是非，又必然伤害同志，损害党的团结，在党内斗争中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同时会议对张闻天等同志也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并追查了他们与彭德怀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给他们加上了所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的帽子。毛泽东在这期间连续批示文件，指出：“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并严厉指责彭等“在庐山会议上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号召全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的反对派和怀疑派”。

7月29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修改指标，落实1959年经济建设项目；二是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要讨论回答这个问题。中央随即派专机限期将未上山的中央委员接到庐山出席八届八中全会。

（三）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对彭德怀等“批判斗争”的进一步升级

8月2日至16日，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参加会议的

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其他负责人14人列席了会议。

在8月2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简要的谈了改指标的问题，说八届六中全会决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等指标是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到年底还有5个月，还是改了好，要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然后着重讲了路线问题。他说，初上庐山，7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的味道，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攻击总路线的自由，要以批评去年工作为主，抓住已经改正的缺点来破坏总路线。他们对9个月以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是压制民主。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风也没有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这篇讲话规定了全会的主题，并为错误地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反党集团”定了调子。

8月3日至10日分小组开会，按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的基调，对彭德怀等展开了“揭发”和“批判”。其间，有关负责同志向未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介绍了彭等“发难”经过及进行“反击”的情况。8月13日至15日全会召开大会由彭、黄、张、周作检查。并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政治

批判”和组织追查。

大会、小会上进行的政治批判，火气更大了，纲上的更高了，看不到平静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影子。8月10日，毛泽东在安徽的一份材料上针对彭张等人写了一段批语说：“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同日，毛泽东在另一个文件上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加之，彭上山前，出访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于是毛更把彭、张、周等的意见同赫鲁晓夫的说三道四联系起来，指责彭等庐山的言行是配合修正主义向党进攻。8月11日，毛泽东再次在全会上讲话，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分析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说他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特别严重的是武断地指责彭德怀这次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在全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集中概括为：一个纲领、两个否定、六个反对。即

认为：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和他在会议期间的发言、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着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这个纲领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彭德怀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追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非组织活动，集中地是要他们交代如何把锋芒直指党中央和毛主席，如何阴谋篡权。当有人反映彭德怀等曾议论过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不够，民主生活不正常，特别是主席不大容易听得进大家意见，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等问题时，在许多人中引起了可以理解的激愤之情，这在当时不仅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且成了有政治野心的证据。多年来，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过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使他受到全党的尊敬，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是，由于较长时期以来，党内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个人崇拜风气。只要对领袖提出批评意见，就是反党，议论领袖是非法的、有罪的。彭德怀等的言论也

就自然地被视为是“恶毒攻击”毛泽东和企图“取而代之”的严重问题。甚至连彭德怀过去的名字——彭得华，也被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说这表明他早有政治野心，就是要立志得到全中华，如不被打死，就要当总司令、当皇帝。

对于彭德怀等同志这些对毛泽东的私下议论，毛泽东是非常认真对待的。他于8月15日在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一段批语，作了极其尖锐的回答：“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对转

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派朋友。”

确实对毛泽东的见解表示非议，这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很快就使彭德怀等同志陷于极度的孤立。一些好心的、对革命怀着至诚信念的同志都习惯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以维护领袖的权威为己任。他们尽管对彭德怀等同志素无恩怨与恶意，对他的许多观点表示同情或持有同感，但也不能对所谓的“斯大林晚年”的说法保持沉默。他们从各方面论证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许多根本不同点（如说斯大林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民主，提倡个人迷信，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而毛泽东则与之相反），特别强调：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而毛主席虽60几岁，但他的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青，真正是充满朝气、生动活泼、一往无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和他对于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毛主席非常欣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确实是他精神状态的一个写照。许多同志都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和意见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彭德怀等在这个问题受到的批评、谴责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多、都重，都更难于被人们容忍。

彭、黄、张、周等同志在不断的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

大帽子。彭德怀事后说明，当时想到的是我党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持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①。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接受了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战友的倾心地和热泪盈眶的劝告，为顾全大局，违心地作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检讨。但他对“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两个问题则坚决地予以否认。他认定“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②”。

黄克诚也出于同样的心情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自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主张人民公社迟办一点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怕急、怕猛、怕有副作用”，特别是“当用猛烈的群众运动、急风暴雨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基础和精神阵地时，自己就动摇、彷徨、耽忧”，当一些地区出现某些比较严重的现象时（如浮肿病、饿死人、农村流亡等）他甚至耽忧到睡不好觉的程度。黄克诚被迫承认这些是“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思想在头脑中的反映”。

周小舟在受到批判后，许多事情想不通，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给他写信、送《邱迟与陈伯之书》，希望他“迷途知返”。他虽然不得不作检讨，但不夸大、不虚构事实，向主席反映情况完全是个人的看法，而决不是从“军事俱乐部”里来的什

^① 《彭德怀自述》第277页。

^② 同上，第279页。

么东西。在8月3日的小组会上，他还用彭德怀给他谈过的两件事情，来说明彭德怀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是从心底里敬佩主席的。他在8月12日晨接到毛泽东的信并于12日晚与主席长谈之后，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认为说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总路线是推论出来的，他感到很伤心。信中说：“根据全会精神，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的性质，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而我本人曾和彭有所接触，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较深，和张闻天同志曾有一次谈话，其中详细经过，在8月10日晚以前有重要隐瞒如此等等，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张闻天也被迫检讨多次，不能过关。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声色俱厉的信责问他：“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

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张闻天在千钧压力下，尽管十分痛苦，但却表现了极大的坦然。他在写检讨的过程中曾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问题还是党内民主。后来他一再对身边的同志表示，他对7月21日的长篇发言并不后悔。他说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么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他承认发言中谈到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张闻天虽身处逆境，仍在思索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如何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问题。

与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有的地方也开始了“反右倾”斗争。山上山下、会内会外，互相影响，交错升级。8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学员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辩论的材料上批示：

“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他认为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

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人也比江西党校较少。”他要求“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办一场……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做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意义。”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断定“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因此，对右倾思想、情绪、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干劲，坚决反对右倾。8月9日辽宁省委作出了“反右倾”的部署并上报党中央，毛泽东于8月12日看到后立即批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8月14日中央向各地转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辽宁省委的报告。

8月16日毛泽东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源及其它》为题，写了一段批语，严厉而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

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段话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对庐山会议所作的政治总结。自此，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和不同思想的斗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更被进一步归结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一重大失误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违背了毛泽东本人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他培育了几十年的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各项文件通过后，毛泽东再次讲话。他认为，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象刚才通过的决议那样的总结，就是反右倾、鼓干劲。开始不对头，后来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把原来的19个问题放到第二位去了^①。彭、黄的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就感到惊奇，这一点要讲清楚。他还谈到海瑞问题，说他提倡左派海瑞，对右派海瑞不喜。他认为这半个月的会开得很成功，取得了胜利，避免了大马鞍型，防止了分裂。

八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于8月17日开了一天的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

^① 7月14日印发的会议记录草稿，7月23日情况变化后未继续搞下去，无最后定稿。

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

三、庐山会议的后果

庐山会议是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成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本已是极大的失误；而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庐山会议上又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翘尾巴”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对象能量也不大了。于是，开始认定：阶级斗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判断和唯心的阶级估量，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斗10年、20年甚至半

个世纪。因此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还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斗争的错误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严重深远，甚至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谬论，都与庐山会议肇始的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从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初期，我们党内的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有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庐山会议在这方面是一个倒退。它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的办法压制不同意见，在党内生活中紧张关系代替了民主空气。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的同志，因为对“左”的做法持有异议或保留，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渐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交互作用，加剧了“一言堂”、“一边倒”的不正常的风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不仅在工作上、决策上造成了许多的失误，而且还给了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的活动以可乘之机。

再就是经济工作中左倾指导思想随着“反右倾”的推进左的思想还继续膨胀、蔓延并迅速占据上风，使我

国整个经济生活重新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困境。庐山会议把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一些正确措施，又当成右倾错误加以批判。同时把“大跃进”中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当成正统的东西接受下来，而且更系统化和更带有政治色彩。例如公然讲“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主张“趁穷过渡”，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在“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作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和推崇。特别是在反复宣传当前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是“右倾”之后，纠“左”不仅事实上完全中断，而且从此成为天下之大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和压力下，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畅行无阻，左倾错误比1958年发展得更加严重。1959年拼命猛攻钢铁指标，结果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积累率竟高达43.8%，比1958年还高4.5%。这样就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还要求1960年钢产量达到1800万吨，力争2000万吨。蛮干硬拼的结果使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个国民经济险象环生，比例失调，元气大伤。整个经济生活爆发了危机，我国被推进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问题上 三国四方的关系和斗争

金蕴芳 孙克文 戈福录 丁立松 丁晓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问题一直是国内外不同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美苏为了各自在远东的利益，在这里讨价还价、明争暗夺。中国国内的国共两党更把东北问题作为自己全方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东北问题上的得或失为自己战略上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三国四方在斗争策略上也是变化异常，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有流血的斗争，也有和平的斗争，这些手段，相互结合，更替使用，最终还是以战争解决问题。因此，东北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国内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的一个问题。回溯战后东北问题上三国四方的关系和斗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当时各项决策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协定 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苏联将德国军队驱逐出自己的国境，接着相继击溃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境内的德

国法西斯军队，于9月间进入德国境内作战。这年6月，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也在法国诺曼底实行登陆作战，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8月，盟军攻占巴黎，随后又攻占挪威、丹麦等西欧一些国家。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以前，美、英、苏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完毕。

在远东的情况则与欧洲有所不同，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曾猖狂一时，但在中、美、英等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很快扭转了太平洋战局。1945年2月5日，美国军队在马尼拉登陆，并准备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本土大规模登陆。对日战争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要彻底消灭在远东的日军，特别是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攻占日本本土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英国首相邱吉尔曾说：“这些战役所要使用的力量是这次战争中空前巨大的，谁也无法估计这些战役将夺去多少英美士兵的生命，消耗多少物资财富。至于用多少时间才能打垮日本所占领的广阔土地上的抵抗，特别是在其本土上的抵抗，那更是不得而知了”^①。美军参谋部也估计：“在德国投降后，打败日本尚需18个月”。对日本本岛的攻击，“恐怕得支出100万美国兵员的代价，才能把日本征服”^②。苏联由于与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和平条约》，在远东的苏军也只有30个师，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是严守中立态度。鉴于这种情况，美国的战略意

^① 苏联《真理报》所载文章“远东军事形势的判断”，1945年8月19日。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34页。

图就是千方百计诱使苏联在打败德国后迅速出兵远东参战。苏联出兵远东，一方面可大量地减少美军的伤亡，以保存美军实力，另一个更主要的方面，美国企图把战争的损失转嫁到苏联头上，以达到削弱苏联实力的目的。以免“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而削弱美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时，可以“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而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①。

要苏联出兵，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为此，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对苏联进行了试探及一系列讨价还价的谈判。罗斯福首先以中国大连作砝码进行试探。1943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开罗会议时经过一段说服工作，罗斯福与蒋介石达成了把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让给苏联、以换取苏联在远东出兵。在蒋介石对上述作了承诺之后，罗斯福于1943年11月28日，到达德黑兰，与斯大林、邱吉尔举行德黑兰会议。11月30日的三国首脑午餐会上，罗斯福开始对苏联试探，但斯大林未置可否，实际上苏联的要求更多。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总统私人顾问霍普金斯、驻苏大使哈里曼又多次与斯大林等探讨，经过反复讨价还价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终于签订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协议——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苏联“准

^① 苏联《真理报》所载文章“远东军事形势的判断”，1945年8月19日。

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为交换条件。协定还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予以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出路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满洲之全部主权”^①。

雅尔塔协定签订后，美苏一直对中国保密，有关苏联对日参战部分，美国方面除在场的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就连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也不清楚。一直到1945年6月9日，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才通过外交渠道将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方面之内容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6月14日杜鲁门又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从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可以看出，苏联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远东的权益，通过对大连港、旅顺军港和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使中国东北与外蒙古、南萨哈林（南库页岛）群岛、千岛群岛联接起来，构成一道安全屏障，以警惕美国的扩张。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东北除外）的主导地位；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其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则可以通过雅尔塔协定，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减少在远东战场的牺牲，把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东北，迫使苏联承认在东北实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依靠其经济实力与苏联在东北竞

^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258页。

争，以便战后独占日本和远东，取得对中国的控制权。于是，远东和欧洲一样，美、英、苏三国通过雅尔塔会议各自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取得了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接着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准备。4月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宣布苏联声明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无效。当时，日本在东北驻有日军精锐部队关东军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并对苏联出兵早有戒备，为了对付强大的日军，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即开始从西线抽调大军增强远东部队，组成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三个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元帅；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普卡尔耶夫大将；后贝加尔湖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总计80个师，4个坦克机械化军（坦克5500辆），3个航空集团军（飞机3400架），6个步兵旅，40个坦克机械化旅，共1577725人^①。7月，对日作战的具体计划制定完毕。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死伤平民20余万。8月8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告诉他，日本仍在继续进行战争，拒绝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②。苏联政府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政府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在未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

^① 参考《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六卷本）1963年俄文版第5卷第551页。

^②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俄文版第363页。

盟条约前，就急急忙忙出兵中国东北了。

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几个方面突入中苏边界进入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总攻击。后贝加尔湖方面军，从西面突入东北的中部平原，同远东第一方面军相呼应，形成一大包围圈，切断了关东军同华北日军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三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苏蒙联军，向承德、锦州和张家口进攻；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从东面突入东北中部平原，分割和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然后向吉林、长春、哈尔滨突击；远东第二方面军，策应后贝加尔湖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在红旗舰队黑龙江分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击。于11日攻占了鲁北、突泉、洮南、化德、多伦。14日，攻占牡丹江等地，19日进占齐齐哈尔、承德和张北，20日，占领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佳木斯。22日，苏联航降兵占领大连、旅顺，到30日，在东北的日军全部被解除武装。这样，苏军自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人民及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的配合下，一举打垮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至此，苏联控制了整个东北，在其与美国争夺东北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地位。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 中国共产党军队挺进东北

苏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本应是先签订中苏友好条

约而后出兵，实际上是先出兵后签约，其根本原因是中、美、苏三国政府各自的利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雅尔塔密约，直到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私人情报方式，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了密约的片断内容。在华盛顿方面也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非正式地透露了这个情报。惊人的密约真相，才渐渐地揭露出来。开始时，国民党政府对条约中租借旅顺港口问题，采取了绝对不让步的态度。蒋介石于5月23日电令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宋子文，要他“请见杜鲁门，表示反对‘租借’名称。”6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为此事，请求与蒋介石接洽。此后蒋介石又再电宋子文，要宋对苏联采取“审慎计议”^①的交涉方针。

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力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雅尔塔协议的条件，以换取苏联早日对日作战。在美国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威胁，“只有借助武装干涉，而干涉的规模与日本侵华的规模相等，蒋介石才能指望共产党人失败。”^②但当时这还不可能实现，因为美国尚不能给予蒋介石以必要的援助，只有用政治手段使中国共产党人屈服。即“除非苏联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中苏联应允支持国民政府。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支持他们，而国民政府能充分正视现实，在政治上采取宽大的解决方法，则他们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③。

① 参考《蒋总统秘录》第一集，35—36页。

②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第572—574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165页。

为了促使中苏条约的签订,1945年5月28日,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与斯大林就有关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斯大林重申,苏联政府准备同中国进行对话,“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并盼望我们能同时同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①。6月15日,赫尔利大使受命向蒋介石递交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的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并附有雅尔塔协定密约的全文。在杜鲁门的备忘录中记载:“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斯大林期待中国达成统一、安定、希望满洲成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对于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为了和日军作战而进入东北领土的苏联军队,尊重中国的主权”,“欢迎蒋主席的代表和苏联军队同行进入满洲”,“同意美国对于中国所提的门户开放主义”^②。并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虽然镇静地听取了这一消息,却难以忍受莫斯科对满洲港口和铁路的“优越权益”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要求^③。但是,他还是派宋子文及其随员蒋经国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等于6月30日到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

谈判一开始,美国政府就通知会谈双方,“任何中苏条约的签字之前,希望先和美国磋商。美国的态度是:雅尔塔协议必须遵守——而且准确的遵守”。^④这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85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一集42页。

③ 参考哈里曼、艾贝尔合著:《特使》536页。

④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163—164页。

就为中苏谈判定下了调子，迫使蒋介石政府完全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件。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6月30日开始，7月13日结束，共进行了六次。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一是承认外蒙的独立问题，二是旅顺港口使用“租借”一词的问题。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蒋经国还曾单独与斯大林进行会晤。整个“会谈非常激烈，经过再三的交涉，后来斯大林同意旅顺港口不用‘租借’两个字，对于中东铁路和大连问题也肯让步，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他坚决不退让，会谈陷入险恶状态”^①。

1945年7月13日，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回到重庆。7月20日，蒋介石在听取了宋子文对中苏谈判情况的汇报后，曾致电杜鲁门，请求杜鲁门同斯大林交涉，使斯大林“不要坚持不可能作到的条件”^②。杜鲁门于23日从波茨坦复电蒋介石说：“我请你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你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你要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使达到完全谅解”^③。波茨坦会议结束不久，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和全权代表王世杰赴莫斯科同苏联政府恢复了谈判。8月8日，中苏第二次谈判开始。此时苏联已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已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警告宋子文，“如果中苏协议不迅速签订，‘共产党人’将进入满洲”^④。国民政府觉

① 《蒋总统秘录》第一集46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245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245页。

④ 哈里曼·艾贝尔合著：《特使》551页。

得：“当成千上万的苏俄军队开入东北（满洲）时，我们没有一兵一卒。假如我们拒绝签约，我们就无法收回东北，除非利用武力驱逐苏俄军队，以及预防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①。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对于外蒙古问题，“以取决于人民投票为条件而作了不得已的让步”，“苏联方面，也对于旅顺问题决定不使用‘租借’的语句，双方互相在某些问题上获致了妥协”^②。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以及外蒙古的换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两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不干涉彼此的内政。苏联重申中国对于中国在东北诸省的主权。在换文时，苏联允诺对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给予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项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大连港将被宣布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并规定由中国管理该港，但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租借供苏联使用。此外。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中长铁路，则应在中国主权下共同经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暗中庆幸，他曾告诉赫尔利，中苏条约指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

^① 《中美关系论文集》英文版283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一集61页。

主政府的努力”，“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①。而美国对条约的态度既满意又不满足。满意的是苏联宣布只支持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②。不满足之处，是担心对苏联的让步会影响至美国在华主导地位削弱，和限制了美国向东北扩张。

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毗邻，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已认识到应把东北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中共七大确定的战略方针，虽然是向南发展，但也提出了夺取东北的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东北四省非常重要，现在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有了东北就有基础，东北有可能为我党所掌握。从当时情况看，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我冀热辽根据地的一部分已伸入到东北，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又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集结中苏边境的抗日联军已配合苏军进发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势在必夺，国内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进入东北。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1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收日满敌伪军投降，令原东北军吕

^{①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179页、182—184页。

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在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①。

由于中共中央对当时东北情况尚不甚了解，为了谨慎起见，在发出这道命令的同时，又发了一个内部指示，指出：“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暂时到边境待命，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接到延安总部的第二号命令后，于13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部队和干部13000余人向东北挺进，同南下苏军会合，于8月30日一举解放了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山海关。8月26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事前，中共中央对条约的内容和谈判过程毫无所知，条约公布后，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东北三省为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张秀山率领去东北，万毅所派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②。8月29日，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由于中苏条约中已明白

^① 1945年8月22日《解放日报》。

^② 《中共中央给各局各区党委指示电》1945年8月26日。

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北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苏联红军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指示命令“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进入东三省后，“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胶东区党委在大连等地区的侦察报告（即苏联军队只占领了大城市和少部分中等城市，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均未占领，实为空虚），向山东分局发出紧急指示，指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000至30000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①。这表明，中共中央在向东北派遣大批干部的基础上，开始向东北大批派出军队，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争取在东北的主动地位。

9月14日，曾克林（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9月6日进驻沈阳）与苏联红军代表卫斯别克同机飞抵延安。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全国形势和争取东北的战

^① 《中共中央给山东分局指示电》，1945年9月11日。

略决策。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各中央局关于调配100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的指示^①。中共中央还决定，组成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赴东北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为实现我党力争东北，完全控制热、察两省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成。19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布署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②。根据中央的布署，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山东等解放区抽调了两万名干部，陆续进入东北。又命罗荣桓率山东主力一、二、三、七师及五、六师大部，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延安两个团、冀鲁一个团和山东万毅部及原南征第二梯队刘转连和文年生部等10万大军，向东北挺进。从此展开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这就冲破了美苏和国民党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活动所确定的格局，引起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极大震动。

三、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东北进犯 和共产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的策略方针

苏联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

^① 《中共中央给各分局指示电》，1945年9月15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1—37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后，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立即采取各种手段，对东北地区进行抢夺。这又引起苏联态度上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策略上的变化，出现了在政治、军事上三国四方更为复杂更为激烈的争夺和斗争。

美国的战略就是推行历来主张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维护自己在中国的主导地位。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的当天，哈里曼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苏联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履行大连港国际化的承诺，声明中苏间任何影响美国利益的协议均应与美国协商。14日，莫洛托夫会见哈里曼，表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口头保证该是足够的了，没有必要再发表一个书面宣言。

美国在采取外交手段的同时，还企图以军事行动来限制苏联军队在东北的作战行动。早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苏就双方海空军在东北的活动范围达成过协议，但未划分地面部队的行动界限。美国军事当局曾提出过在大连登陆计划，条件是日本先于苏联军队占领这个半岛时投降。8月10日，哈里曼催促美军尽快在辽东半岛登陆，未获同意。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麦克阿瑟通知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转告苏军总参谋部，要求苏军全部结束在远东对日军的进攻。同日，苏军参谋部声明，日本投降的公告是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布停战令，^①因此，“苏军远东部队将继续进攻日本。”^②17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在答复日本关东军停战建议时，限日军必须在20日12时起全线停止一切

^① 《真理报》，1945年8月16日。

对苏作战行动，就地缴械投降。并命令苏军各方面军，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尽量夺取东北各大城市。至25日止，苏军完全控制了东北，推进到长城沿线。

美国插足东北，限制苏军行动的企图遭到破产后，又计划抢占华北各港口、交通要道和大城市，企图通过国民党来控制华北，向东北渗透。9月10日，宋子文向艾奇逊提出美国帮助国民党运兵东北的要求。18日，杜鲁门根据美国军部的提议答复宋子文说，已指令美在西太平洋部队立即执行这一任务。美国驻中国的代表魏德迈则公开声明：“美国陆军将用以占领主要城市，实行蒋介石的命令，直到国内情况‘安全’为止，正在考虑的计划，包括北平、上海、天津、杭州及满洲的部分占领”^①。魏德迈还和蒋介石达成秘密协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与护路部队协同占领自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线，“在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之间，如受共军攻击发生危险时，‘美军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

针对美国的动向，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区：对于登陆的美军，“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同时应有武装抗击其前进的准备。不得已武装自卫时，我应坚守自卫立场，决不先开枪”。对于个别或小队美军人员自行进入解放区，问清情况后“礼送出

^① 《解放日报》，1945年11月28日。

境”^①。9月底，美国军舰开始在烟台海面游弋，企图登陆。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责成叶剑英通知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转告在华美军总部：烟台地区已在中共军队控制之下，不存在需要缴械的日军，希望美军不要在这里登陆，否则将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军对叶剑英的通知迟迟不予答复，9月30日美军在天津登陆，10月4日美军驱逐舰一艘进抵烟台海面，不顾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抗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撤退烟台驻军和防务。把烟台移交美军接管。面对美军蛮横无理的要求，中共中央指示胶东区委，坚决拒绝美军登陆，构筑工事，实行抵抗，并将冲突的具体情况迅速公布。同时公开警告美方：美军如在该地区强行登陆，应对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硬态度，美军才被迫放弃了在烟台登陆的计划。但对早已在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控制之下的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美军则出于抢占交通要道进窥东北的考虑，于10月初在秦皇岛强行登陆，并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占了海阳镇和北戴河等地。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抗议，又强行修复秦山铁路，为帮助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作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是否进入东北，在国民党内部曾有过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但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后一派的意见。8月24日，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

^① 《中共中央应付华北美军活动给分局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10月29日。

近的工作”^①。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将东北划分九省两市，并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国民党为夺取东北，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以中苏条约为口实，争取“和平”取得东北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要求美国帮助其运兵到东北，以武力达到占领东北的目的。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希望派人于10日前到长春谈判，讨论东北接收事宜。10月9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飞抵长春进行联络。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如期到达长春，同机到达的还有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等。

国民党与苏联关于接收东北的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13日至20日，正式谈判三次，主要围绕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问题。10月13日下午，熊式辉同苏方代表马利诺夫斯基举行首次会谈。熊式辉提出，国民党军队将由海运至大连港登陆，为了维持东北大城市的治安，国民党将空运少量部队，分赴长春、沈阳各地。对此，马利诺夫斯基以大连港为自由港，空运部队至东北各大城市应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会谈于17日举行，熊式辉提出，国民党政政府可于11月上旬将两个军海运至大连登陆，另外两个军将经山海关陆运东北，要求苏联将山海关至沈阳的铁路及时修复，以便使陆运部队利用铁路运送。同时还提出，由东北行营派员赴各地筹编若干保安队。马利诺夫斯

^①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83—84页。

基当即声明，中国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须待苏军自该地区全部撤退之后，在此情形下苏军不可能掩护中国军队前进。并答复熊式辉，东北行营派员赴各地筹编保安队一事，须请示莫斯科之后方能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苏联大使馆之间，关于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问题，也在紧张交涉。10月1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甘乃光照会苏联：国民党第十三军将于10日左右乘美国军舰前往大连登陆。苏联立即答复，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作出解释。16日，蒋介石电令东北行营，坚决要求在大连登陆，同时积极恢复北宁路交通，准备陆路出关。19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国民党要求准许十三军在大连登陆并设立航空站，准许东北行营派员视察山海海关及沈阳铁路线。苏方答复：“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苏方不能同意。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条约。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设立航空站，大连因为是商港，我们不能同意，其他三处可以在苏联军队撤退前二三日设站。”^①在这次交涉过程中，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企图说服苏联在大连问题上让步，均没有成功。

第一阶段交涉失败，国民党认为不能消耗时间于辩论大连问题，而使东北全盘接收陷于停顿。决定放弃在大连登陆，改为要求在营口、葫芦岛登陆。10月26日中苏举行了第二阶段谈判的第一次会谈。国民党代表告知苏方：“中国军队在中苏两国政府没有商妥之前，暂时

^①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5页。

不在大连登陆，而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处登陆”^①。

10月27、28两日，国民党军队在葫芦岛实行登陆，发现已被八路军占领，被迫离去。29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飞抵长春，临行前，蒋介石指示他：“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指旅大、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②。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杜聿明与马利诺夫斯基达成协议。3日，杜聿明同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一起，乘美舰到营口与苏军联络。营口市民主政府负责人以市民代表，市长名义，与美蒋人员进行谈判，并据理驳斥了美舰有权在营口登陆的谬论，严词拒绝了美蒋登陆营口的无理要求。美舰无奈只好返航。11月5日，熊式辉与苏方再次会谈，熊指责苏方违反协议，马利诺夫斯基以攻占营口者为抗日军队，且营口苏军为数甚少，难以阻止中共军队活动为理由，进行反驳，谈判中断。苏联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企图用履行中苏条约的便利条件，先期进占东北的愿望化为泡影。

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登陆的计划均告失败后，蒋介石决定全部军队由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从共产党部队手中夺取山海关，由辽西走廊直接向东北开进。11月初，美国动用了几十条军舰，帮助国民党运送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参与指挥国民党部队向山海关进攻，帮助国民党部队抢占了北宁线上中共部队控制的留守营车站和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阵地。当时苏联的

^①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8页。

^②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页。

态度很明确，支持中共部队顶住美国支持下国民党部队向山海关的进攻。

11月初，已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达到了5万余人。当时据守山海关的是冀热辽部队李运昌部和部分刚刚赶到的山东七师杨国夫部，约8000余人。11月15日，中央指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枢纽”，“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待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后，“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①同日，国民党军在美国军大炮飞机的配合下，向山海关发起全面攻击。扼守山海关的杨国夫师和李运昌部顽强抗击，终因敌强我弱、兵力不敷分派，于11月16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攻占，接着，绥中、兴城、锦西数地亦在数日内被国民党部队占领。这时，赶到前线指挥作战的林彪认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惶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②。刚刚赶到辽西的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也认为作战条件不成熟，目前是“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战场极坏，以进行休整暂不作战为利^③。经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研究，认为林、黄意见符合

① 《中共中央给林彪、彭真的指示》，1945年11月15日。

② 《林彪给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45年11月22日。

③ 《黄克诚致中共中央电报》，1945年11月26日。

实际，决定放弃锦州作战。11月26日，国民党部队占领锦州，从此夺取了辽西走廊，打开了进入东北的大门。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又发动了外交攻势，中断了长春谈判，将谈判重心转移到重庆与莫斯科之间，由地方当局的谈判升级为国家关系问题，以引起国际关注。11月15日深夜，即国民党攻占山海关的前一天晚上，国民党谈判代表将撤退东北行营的决定，通知苏联政府，对苏施加外交压力。国民党军事和外交的攻势，使东北形势激化到了极点。

面对矛盾激化的斗争形势，苏联政府的态度开始变软，对国民党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靠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协商解决之事”^①。11月17日，苏联照会国民党外交部：“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在长春和沈阳降落，苏军将予应有之协助”，“如中国政府希望苏军缓撤，可延一月或二月”^②。接着双方反复协商了空运事宜。12月4日，国民党根据苏联要求，派蒋经国、张嘉璈为代表到长春即商定：苏军除保证国民党空运部队安全外，还将协助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开入沈阳。与此同时，苏军当局正式向东北局提出：中共所属机关和军队限期撤出沈阳、长春等沿中长路各大城市。苏态度软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使之不过于反苏，不过于追随美国，使国民党趋于中立并与苏联合作，达到遏制美国的作用。

^① 《蒋总统秘录》，第305页。

^②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47页。

此时，美国政府也感到形势过于紧张，害怕国共两党的矛盾激化后引起美苏间的冲突。11月初，美国驻华大使馆报告：“中国局势近于绝望，内战局面已经形成。11月下旬，来华视察形势的魏德迈悲观地指出：“苏美在东北和华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中国已成为美苏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下去，那么为蒋做的事要远较预想的为多。必须要卷入中国内战，甚至卷入对苏战争，而这将需要大批美军”^①。“只有由美国再次出面调停，促使国共双方成立联合政府，才可能扭转中国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②为了调整关系，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会上外长们讨价还价，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三国外长重申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美苏外长对双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③。12月15日，杜鲁门在给马歇尔的指令中提出，“关于中国人需要贷款，经济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时，你可以说，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实际上不可能被认为是在上列各方面取得美援的合适的地区。”^④以此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国民党配合美国外交政策。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蒋

① 《魏德迈报告》，第308页。

② 迈克尔·谢勒：《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157—158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第185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79页。

介石指示：“非有他的手令不准继续前进”^①。美国政府还决定召回赫尔利大使，派马歇尔使华，执行和平调停使命。

这是一场进一步深化了的三国四方复杂的斗争，反映在国际上是美苏之争，反映在国内是国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扶蒋反共遏制苏联。苏联的政策是疏远共产党，中立国民党，遏制美国。国民党的方针是联美反苏反共，反共时中立苏联，反苏时牵连上共产党。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谅解和配合苏联的外交行动，揭露和打击美蒋反共反苏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指出：“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美严重的外交纠纷，全世界的注目”^②，“因我党我军在东北之发展，蒋顽不能顺利进入东北，顺利接收东北政权，美方已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发生了危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斗争，必须首先取得主动地位，在外交上站稳脚步”，因此，我党或我军“必须迅速而坚决退到城外无红军驻扎之地区，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③。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独占东北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做出策略上的改变。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

①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24页。

②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1945年11月28日。

③ 《东北局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

大城市，我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①。11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②。随后又于29日电示东北局：将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交蒋介石接收，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以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及可能的优势”^③。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关键是成立东北民主联合政府，给中国共产党应有的重要地位。还声明：国民党部队开进东北的四条原则：“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进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在这四原则下，同意国民党部队开进东北。

三国四方经过一段又妥协又斗争，形成了一种暂时的格局。这种格局很快又为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所打破，

①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1945年11月20日。

② 《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指示电》，1945年11月22日。

③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1945年11月29日。

④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1177—1179页。

使东北出现了空前激烈的争夺和斗争局面。

四、共产党在东北战场的节节胜利和中苏关系

国民党军队于1945年11月26日占领锦州后到翌年3月13日进占沈阳前，东北战场上除发生营口、秀水河子和沙岭子几次较大战斗外，总体上还处于暂时相对平静时期。

1946年1月7日，国共双方各派出代表1人，与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调处3人小组，开始议定停战令。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颁布停战令，同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1月13日午夜24点，停战令正式生效。蒋介石竟然宣布“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公然拒绝与共产党谈判东北问题，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任何地位，对在东北的中共部队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于是，在谈判桌上，国共双方再度展开尖锐斗争。经过一番斗争，国共双方于3月开始东北停战谈判。国民党占领沈阳后，蒋介石一方面下令与共产党和谈，于3月27日签订东北停战协定（6月7日才生效），另一方面又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展，先后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4月上旬又继续向南向北进犯，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部队，实现独霸东北。美国在华驻军，不但没有撤退，而且向国民党政府派遣了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从此，破坏了莫斯科三外长定下的格局，开始了战争升级。

4月上旬，国民党军南攻本溪，北犯四平。为了发

动进攻，蒋介石将国民党部队8个军22个师调入东北。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通过和平谈判，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指出：由于国民党破坏和平，“藉口‘接收’领土主权，在东北举行对中共军队的公开战争”，“已使东北陷于内战状态”，为此，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在东北停止进攻，停止增兵”，“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马歇尔几经协商，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战方案。不久，马歇尔借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之机，转达了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若干要求。”^②建议被蒋介石拒绝后，中共中央发出保卫四平、本溪的指示，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面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③，才能求得和平。四平战役从4月18日开始，至5月18日结束，中共部队在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后，主动撤出了战斗。本溪战役，中共部队也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后，于5月2日主动撤出战斗，并于22日发起鞍（山）海（城）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184师一个团，该师师长潘朔端率两个团3000多人起义。这些战役，对扼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山东的中共部队也

^① 《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严正自卫立场的声明》，1946年4月13日。

^②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1946年4月29日。

^③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1946年5月1日。

在胶济、津浦线发起进攻，使蒋军不能继续增兵东北，无力在东北继续组织进攻，被迫于6月6日与中共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实际停战四个月）。至此，国民党军分散占领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中共部队大部分主力则撤至松花江北岸休整。本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分别在北满、西满、东满以及南满创建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的精神，东北局于7月3日至11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通过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会后，东北局派12000名干部下乡，^④彻底清剿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加强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了北、东、西、南满根据地的全面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南满进攻，推行所谓“南攻北守，先南后北”计划。中共部队，则以南、北满根据地为依托，坚持南满斗争，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这一战役从12月17日开始到1947年4月3日，历时四个月，胜利地粉碎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计划，歼灭国民党军43000余人。中共部队开始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转入了战略反攻。接着，中共部队在东、西、南、北满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下，从1947年5月起发起了夏、秋、冬三季攻势，到1948年3月结束，收复城市74座，使东、西、南、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国民党军被歼305000余人，其余的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狭小

地区。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国共两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最后决战——辽沈战役拉开了战幕。10月15日，锦州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19日长春宣布解放，11月2日，沈阳、营口同时解放。至此，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取得了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全国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同时也是与苏联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在三国四方的复杂斗争中，苏联政府虽然存在着外交上履行国际条约的严重困难，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得到了苏联政府、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各种方式的援助。陈云同志在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指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①。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一方面教育干部和党员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②；另一方面，也尽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① 陈云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第2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第35页。

自1945年11月至1948年11月这段时间内，“东北与苏联三年以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东北是苏联红军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解放的；红军在东北驻防，使我们能抽出力量在乡村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同时根据中苏条约规定，旅顺又是苏联驻防地区，这样把守住海口，阻止了国民党从旅大的侵入。由于东北与苏联唇齿相依，数年来东北首先接收了苏联以兄弟的关系给予我们许多有力地帮助，如通过贸易，帮助解决了通讯、军工、运输、服装的困难，增加了我们进行解放战争的物资力量；派遣了铁路、工业、防疫、医疗的专家；供给了锄奸情报”^①。因此，在战后东北问题上，应从历史实际出发，既要看到苏联政府在各种国际协定及对待中国共产党态度上的错误作法和主张，同时也应承认苏联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援助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国四方战后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由于一贯地反共反人民，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政府战后初期，对远东和平和调解国共两党关系，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它的政策在本质上是扶蒋反共的，最后是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政策，也不得不宣告失败。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胜利，同时，也应该承认苏联政府和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贡献。

^① 《东北局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1949年6月11日。

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概述

师文华 卢海明

太岳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创建的，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创建于1937年，结束于1949年，经历了十二年的战斗历程。

太岳革命根据地刚刚开辟时，没有固定的范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包括白晋公路以西、同蒲铁路以东、曲高公路以北的太岳区；白晋公路以西、同蒲铁路和汾河以东以南、曲高公路以南、黄河以北的晋豫区（即中条区）；白晋公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邯长公路以南、黄河以北的太南区。在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它的范围有时缩小，有时又扩大。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太岳区的范围又包括了汾南地区（汾河以南、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的三角地带），并一度发展到洛宁以北的豫西地区。但它的基本地区，是同蒲铁路及汾河以东以南、白晋路以西、黄河以北的三角地带，辖四十个县，拥有人口二百万，面积达十二万九千七百平方里。

太岳革命根据地处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西端，东与太行革命根据地相邻，西与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接壤，南隔黄河与中原相望。它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西部屏障，又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桥梁，还是飞渡黄河、问鼎中原

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它为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一)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接着，日军在华北分四路向中国内地进攻：一路由平绥路、同蒲路进攻山西，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一路由胶济路、津浦路进攻山东，一路沿平绥路进攻绥远。他们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为了抗日救国，1937年8月底至10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陆续分别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依托山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太岳、晋豫地区的工作方针，作了一系列指示。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根据华北敌我情况的变化，为战略上处于机动地位，应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同时，为真正进

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八路军本身起见，拟取新的战略部署，要求一一五师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9月24日，毛泽东在致博古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一二九师在战略上应该位于太岳与吕梁山脉。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吕梁山脉，一二九师先活动于正太路南侧，后进入太行山脉，创造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根据地；而由决死一纵队，开到了太岳山区。

193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由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以合法形式组织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在薄一波的指挥下开赴五台地区。在那里，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指示薄一波率领决死队去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决死队到达沁县。不久，薄一波担任了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称督察专员），领导沁县、沁源、安泽等16县的地方政权工作（次年2月缩为13个县）。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带领安子文等，也到达沁县，并于次年2月初建立了由中共冀豫晋省委统战部长安子文为主任的省委沁县办事处（对外称八路军联络处），领导武乡以南地区党的工作，并协助薄一波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4月5日，洛甫、刘少奇致电彭德怀，要求薄一波以行政主任的名义，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

抗日根据地的问题；5月4日，又指出：“设法使薄一波之行政主任公署与总部、朱瑞靠拢，并推动薄从事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及群众运动之改进与统一。”后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到了沁县，又对薄一波、安子文明确指示：现在八路军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就由你们决死队、第三行政区来支持。这样，在党的领导下，薄一波以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和决死一纵队政委的名义，担负了开辟晋东南地区根据地的任务。

在晋豫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于1937年9月间到达河南新乡，做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统战工作，后与豫北师管区合作，培养抗日干部和发动群众，并担任了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11月间，朱瑞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在焦作建立了以张萃中为书记的中共直鲁豫边省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于次年3月建立了由聂真任书记的中共晋豫边特委，领导曲高公路以南、黄河以北、同蒲路以东、白晋路以西17县党的工作。

1938年3月5日，朱瑞将晋豫边工作布置的情况电告中央，毛泽东于3月6日回电称：“部署甚妥”，并指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4月，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成立。在此前后，山西决死三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相继开赴这个地区。1938年6月，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戎子和（戎伍胜）担任了山西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领导

12县的政权工作。

在太南地区，1937年9月由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建立了以赵世珍（后裴孟飞）为书记的中共长治特委（后称晋豫特委、晋东南特委，1938年5月改为太南特委），开始领导上党地区11个县的党的工作（后缩小为6县，1938年5月扩大为晋东南和豫北17县）。1938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补充团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先后南下修武、焦作沿山一带，与赵（基梅）涂（锡道）支队一起开辟了太南及道清路沿线地区。同时，在朱瑞领导下成立的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也活动于太南的修武、博爱、武陟等县。6月，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部队在陈赓率领下开赴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的豫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活动，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在安阳、林县、辉县、博爱、沁阳等地开创抗日根据地，并在修武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县长的第一个抗日县政府。

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地区发动了九路围攻，在朱德、彭德怀指挥的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的指挥下，八路军、决死队和驻该地的国民党军一起，以“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气概，与敌激战半月，消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粉碎了日军的这次进攻，保卫了新建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沁县办事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由安子文任书记的中共太岳特委，领导白晋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曲高公路以北12县党的工作。9月，特委在沁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总结了太岳根据

地创建以来的工作，指出：“太岳区已突破在开辟时的一切困难，从艰苦创造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并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建立太岳一带为强有力之根据地。”同时，5月和9月，中共晋豫特委也召开了两次活动分子会议，提出了“使全区工作走上更深入巩固平衡成熟的更高阶段”的任务。10月，中共晋冀豫区委和中共太南特委联合巡视团，巡视了太南各县的工作，提出太南全区的紧急任务是：猛烈开展党与群众运动，深入根据地的工作，巩固晋东南，加强豫北，使其成为坚持华北抗战中有力的战略支点。

此外，1938年春日军打通同蒲路南段以后，山西第六行政区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裴丽生为主任的河东办事处，领导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五县河东地区的行政工作，次年5月，党的工作归太岳特委领导。在三、五、六、七行政区的许多县，由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以牺盟会、决死队的身份担任了县长，建立了这些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至此，太岳、晋豫、太南三个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共辖46个县，即：太岳区辖沁县、沁源、安泽、屯留、长子、平遥、介休、浮山、洪洞、赵城、灵石、霍县共12个县；晋豫区辖晋城、阳城、沁水、翼城、绛县、曲沃、闻喜、夏县、垣曲、平陆、芮城、安邑、永济、解县、沁阳、济源、孟县共17个县；太南区辖长治、潞城、黎城、壶关、陵川、平顺、林县、安阳、汤阴、汲县、淇县、新乡、辉县、修武、获嘉、博爱、武陟共17个县。

(二)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此后，日军改变了它的策略，对国民党实行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把主要力量逐渐转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初到1940年春，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治安肃正”讨伐作战。同时，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并加紧推行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分裂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太岳区、晋豫区和太南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加强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1939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薄一波、戎伍胜出面，在沁县召开了“晋东南各县拥护蒋委员长大会”（简称“拥蒋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晋东南军政民团结统一的大会。会后，晋东南地区农、工、青、妇、文等各界救国总会纷纷成立，抗日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

根据形势发展，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的晋东南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山西

三、五专署和决死一、三纵队的党的工作。在此前后，5月、8月和11月，中共晋豫、太岳和太南地委，分别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对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反顽斗争，以巩固根据地、加强敌占区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并于秋天在平陆县建立了以李哲人为书记的中共中条地委。

阎锡山为适应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需要，于1939年12月，在山西发动了反对牺盟会、决死队的反动事变。从12月14日至27日，沁水、阳城、晋城、浮山等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杀害者达200余人，被绑架者500多人，仅决死三纵队就损失3500余人。1940年1月4日，国民党四十七军又制造了“土岭事件”，包围袭击晋沁阳三县联合办事处，晋城牺盟特派员丁文法等英勇牺牲。

为了粉碎蒋、阎军的军事进攻，1940年1月，八路军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在陈赓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地区，统一指挥决死一纵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打击了向张店进攻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并协同太行部队消灭了阎锡山的暂二旅和新二师，保卫了太岳根据地。接着，活动在晋西南的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以及公开了的牺盟干部和地方干部，经过与日顽的斗争，转移到了太岳区。同时，在晋豫和太南地区，八路军新编第一旅在一二月间，击溃了阎锡山的独八旅和国民党的黎明游击队，粉碎了蒋阎军的进犯。

为了适应反顽斗争的新形势，加强对反顽斗争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自1940年1月起，太

岳、晋豫和太南地委，分别升级为太岳区党委、晋豫区党委、太南区党委，分别由安子文、聂真、张玺任书记，统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同时，太岳区在沁县成立了以裴丽生为主任的山西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第六专署河东办事处同时撤销，所辖5县归三专署路西办事处领导。

为了避免磨擦事态的扩大，以利团结抗日，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于1940年4月在晋城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划分抗日驻军防区的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队的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的驻防区，简称漳河为界。根据这次谈判的协议，八路军和决死队主动撤出了岳南、晋豫和太南的林县、陵川、长治、壶关、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土地。此时，中共太南区党委和晋豫区党委合并，称中共太南区党委，以平顺为中心，领导太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在党组织能公开活动的平顺、平北、长治东部、潞城、壶关北部及河南林县北部地区，建立了以王孝慈为书记的中共平顺地委，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此外，中共太南区党委还领导着5个秘密地委的工作，即中条地委（书记先后为李哲人、薛涛、席荆山）、晋豫一地委（书记先后为张晔、刘乐三）、晋豫二地委（书记米光华）、晋豫三地委（书记王一飞）、晋豫四地委（书记王毅之）。

从此，在太岳、晋豫和太南地区，结束了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在太岳地区，山西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为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辖沁县、沁源、屯

留、安泽、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等县，并新设了襄漳县、岳阳县，共13个县；在太南地区，太南专员公署为行政领导机构，辖平北、壶关、潞城、林北、长治东部、平顺等6县。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和打击“囚笼”政策的方针，之后，中共太岳区党委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根据黎城会议的精神，决定了建设太岳根据地的新方向，即：第一，克服过去工作上各不相关、重复错杂的现象，统一全区军政民的领导，统一军事指挥，统一建设计划，统一财政收支及粮食供给。第二，克服草创时期的紊乱现象，树立正常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正常的政治设施，建设正规的国民教育，确定党政军民各个的编制，建立预决算，严格各种工作制度。第三，根据党的政策，确定今后政权组成部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治，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团结一切抗日人民，把太岳区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第四，面向日军，开展对敌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上的全面斗争，在一切为了抗战胜利，一切为了长期斗争的原则之下，奠定我们永久的军事阵地。根据这个新方向，联席会议通过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建设的任务和工作。

接着，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进行了整编。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参谋长周希汉，辖七七二、十六、十七、十八团，隶属一二九师领导。决死一纵队纵队长兼政委薄一波，辖二十五、三十八、四十二、五

十七、五十九团以及二一二旅，隶属十八集团军总部领导。5月，成立了太岳军区，由三八六旅兼，陈赓兼司令员，王新亭兼政委，周希汉兼参谋长。接着，在5月间进行的白晋战役中，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担任白晋路南段的破击任务，将牛寺至段柳段的70余里铁路和公路彻底破坏，为巩固根据地，继续进行交通斗争打下了基础。7月，在陈赓同周希汉的指挥下，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部分主力部队，又在安泽晋家山发动了打击进犯的阎锡山六十一军的战斗，毙伤阎军800余人，俘虏旅长高金波以下500余人，有力地保卫了太岳根据地。

同时，在太南平顺地区建立了军分区（由石志本任司令员），以韦杰任旅长、唐天际任政委的新一旅，也主要在这一地区活动。太岳各县的工作开展得也比较活跃。

在此期间，太岳区党委于1940年5月召开了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会议，接着在全区进行了第一次整党。同时，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召开了首届县长联席会议，确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及纲领，部署了切实执行人权保障条例、整理财政、推行累税制，开展民主村选运动等几项基本工作，以及发展工业生产、开展合作社运动，统制贸易，巩固本币等经济建设工作。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

1940年8月至年底，太岳军民全力以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太岳部队十六团、三十八团、七七二团首先胜利地完成了正太路西段的破击任务，同时留在本区的部队在广大人

民群众的参加与支持下，在同蒲、白晋两线进行大小战斗132次，歼敌622人，伪军89人，俘虏伪军64人，彻底破坏了白晋路权店至虢亭、同蒲路灵石至洪洞段。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太岳部队参加了榆辽战役，收复了榆社城，攻克了王景等据点，并配合兄弟部队在武乡关家垴地区设伏，歼敌300余人。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太岳部队担负了掩护总部转移的任务，并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和太行部队一起组织了有名的“关家垴歼灭战”，激战两昼夜，歼敌400余人。同时，太岳区军民经过大小23次战斗，粉碎了日军分10路向太岳区进行的第一次毁灭性的扫荡，击毙日军500余人，伪军60余人。“百团大战”之后，太岳部队遵照一二九师命令，于12月至次年1月，先后开始整训，同时进行了建立人民武装。加强军区建设等工作，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经过反顽斗争和百团大战，经过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有力地巩固了太岳革命根据地。

(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为了把中国变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总力战”。在此期间。从1941年9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对太岳区发动了4次毁灭性的大扫荡，妄图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同时，阎锡山军队也不断向太岳区进行

攻击和骚扰。在这严重的形势下，太岳区日益收缩和变小，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及“百团大战”中太岳部队的严重消耗，使太岳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

为了扭转严重困难的局面，太岳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太岳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一面坚持原有的根据地，一面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开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1月，决死一纵队接替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同时加强了各军分区的组织机构，充实了分区的基干武装（到8月，决死一纵队和三八六旅组成太岳纵队，又由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2月，山西第三专署由太行区移住太岳区腹地沁源县赵寨村，成了太岳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通称“太岳专署”），由薄一波任专员，裴丽生任副专员。6月以后，太岳专署陆续建立了三个办事处。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撤销了太岳专署及所辖三个办事处，建立了以牛佩琮为主任、裴丽生为副主任的太岳行署和七、八、九三个专署。在此之前，太南平顺地区划归太行区，中共太南区党委改称晋豫区党委，主要领导边沿地区党的秘密工作。从此，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日臻统一和完善。

1941年5月，日军调动5万余人向黄河北岸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20余万人被打得溃不成军；不到20天丧失5万余人，其余大部渡过黄河南撤。中条山战役之后，该区敌人据点林立，伪军、伪组织蜂起，旧政权全部垮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为了解放岳南人民，发动与组织群众坚持抗日斗争，根据一二

九师命令，决死一纵队之五十九团和三八六旅之十六团，于6月初先后进入岳南地区；同时二一二旅也进入浮山、安泽南部地区，汾东支队开赴冀氏地区，随军南下的八路军、决死队和第三专署组织的工作团，在岳南地区分区进行建立政权、收容散兵、组织地方武装等各项工作。在此前后，中共晋豫区党委于5月23日和6月20日，连续发出关于晋豫区形势、任务和策略的指示，提出了配合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和将晋豫区创造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开辟晋豫工作的指示信，分析了苏德战争进入持久阶段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和中条战役后中条区的复杂形势，指出：开辟这一地区的任务在于创造根据地，开辟这一地区的方针是采取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早过分刺激敌伪，有计划、有步骤巩固与依靠已有阵地、灵活机动再求开辟进展的基本方针。在开辟岳南的过程中，太岳部队二一二旅和十六团、五十九团于8月13日向进犯二一二旅的阎锡山四十三军进行了反击，攻入其驻地浮山县赵城村和西马村。四十三军之二〇七团和二〇八团除战场伤亡外全部缴械，并俘虏二〇七团团长高翹以下760余人，岳南局面随之打开，建立了以时逸之为主任的太岳行署岳南办事处和以韩柏为书记的太岳四地委（也称岳南地委）和以孙雨亭为负责人的第四军分区。同年底，又建立了高平、冀氏、沁水、浮山、青城（新设县）、临襄等7个县的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扩大了太岳根据地。

坚持岳北、开辟岳南，是在对敌斗争中进行的。1941

年9月，同蒲、白晋线上的日军2万余人，分14路向岳南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太岳部队虽处在横宽不到60里和群众尚未发动、政权尚在初建的岳南新区，但在岳北军民的配合下，进行了大小10余次战斗，毙伤敌伪官兵500余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岳南部队主力的企图。10月，岳北军民又粉碎了日军对岳北地区“铁壁合围”大扫荡，毙伤敌伪官兵860余名，保卫了岳北根据地。

1942年1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指示太岳军区派部队南下，重新开辟中条地区，建立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给中共晋豫区党委发出同样内容的指示，于是由王新亭、聂真率十七团、十八团、五十七团（大部）及三八六旅直属队一部，和晋豫区党委机关，共2000余人，组成了南进支队，执行开辟中条山、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南进支队在中共晋豫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打击敌伪，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开始了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此时，日军先后向岳北和岳南地区发动了春季扫荡，实行“捕捉奇袭”、“分区抉剔”、“辗转清剿”等方法，妄图彻底摧毁根据地一切人力、物力，消灭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太岳区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太岳部队在岳北进行了34次战斗，在岳南进行了12次战斗，终于先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同时，太岳部队还进行了反顽作战。4月15日，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有三八五旅（太行部队）、三八六旅、决一旅、二一二旅10个团的部队参加，向进犯太岳区的阎锡山六十

一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俘虏阎军665人，毙伤392人。

在此期间，太岳南进支队在中条地区，对日伪军和当地的土匪武装进行多次斗争，打击了敌伪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于4月成立了由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治委员的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简称“豫晋联防区”），建立了以郭清文为主任、吸收各方代表和士绅参加的“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豫晋联办”），并陆续设立了3个专区，建立了3个公开地委和3个军分区。5月，中共晋豫区党委在阳城上河村召开高干会议，总结了开辟中条区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使中条区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正在晋豫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变中条区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基本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量地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并指出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但决定的因素是武装的力量。从1月到6月底，豫晋联防区的部队对敌、伪、顽、匪作战56次，粉碎了敌人的5月扫荡，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控制了20余万人口的地区，到7月底，先后建立了阳城、翼城、沁水、绛县、晋城、垣曲、济源等7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开创了南北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的一大块地区。从此，岳北、岳南、中条联结起来，为尔后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及开辟豫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2年5月，日军对岳南区发动了“夏季扫荡”，10月又对岳北区发动了“冬季扫荡”。同时，对根据地实行“蚕食”，在游击区强迫建立“维持会”，加紧对人民

行的统治。因此太岳区军民除对付敌人的扫荡以外，还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实行“两面政权”的策略，组织武工队，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加强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工作，并对深入腹地的敌人，进行了群众性的围困斗争。特别是1942年11月开始的对占领沁源敌人的围困斗争，一直坚持了二年多，终于挤走了敌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年3月，邓小平视察了太岳区的工作，就财经工作、群众工作、三三制、武装工作、对敌斗争以及领导问题等，作了具体指示。在视察晋豫区时，指出中条区的任务是努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坚持中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0月，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路过太岳区时，对太岳区的工作，特别是对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这些对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同时，太岳区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开展了民主选举参议员的活动；执行了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裁减各种工作人员1/2，减轻人民负担1/10；贯彻了中央土地政策，进一步实行了减租减息；还进行了时事教育，开始了整风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太岳区党委与晋豫区党委合并，同时决定合并成立太岳军区和太岳行署。两区的合并工作随即开始，一直到1943年春结束。

太岳区军民经过二年的艰苦奋战，渡过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对敌伪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各项建设工作都逐渐恢复，不仅坚持了岳北地区，而且扩大了

岳南地区，还开辟了中条地区。两区合并后，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完全实现了统一，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

1942年底至1943年初，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43年春开始，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逐渐好转，到1944年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1月至2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河南涉县下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工作，讨论了扭转困难局面的各种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确定了具体任务，决定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大力开展敌占区工作；还决定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深入进行整风、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主力兵团地方化、地委、军分区以上机关进一步精简合并等问题。

太岳区和晋豫区的合并工作于3月全部完成，合并后的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副书记聂真，辖四个公开地委，并辖只进行秘密工作的条西地委（五地委）和修（武）博（爱）地委、晋（城）北地委，不久修博地委、晋北地委划归太行。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辖5个军分区；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副主任裴丽

生，辖四个专署（1944年8月又建立了5专署）。因经过精兵简政，调整合并了若干县，此时全区共30个县。即一专署，由岳北3个小专署合并，辖临屯公路以北（亦称岳北）之沁县、襄漳、屯留、绵上、沁源、安泽、平遥、灵石、介休、霍县、赵城11个县；二专署，辖临屯公路以南，曲高公路以北，沁河以东之高平、长子、晋城、冀氏、士敏等5县；三专署，辖临屯公路以南、曲高公路以北，沁河以西之洪洞、临汾、襄陵、浮山、青城等5县；四专署由原豫晋联办组成，辖阳城、沁水、曲沃、翼城、绛县、垣曲、王屋（新设县）、孟县、济源等9县。后来，又新建了五专署，辖夏县、闻喜、康杰（新设县）、安邑、平陆等县。1944年2月，原系晋西南工委领导的汾南工委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汾南工委并入五地委；1945年2月，晋西南工委领导的乡吉特委，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划归吕梁区党委领导），全区面积达十二万九千七百平方里，人口达二百万。

太岳、晋豫两区的合并，和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1943年春，中共太岳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春耕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和推动减租减息工作。各地委、县委、区分委的负责人，也都深入基点村，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丈量土地，实行合理负担，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改造党的基层组织 and 群众团体。6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在安泽县桑曲召开了群

众工作会议，薄一波作了《太岳群众运动的新阶段与今后工作方向》的总结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要进一步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要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减租减息，并把生产运动开展起来。群众经过减租减息运动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在救灾渡荒和生产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同年春夏时期，太岳区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禾苗、蔬菜大部枯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为了渡过灾荒，除在重灾区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进行赈济工作外，还大力开展了生产运动，并于9月召开了生产会议，全区机关和军队也开展了以开荒为主的生产大运动。

与此同时，针对日军加紧清乡、蚕食、扫荡，增设据点，扩大“维持”，抢劫粮食的实际情况，太岳区军民开展了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在腹地沁源县，加紧了对敌人的围困和袭扰，并广泛召开反维持大会，共同制定了“村村不维持，家家不维持，人人反维持”的共同行动准则。6月，太岳军民又开始进行了保卫夏收，反对敌人抢粮的斗争，打击了敌人的抢粮计划，取得了护粮斗争的胜利。

10月，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的日伪军20000余人，对太岳区实施了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的大扫荡。日伪军分为三个梯队，从同蒲路到白晋路，由岳北向岳南、中条，反复滚压清剿，妄图把太岳区一举摧垮。在陈赓的指挥下，太岳部队除留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根据地周旋外，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15日和28日，日军先后扫荡岳南区和中条

区。24日，太岳二分区部队十六团在洪洞韩略村伏击日军由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除3人逃跑外，180余人全部被击毙（内有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和6名联队长），烧毁汽车3辆，这对日军的“铁滚扫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10月1日到12月2日，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太岳部队作战725次，攻克据点14处，毙伤日军1580余人、伪军1310余人，伪人员80人。从此以后，日军即再没有能力对太岳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了。

同年底至翌年春，日军为了加强其太平洋战场的力量和向国民党战场发动新的进攻，从晋冀鲁豫边区周围抽调了大部兵力，在敌人撤退据点、集中兵力之机，太岳区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1944年2月开始对日军发动了攻势，展开了局部反攻。太岳军区十七团和七七二团，根据中共太岳区党委上年12月作出的《关于开辟条西工作的决定》，奉命开赴条西，协助五分区部队开辟和巩固条西根据地。4月，太岳二、四分区部队收复沁水县城；同时，根据毛泽东、朱德关于向河南发展的战略意图，太岳区党委、军区调派三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刘聚奎，指挥四分区十八团和基干二团，挺进豫北地区作战，并于6月建立了以刘聚奎为书记的豫北工委，担负开辟豫北地区的任务。至9月，以十八团和基干二团为主，组织了第一次豫北战役，经过三个阶段作战，消灭伪军1200余人，建立了济源、王屋两县的6个区政权，使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北起王屋山、南至黄河边约10500平方里的土地得到解放，解放

人口10万以上（根据地8万，游击区2万），切断了济（源）垣（曲）公路之垣曲至小店段，控制了芮村、蓼乌渡口，为我军南渡豫西创造了条件。1945年3月底至4月底，刘忠、陈康指挥太岳部队二十团、十七团、七七二团三营、晋南独立营、回民支队等部队，在太岳三、四分区部队的协同下，又进行了第二次豫北战役，歼灭伪军2800余人，伪军反正1700余人，收复据点40余处，太岳部队控制了除日军扼守的济源、沁阳、孟县、冶戌等孤立城镇以外的广大乡村，进一步打开了豫北局面，建立了济源、沁阳等抗日县政府。

1945年3月，根据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决定，沁源县党政军民总动员，对困守沁源城关和交口之敌发动了总围困。到4月11日，困守沁源之敌狼狈逃窜，沁源县8万军民坚持两年半之久的围困斗争胜利结束。同时，阳南、阳北地方武装和民兵，开始围攻阳城县和阳城境内的白桑、封神庙、安阳、黄龙庙、后则窑等据点。陷入四面楚歌的日军，被迫于4月13日逃窜，阳城县宣告解放。

在我军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的同时，阎锡山六十一军却于1944年1月再次东渡汾河，向太岳区发动了猖狂进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就如何对待国民党六十一军进攻的问题，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岳北系我基本根据地。是延安与冀鲁豫及华中交通孔道，不能让阎部深入，因此必须给阎东侵部队以严重打击，歼灭其一部。对已深入岳南之阎部，目前尚不利于给以打击，但如继续向东侵犯，有腰斩太岳之虞，亦须给以必要打击。3

月20日，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等秘密和驻临汾的日军六十九师团代表签订《协定书》，此后，和日军密切配合，继续不断向太岳区进攻。为坚持抗战，保卫太岳抗日根据地。太岳部队于4月至7月发动了第一次青（城）浮（山）战役，歼灭阎军一个师，毙伤阎军2766人，生俘1070人（包括1月阎军东渡后被歼部队在内）。9月8日至18日，太岳军区和太行部队12个团，在汾东支队和各县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又发动了第二次青浮战役，攻克村落14处，毙伤日军13名，阎军2418人，生俘阎军1532人（内将级军官6名）。这两次青浮战役，共歼灭阎军7000余人，使阎锡山开展汾东的新战略遭到彻底破产。

在此期间，中共太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制定了1943年的整风计划，重新布置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对改造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和反对主观主义、改变工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在太岳区党的建设上有重要意义。但在审干中套用了延安“抢救运动”的错误作法，发生了“左”的扩大化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于9月13日发出指示，要求“对于弄错者彻底平反，对弄重者给以减轻，以便取得更多的经验后再去工作”。据此，审干工作于9月18日停止。11月进行时事教育，12月开始进行甄别。不久，区党委代理书记聂真在区党委党校作了审干问题的总结报告，代表区党委检讨了审干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同时，太岳区普遍进行了选举参议员的活动，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1945年3月3

日至13日，太岳区参议会在士敏县^①郑庄举行，牛佩琮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说明了太岳区发展的情形，总结了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救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并经过民主选举，选举牛佩琮为太岳行署主任，裴丽生为副主任。

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太岳区人民在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号召下，生产运动更加波澜壮阔。1944年全年扩大耕地面积28万亩，增产粮食14万石，太岳部队开荒种地58000多亩，产粮25400余石，产菜400多万斤，同时，全区发放了大量贷款，组织群众以工代赈，并发展了互助组，终于渡过了灾荒，这就从根本上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年1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在士敏县郎壁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全区的首要任务是扩大解放区，开展边沿区工作，加强对敌斗争，并要求进一步发动全区群众，加强经济工作，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城市工作，这次会议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抗日战争开始了全面反攻，11日，太岳军区发布了对敌伪反攻的命令；14日，太岳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紧急指示；15日，太岳行署向全区人民发布了动员令；16日，太岳军区又制定了反攻作战的具体方案。8月下旬，太岳区部

^① 武士敏（1892—1941）：国民党爱国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于1941年9月28日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这位国民党将领，特于沁水县东，设立士敏县。

队立即出动，向平遥地区之敌发动了进攻，同时各分区部队也立即开始了反攻作战。接着，太岳部队根据中央军委8月26日指示，向同蒲路发动攻击，重点进攻同蒲路南段。全区的广大民兵和民工，踊跃参战支前，走上了大反攻的战场。经过大反攻作战，太岳区军民切断了同蒲路，控制了平陆、垣曲间的黄河渡口，解放了8座县城及广大乡村，扩大了太岳解放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转化为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而中国人民为了建设新中国，则用极大的力量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准备内战与反对内战，成了斗争的中心。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又派出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17日，国民党阎锡山以5个师17000余人的兵力，向太岳革命根据地及上党地区大举进犯。

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之前，指出晋冀鲁豫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部署晋冀鲁豫军区集结太行主力，以太岳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2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

太岳、太行、冀南三区之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1000余人，于9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上党战役于9月10日正式发起，至10月2日结束。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有：太岳部队三八六旅之七七二团、二十团、士敏独立团和决一旅之二十五团、三十八团、五十七团等，歼敌14000余人，俘获了阎锡山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将领，此役给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粉碎了阎锡山摧毁太岳、太行根据地的企图，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1945年10月23日，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太岳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第四纵队（通称“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王鹤峰，参谋长刘忠，辖十旅（原三八六旅）、十一旅（原决一旅）、十三旅。同时，太岳军区也作了调整，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参谋长邓士俊。

为了配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发起的邯郸战役，太岳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于10月26日在霍县、赵城地区发起了对阎锡山军队的作战。12月25日，太岳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又开赴浮山翼城地区作战。这两次作战合称“同蒲战役”，直到1946年1月13日结束，共歼敌8000余人，先后解放了赵城、翼城、侯马、高显、蒙城、东镇等城镇，控制了同蒲铁路南段220余华里地区，斩断了蒋阎军的南北联系，打破了胡宗南沿同蒲路北上的企图。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减息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为贯彻此指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十日在河北峰峰召开了第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中共太岳区党委于11月8日至12月3日召开了有各地、县委书记参加的群众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的精神，决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从此，太岳区普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运动。12月18日太岳行署也根据峰峰会议的精神，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把全区划为四个专区，撤销了第二专区，将原第三专区改为第二专区，第五专区改为第三专区。地委和军分区的划分也作了相应的转变。此时，太岳区共辖34个县，即一专区辖10个县：沁源、安泽、屯留、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长子等；二专区辖9个县：冀氏、洪洞、浮山、绛县、临汾、襄曲、翼城、曲沃、沁南；三专区辖7个县：安邑、夏县、平陆、闻喜、稷山、稷麓、新绛；四专区辖8个县：晋城、阳城、高平、士敏、垣曲、济源、王屋、孟县。同时，为了开展豫西的工作，中共太岳区党委建立了豫西工委，做黄河以南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10日下达了停战令。停战令生效后，太岳部队严守军事分界线，履行停战协议，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但国民党、阎锡山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则加紧破坏停战协定。国民党九十军五十三师等部3000余人从孟津北渡黄河，于1月15日占领孟县城。19日，阎锡山令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部之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指挥3个师，由临汾出动，沿同蒲路南犯，企图驱逐太岳部队于曲沃以东，夺取同蒲路南段。2月4日，阎锡山部第七集团军

司令赵承绶率8个师，在日军第十四旅团的配合下，由祁县东观镇出发，沿白晋路南犯。24日又将霍县以北的同蒲路与正太路的守备任务交给日军，以抽出护路部队到白晋路进行内战。同时，阎锡山运用大量伪军、地方团队和特务武装，袭击、蚕食、破坏和封锁太岳区边沿的村庄，捕杀村干部和民兵，破坏群众翻身运动，逐渐扩大其统治区。

对于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向太岳区的进犯，我们在停战执行小组内进行了坚决揭露和斗争，并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奋起自卫反击。1月19日晋冀鲁豫野战第三纵队第七旅在孟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歼敌五十七团，孟县城全获解放。接着，晋冀鲁豫野战第四纵队在曲沃地区对敌高倬之部发起反击，歼敌5000余人，生俘山西省防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刘谦以下3000余人，迫使敌于2月14日在侯马执行小组举行的临汾会议上签订了《临汾停战会议临时协议》。3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第五纵队和太岳、太行部队发起白晋线自卫反击作战（也叫东沁战役）。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率领二十三旅、二十四旅和十七师，担负了西线作战任务。此役历时半月，歼敌4000余人，赵承绶被迫在《东沁协定》上签字。

太岳区军民与国民党、阎锡山在履行停战协定、争取国内和平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练兵、减租和生产作为最主要的三项大事来抓。在1946年上半年，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分期分批集训了干部，各部队开展了练兵运动。全区农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歼、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

里收回土地。到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又把减租减息运动发展为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太岳区军民又掀起了大规模空前的生产运动。

但是，国民党对太岳区的进犯，一直没有停止。自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起至6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太岳区进攻达647次之多，使用兵力总计达178600余人，侵占村镇150处。内战危机十分严重。

1946年6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的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深入基层，亲自动手，进行反内战的备战动员工作。在政治方面，召开誓师动员大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蒋军必败、人民必胜的前途；在组织方面，实行战时体制，根据一切战时化、战斗化的要求，调整部队组织，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健全医疗、兵站、运输等机构；布置全区扩军工作，整顿民兵组织，健全各地武委会的领导，并加强了县、区、村三级指挥部，建立了战时秩序，强化了除奸防谍和戒严工作，在战区和敌区实行了空室清野。为了加强战备工作，在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各地委的领导下，组成了由党政军民领导干部参加的后方指挥部，担负动员群众参战。保障战争的供应、运输、救护伤员和维护交通秩序等战勤任务。从而使全区迅速地掀起了全民武装总动员的高潮，为人民解放自卫战争做了胜利的准备。

(六)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调动30万重兵，向中原解放区的鄂东宣化店地区发动进攻，打响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枪。接着便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7月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6个旅在其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董钊指挥下，与同蒲路南段的阎锡山部暂编三十九师、七十二师等7万人相配合，向太岳解放区之晋南地区大举进攻，企图在一个月內打通同蒲路南段，席卷晋南，寻歼太岳部队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然后再与阎锡山军队会攻上党，策应其主力向平汉线进攻。面对阎胡部队的大举进犯，晋冀鲁豫野战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在同蒲路南段担负了战略性的重要任务：既阻止国民党军阎、胡部队打通同蒲路，又保卫太岳、太行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直接策应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

为了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从1946年7月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归中共中央军委指挥。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从1946年7月中旬开始，投入了人民解放自卫战争。到1947年7月为止，在晋南地区六战六捷，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整个山西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6年7月13日开始的闻夏战役，历时10余天，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3600余人。8月14日至9月1日进行的同蒲中段战役，历时17天，歼灭国民党阎锡山部12000余人，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5座县城。9月22日至24日的临（汾）浮（山）战役，全歼胡宗南所谓“天下第一军”第一旅，毙敌

2000余人，俘敌中将旅长黄正诚以下2500余人，并歼援敌1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中央曾嘉奖此次战役是“出乎意料之外”。1946年11月27日，为保卫延安，又进行了晋西南战役，至1947年1月2日结束，歼敌16000余人，解放县城集镇30余处。1947年1月17日到28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二十四旅和吕梁部队发动了汾孝战役，歼敌16000余人。4月4日至5月12日，发动了晋南战役，历时39天，歼敌22000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5座，解放了晋南3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控制了同蒲路南段460华里，将残敌压缩于运城、安邑、临汾三个孤立据点内，使晋南局势起了根本变化，直接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奠定了晋南前线部队向黄河以南转入战略进攻的基础。

在自卫反击战争六战六捷的同时，1946年8月7日，太行、太岳部队在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指挥下，进行了济孟战役；12月2日，太岳军区十二旅及其他部队进行了绛（县）垣（曲）战役；12月下旬，太岳军区部队进行了翼城战役。

在此期间，中共太岳区党委在阳城召开地、县委书记参加的群众工作会议，讨论并布置了在全区范围内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决定从全区抽出四五千干部组成工作组，奔赴农村，用一冬一春时间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1947年2月10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发出指示，指出1947年全区的主要工作是战争、土改、生产。上半年，太岳区腹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完成。据沁县、长子、高平、土敏、沁水、阳城、

晋城、王屋、济源等县的统计，农民从封建地主手中共收回土地640513亩，房屋139872间，5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外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边沿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开展起来，加紧进行。

在土地改革工作深入发动的基础上，广大翻身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促进了大规模参军参战和生产运动高潮的掀起，有力地支援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1946年秋冬的参军运动，其规模之广大、动员之深入，为本区前所未有的。晋城、高平、长子、屯留、翼城5县，一月之内有10000人自愿参军。阳城一县报名参军的达2500人之多，超过号召数的一倍半以上。晋城在三天内有4481人参军。从1946年7月到1947年7月，一年来太岳区广大群众（包括民兵）直接参战的有334019人，参加拆城、破路、破堡活动的有169550人，参加后方运粮、运被服、运军鞋、运盐、运物资、照料伤员的达2090583人。1947年2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发出了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太岳行署颁布了奖励生产条例。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党政军民各级都拿出90%的力量，组织生产，领导生产，保证了军需民食，为反攻作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七）

从1947年7月开始的全国性战略反攻，将人民解放战争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

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们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在太岳区，1947年8月23日，太岳兵团第四纵队和三十八军等部，分别由平陆县的茅津渡和济源县的官渡、青河口，强渡黄河；次日，太岳兵团第九纵队各部也分别从济源的官阳、李河沟、西富渡口胜利渡过黄河。同时，中共太岳区党委副书记裴孟飞和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率领太岳区党政干部数千人和支前民工万余人随军南下，太岳民兵也组织了20多个野战连队，随军远征作战。

太岳兵团突破黄河天险后，腰斩陇海路，给敌以沉重打击。不但在洛阳至陕县广大地区开辟了战场，为继续发展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从战略上调动了敌人，迫使胡宗南主力开始南撤，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和大别山的作战。9月，根据中共太岳兵团前委和中共太岳区党委的决定，撤销豫西工委，建立中共太岳五地委，由刘道安任书记（后增派杨蔚屏任副书记）。同时，成立太岳五专署，由贺崇升任专员（后增派张云生为副专员）；10月建立太岳第五军分区司令部，由郭庆祥任司令员，刘道安兼任政治委员，丁荣昌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太岳区的范围扩大为同蒲路和汾河以东以南，白晋路和晋博路以西，豫西之洛宁以北这个三角形地区，全区辖5个专区，48个县，即：一专区辖沁县、沁源、安

泽、屯留、长子、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二专区辖临汾、洪洞、浮山、绛县、襄陵、曲沃、翼城、沁水；三专区辖安邑、夏县、闻喜、平陆、稷山、新绛、永虞、永安、临晋、猗氏、万泉、荣河、绛南、解县、芮城；四专区辖阳城、晋城、高平、垣曲、济源、王屋、孟县；五专区辖新安、洛宁、洛阳、宣北、陕县、孟津、渑池、偃师。全区面积为18万平方里，拥有人口420万。

9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太岳兵团四纵队、三十八军沿陇海路西进，进行灵陕作战，并继而挺进陕东作战，积极创建豫陕鄂根据地。

鉴于太岳兵团南下和第八纵队成立，太岳区的许多领导干部转入野战部队，1947年8月下旬，调整了太岳军区的领导：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副政治委员顾大川。

在内线，为了配合太岳兵团的豫西作战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陕北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于9月下旬包围了运城，占领了运城飞机场，并对临汾外围进行了出击，控制了临汾飞机场。10月，八纵队再度围攻运城（即二打运城），因胡宗南部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四个旅从茅津渡渡河驰援运城，八纵队撤离运城外围，和太岳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到平陆围歼援敌。12月17日，发起第三次运城战役，历时10天，歼敌13000余人，运城宣告解放。运城战役的胜利，分割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联系，在经济上控制了广大农产区和潞村盐池，使运城成了支援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和豫陕鄂进军的

坚强后方。

1946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成立，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兼司令员，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十三纵队、太岳军区及吕梁军区部队一部，沿同蒲路北上，在内线大量歼敌。3月7日至5月17日，进行了著名的临汾攻坚战，拔除了蒋阎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歼敌25000余人，使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太岳与吕梁两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太原之敌益形孤立。接着，6月18日至7月18日，又进行了晋中战役，歼敌75000余人（其中太岳军区部队歼敌16000余人），解放县城14座，造成了围攻太原的有利形势。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历时6个月零19天，歼灭守敌12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统治。

1947年10月至12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武安县冶陶村召开了土地会议，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决定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和土地法大纲，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复查，并在复查的同时，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整党运动；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按照新的政策进行土改。太岳区党政领导干部和各地县的领导干部268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各地委普遍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冶陶会议精神。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生了“左”的偏差，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伤害了一些无辜的好人。太岳三地委召开的后宫会议，对干部打击面很大，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8年2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纠正土改中“左”倾偏向的问题。3月，

又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对老区土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工作方针。同时，区党委直属单位进行了整党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算地富思想和国民党作风，并清算了“左”倾偏向。4月，中共太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着重研究了纠正“左”倾偏向的具体问题。之后，各地全力纠偏，对党的各种政策作了普遍深入的宣传，混乱现象一般停止，人心转安，工作逐渐走上正常状态。10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召开区分委书记以上扩大干部会议。顾大川作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土改及会后工作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决定1948年冬到1949年春全区的中心任务是整党，结束土改和纠偏。到年底，各县先后进行了结束土改工作。在结束土改的过程中，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公平合理地分配了果实，确定了地权，领发了土地证。到1949年4月，全区完成了1905个行政村的整党工作，占全区农村总数的72.3%。其余400多个行政村的整党工作，于麦收前加紧进行。

根据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决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华北中央局。中共太岳区党委改属中共华北中央局领导，书记王鹤峰（7月由顾大川接任）、副书记顾大川。同时成立华北军区，太岳军区改属华北军区领导，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太岳行署改属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领

导，行署主任牛佩琮。6月，根据中共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太岳兵团渡河后建立的太岳五地委、太岳五专署和第五军分区，分别划归豫西区党委、豫西行署和豫西军区领导。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太岳区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闻喜、夏县、解县、安邑、平陆、芮城、永虞、永乐、临晋、猗氏、万泉、荣河、稷山、绛南等19县，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太岳行署归华北人民政府领导。此时太岳区共辖3个专区、17个县，党政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即一专区辖沁源、安泽、屯留、长子、霍县、灵石7县，地委书记刘开基，专员郭述尧；二专区辖沁水、翼城、浮山、绛县4县，地委书记刘尚之，专员张天乙；三专区辖阳城、晋城（一度析出晋城市）、高平、垣曲、济源、孟县6县，地委书记卫恒（后王毅之），专员刘裕民。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重新调整行政区划的通令，宣布撤销太岳、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原等七个行政区，以旧省界为基础，并且照顾到经济关系、群众历史习惯及自然条件等，分别划为山西省、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平原省（位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和北平、天津两直辖市，1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军区同时在太原成立。22日，太岳行署、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停止办公，所属各县分别归属山西省和平原省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36年广东党组织的重建 和南方临时工委成立始末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全省党员和工农群众继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先后在海陆丰，琼崖，广州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和东江、琼崖两块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东江、潮梅、琼崖、南路、北江、西江、中路等特、地委和广州、香港、汕头等市委，党员人数曾发展到五六万人，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围剿”下，党内又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使全省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到1934年9月，全省党的领导机关——香港工委被破坏，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工委书记郑怀昌被杀害；11月，在广州文化系统活动的党员陈黄光被捕，不久牺牲。至此，党在广东白区的组织完全被破坏，剩下少数几个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各自在广州、香港等地，以不同方式继续坚持斗争。琼崖和东江两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先后遭到失败，只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在偏远山区继续斗争。这种局面直到1936年，北方局派薛尚实、王均予来到香港、广州开展工

作，重新建立起党的领导机关，才使全省各地党的组织又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①。

一、“一二·九”运动前后，香港、广州等地党员的活动

1935年夏，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东北三省以后，又企图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党的这个宣言，通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传到香港，继而传到广州，给了广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在国命民脉危如累卵之际，见到党的宣言，有如久旱逢春雨，纷纷行动起来，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这时，因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而转移到香港、广州的宣侠父、王均予和原在广东各地暂时隐蔽的一些党员，都积极活动起来，各自团结了一批群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左翼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斗争。1935年5月，首先是宣侠父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他通过在黄埔军校时与他有师生关系的李济深，与原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取得联系，并展开了统战工作。同年秋，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鼎等

^① 参见香港工委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8月。

人发起，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宣侠父担任“大同盟”的不管部部长，另两位党员梅龚影、陈羲舟分别担任宣传部长和青年部长。随后，从上海来的党员金城和从泰国回来的党员苏惠等人也都加入了“大同盟”，他们通过“大同盟”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转载了党的《八一宣言》，并发表了许多主张抗日救国的进步文章，还举办了各种读书会，把党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传播到粤、桂及西南各省，积极推动了粤、桂两省和港、澳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①。

继宣侠父之后，王均予于1935年7月，从上海来到广州，王均予原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部作发行工作，在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广州，与原在发行工作中建立了关系的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负责人、勳勤大学进步学生麦蒲费（即邱萃藻）取得联系。之后，王均予在广州找不到党的组织，失去了党的关系，便与麦蒲费一起将《时代文化》读者会改组，建立了一个革命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同盟”（以下简称“中青”），按照共青团的组织形式和要求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入盟，盟员定期过组织生活，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到1935年底，在勳勤大学、中山大学等大、中学校发展了一批盟员，建立了“中青”的组织，随后，又在东莞、中山、新会、高要等地建立了“中青”组织。

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党员何思敬，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以进步教授面目出现，团结了一批教职员和学生，

^① 访问原香港工委工作人员杨华的记录。

进行左翼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张直心、杜埃等人于1935年冬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突进社”，并在中山大学和其它一些大、中学校发展了一批社员，还出版了一个进步刊物《突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中青”和“突进社”，均在广州爱国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原香港市委组织干事周楠，1930年被捕，他出狱时香港的党组织已被破坏，他便在香港当工人。到1935年秋他与石辟烂、唐章等人联络了一些进步的中、小学教师，在汽车工人、纺织女工、洋行勤杂工人当中，开办夜校，宣传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们成立了“香港救国会”，发动工人声援广州学生的爱国运动。“香港救国会”初成立时会员100多人，后发展到1000多人，在香港工人中颇具影响。

广西最早的党员之一陈勉恕，在党组织被破坏后，他先后到上海、香港坚持进步文化活动。1935年他通过陈汝棠的关系，到广东高明县合水区第三小学教书。该校原有一勤工俭学性的群众组织“力社”，陈勉恕去到第三小学后，组织“力社”成员学习马列主义，通过这一组织团结了一批师生。

此外，在广州、香港各大、中学校，一些爱国的进步的学生亦纷纷自动的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如中山大学进步学生李群杰、虞焕章（杨康华）等人的“马列主义行动团”，钱兴、梁荣生等人的“反帝反法西斯同盟”，朝鲜籍学生金昌华等人的“勇

进社”等等。当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后，广州的学生立即响应，从12月12日开始，连续举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得到穗、港工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声援，把广东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推向了高潮，但是，当时广东地方党的组织还没有恢复，由于白区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严酷现实，党员都很谨慎，相互之间没有组织关系，不敢贸然联系，因此，群众的抗日救国斗争，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处在分散的状态，从思想上来说还没有摆脱“左”的影响，因当时唯一能看到的党的文件，就是《大众日报》转载的《八一宣言》，各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但这一段的斗争，无疑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干部和思想上的准备。

二、北方局派干部来香港、广州 和南方临时工委的成立

1935年冬，广东、广西的党员，有人找到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要求北方局派人来广东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拨给活动经费。这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也与中央失去联系，经费很困难，无法解决经费问题，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负责人高文华遂派罗根到西南来开展工作。罗根原名梁华昌，后改各薛尚实，广东梅县人，当时任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河北省委委员。约在1936年初，薛尚实化名孔尚士（又名杨良）来到香港，经宣侠父介绍，在春节前后与苏惠接上组织关系，便在华南开展群

众抗救工作。

同年春，薛尚实与何思敬、梅龚影、苏惠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华南救国会，由何思敬总负责，薛尚实担任组织部长。薛尚实与苏惠等人分别前往广州、桂林、梧州等地，以华南救国会的名义与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推动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发展，并逐步将华南各地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统一领导起来，5月，由何思敬代表华南救国会，到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会后，华南救国会改称为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成为华南地区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①。

薛尚实这次到华南，没有明确要在南方建立党的组织，他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华南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虽在香港吸收了个别党员，但还是单线联系，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不久，薛尚实便离开香港返回天津，临行前他对张直心说：“我要离开香港，可能还回来，也可能不回来，如我不回来，以后会有人来跟你接关系”。

薛尚实回到天津时，中央已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6月1日，两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发动了“西南事变”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出兵湖南，并派人到天津，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征求我党对“西南事变”的意见，北方局遂决定派薛尚实重返香港。临行前，刘少奇向薛交待了两项任务：“去谒李、白，如变止即在南方建立党的工作。”并指示薛说：“桂方派

^① 何思敬，1941年给陈云的报告。

人来此，要我们提意见。我想给他们提两个意见：“一是政治上要开展积极攻势；二是军事上要采取防御攻势。估计李、白等可能中途妥协、动摇，如他们妥协了，你就不要找他们。你们就在当地组织群众，推动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救国，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吸收先进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建立党的组织。”“今后进行地下党工作，要大胆放手，不要怕魔鬼混进来”^①。

在北方局派薛尚实回香港的同时，王均予也到了天津找到北方局。王均予是在同年4月份，接到易吉光的来信要他去上海接组织关系（易吉光与王均予原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部工作，同在一个党组织，组织被破坏后，王到了广州，易到了天津，1936年4月，北方局为他恢复了组织关系）。王均予以5月到上海找到易吉光，易将王介绍给北方局的交通张继祖，王接着随张到了天津，见到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这时北方局对王均予在广州的活动已有所了解，恢复了王的组织关系，李大章向他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并肯定了他在广州的工作成绩，决定王均予重返广州，在广州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组织关系上接受北方局派往香港的薛尚实的领导，介绍王均予去会见薛尚实^②。并指示在今后工作中注意克服关门主义倾向。

薛尚实、王均予接受了北方局的任务，先后回到香

① 刘少奇：《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第249页。

② 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出版第1辑。

港、广州，他们积极地贯彻执行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北方局的指示，全力以赴在南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薛尚实回到香港后立即将3月份吸收入党的候补党员张直心转为正式党员，并指示张直心在“突进社”的骨干中发展党员，张直心便在中山大学“突进社”的骨干中发展了杜埃、吴超炯、饶彰风等六七个党员。其后，薛尚实去了广西，获悉宁、桂双方正酝酿和谈，便没有再去见李、白，而集中全力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首先吸收了莫西凡入党，并在梧州和广西师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久，薛回到广东，和苏惠一起在香港，广州等地发展了吴有恒、赖石昂、罗范群等人入党，并在中山大学建立了党支部。王均予于7月回到广州，随即在“中青”的主要骨干中吸收了麦蒲费、林振华两名党员，并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接着又发展了张定邦、温焯华、王士钊等一批党员。到1936年9月以前，薛尚实、王均予等已先后在香港、广州、梧州、澳门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由于薛尚实、王均予积极贯彻执行了北方局的正确指示。加之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华南地区已有了比较好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基础，因此，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进展较快，为了加强领导，以利于工作的开展，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9月，薛尚实收到北方局关于建立和恢复组织的指示信，便在香港建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地区党的工作，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临委）初成立

时机构还不健全，没有建立部门工作，只有总负责人薛尚实和几个工作人员：苏惠、姚铎、莫西凡、饶彰风等人，主要工作是进行党组织的建设，以及在各省、区建立组织和恢复工作。同年11月，刘南临委出版了机关刊物《大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大路》创刊号上，向党内公开。至此，中断了两年的两广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党的组织活动开始全面恢复。年底，南临委与北方局失去联系，1937年3月，薛尚实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通过潘汉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联络站，直接与延安党中央建立了联系^①。

三、在南临委领导下，华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一）广州市工作委员会的建立。1937年9月，薛尚实从香港到广州，通知王均予已在香港成立了南临委，并指定王均予筹组广州市工委。这时广州市已在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燕塘军校等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10月，成立了广州市工委，王均予为书记，罗范群为组织部长，麦蒲费为宣传部长，林振华、周明为委员。市工委成立后，统一和加强了广州市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到1937年下半年，广州市内已建立了16个党支部、有96名党员^②。

（二）西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原在高明县合水区

^① 《薛尚实自传》，1945年在盐阜党校参加整风运动时所写的。

^② 《南委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12月11日。

第三小学活动的党员陈勉恕，在与南临委取得联系后，于1936年10月，在三小的进步教职员和“力社”的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书记刘曼凡，委员陈权、阮海田等。这个支部对外称西江工作委员会，在高明、高要、新兴、鹤山4县的边界地区活动。1937年下半年，西江区已建立了6个支部，发展党员24名。

（三）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吴有恒、赖石昂等人入党后，薛尚实布置他们在中、小学教师，和工人、渔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另外从海外又回来一些党员，其中一些是在海陆丰根据地失败后流落到港、澳做工的老党员，在南临委成立后，他们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有的还在自己联系的进步青年中吸收了一些党员，到当年冬，已在中、小学教师、人力车工人，修船厂工人及渔民、洋行勤杂工中建立了党的小组和支部，在此基础上，南临委决定11月成立香港工委，由吴有恒为书记。工委成立后，港、澳各基层党组织统由工委领导，到1937年下半年，共建立了18个支部，党员百余人。

（四）韩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1936年10月，南临委派张直心到东江、韩江一带去发动各县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张直心在大埔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大埔县临时工委，饶乃跃为书记。同年冬，南临委又派李平到潮汕地区去开展工作，李平到潮汕后，发动进步学生，组织了义勇军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一些老党员的组织关系。1937年1月，建立了汕头市党支部，李平任书记。2

月，支部根据南临委指示，分别派人到梅县、揭阳、普宁、澄海等县开展工作，先后在上述各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松口支部、梅县城支部、汕头抽纱女工支部、学生支部、揭阳支部、普宁支部和澄海支部。3月，南临委根据潮汕地区党组织发展的情况，决定成立韩江工委，指定李碧山为书记，李平为组织部长，曾应之为宣传部长。同时，成立了汕头市工委，李平为书记。韩江工委成立后，大埔县临时工委归韩江工委领导。4月，又成立了梅县工委。1937年下半年，韩江工委领导下的党员也发展到百余人，根据中央指示，整个韩江工委划归闽粤赣边省委领导。

（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广州市工委成立后，王均予先后派人到东莞、中山、新会、高要等县开展工作，在上述各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进一步加强珠江地区和粤北、东江等地党的组织发展工作，1937年初，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先后由王均予、麦蒲费、温焯华等人负责。外县工委随即派人赴14个县、市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在珠江区建立了14个支部，发展党员150人；在东江区建立了5个支部，发展党员25人，在粤北发展党员2名。

（六）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的建立。1931年以前，在广东省委领导下曾经有过海总机关，1931年6月，海总机关被破坏，当时在海总开会的省委书记蔡和森和海总负责人施幌、李大林等人均被捕，以后由于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海总机关没有恢复，但海员中仍有党组织的活动，到1934年冬，香港工委被破坏后，香港海员中

的党员才开始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当时上海还有海总机关，到1936年夏，上海海总的负责人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香港海员中有一个余闲乐社的群众组织，是由上海海总领导的，里面有些党员，但都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年初，中山大学学生、广州“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生，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从广州跑到香港到了“日本皇后”号船上当工人，与船上余闲乐社内的党员曾寿隆等人一起，在船员中开展工作，把“日本皇后”号船上的工作搞得很活跃。“日本皇后”号抵达上海后，曾寿隆介绍曾生见到了原海总负责人丘金，曾生要求丘金介绍他入党，丘金告诉曾生自己已与组织失去联系，正在设法找党。不久，曾生接到“中青”成员钱兴的信，告诉他王均予已在广州建立了党的组织，要他赶快回广州。9月，曾生回到广州，10月由王均予派人吸收曾生入党，王均予又将曾生的关系介绍给薛尚实，薛派曾生继续到海员中开展工作。不久，丘金从上海来到香港，曾生将丘金介绍给薛尚实，薛为丘金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同年12月，南临委决定成立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由薛尚实召集丘金、曾生等人开会，宣布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丘金任书记，曾生任组织委员，叶盘生任宣传委员。海员工委成立后，除海员中原有的老党员先后恢复组织关系外，又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到1937年下半年，香港海员中已建立了4个支部，有党员32人^①。

^① 丘金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的复信，《关于中共香港海委活动的一些情况》，1982年8月。

(七) 广西工委的建立。薛尚实到香港后，曾经多次到广西南宁、梧州、桂林、玉林等地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运动。他与梧州的莫西凡、南宁广西师专的熊德山教授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在广西学生和工人中建立了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和发展了一些党员。南临委成立后，由莫西凡负责与广西方面联系。1936年秋，原广西地下党的党员陈岸、彭懋桂、刘敦安等人也通过梁寂溪与陈勉恕取得了联系。10月，陈勉恕派党员李守纯赴广西，11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郁江、梧州、南宁等地的党员代表会议上，李守纯建议成立广西工委，获得与会代表同意，就在这次会议上选出陈岸、彭懋桂、刘敦安等人组成了广西工委，由陈岸为书记。同月，薛尚实到达南宁，彭懋桂向薛汇报了工委成立的情况，得到薛尚实的支持和同意，并拨给活动经费，广西工委由南临委领导。1937年初在广西已建立了南宁、梧州市工委、桂林市临委、桂西区特委、浔江、邕江区特临委，还成立了全省性的救国会、省学联、省妇女会，各地区还建立了抗日锄奸同盟、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抗日青年同盟、劳动农会等进步群众组织，在桂林、南宁、梧州等地还成立了义勇军，到1937年底全省党员已发展到千余人。

此外，南临委还在香港建立了文化特委，领导粤、桂两省和港、澳地区的文教、报刊、通讯社等方面的工作，在广东、广西建立了军团委，管理两省在国民党军队中党的工作；1937年夏南临委派李群杰到云南开展工作，建立了昆明支部（又称云南特别支部），在这年下半年云南建立了6个支部，发展党员35人。同年初，南临

委还派钱兴到厦门，恢复了厦门市临委。

四、南临委与华南各游击区的联系

1936年10月，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的张鼎丞、邓子恢部，派交通到香港，与南临委取得联系，南临委随即派姚铎到闽西南，与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建立了关系。1937年5月，闽西南代表方方又到香港，通过南临委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琼崖特委与南临委的联系也于1937年被打通，并通过南临委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琼崖特委在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后，在冯白驹等人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几经挫折，党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动，终于渡过了难关，保住了红旗不倒。从1936年初开始，琼崖特委先后恢复了琼山、文昌、琼东、定安等7个县委以及临高县临时工委、南区临委和海口市委，总计共建立了区委40个，支部50多个，党员发展到600多人。同年5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选举冯白驹、王伯伦、黄魂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1937年党员增加到900人，还掌握了一部分的武装。

此外，南临委还与云贵边，云桂边，左、右江，闽北等地区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与南洋各地华侨的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也建立了联系^①。

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从1936年9月成立到1938年4月，在一年多的时

^① 《冯白驹自传》。

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使广东、广西等西南几省以及香港海员中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总共发展党员2600多人（包括恢复老党员的组织关系），建立支部80多个，为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大发展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建立以及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

为进一步加强华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适应全国范围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派张云逸、云广英来香港，使南临委及时得到中央的指导。同年9月，中央又派张文彬（张纯清）抵广东加强领导，10月，张文彬召集南临委领导人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广东省委又告成立，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梁广任职工部长，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任青年部长，张越霞任妇女部长。南方各省也相继成立了省委，南委在完成了她的光荣历史使命后，于1938年4月撤销。

（杨起君执笔）

李富春、蔡畅由法国赴 莫斯科时间考

阎 永 雪

《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一期上刊载的题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和中共旅莫支部》的文章中谈到：1923年至1924年9月旅欧支部先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三批学员；“中共旅欧支部派出的第三批同志于1924年9月赴苏。有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穆青……等20多人。”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证实，李富春、蔡畅不是1924年9月同聂荣臻、穆青等20多人一道赴苏，而是1925年1月同郭隆真等一行5人赴苏的。

1924年8月16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先后收到旅莫党团组织的来信，得知第三国际允许一批在西欧的中国同志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来信并提出了这次选择人员的标准和名单。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随即与中共留法组会商，按照来信所提要求筹备派人去莫学习。当时旅莫党团组织要求西欧方面务必派李富春等7人赴俄，而旅欧党团组织因为周恩来、刘伯庄等已回国，其他一些骨干又陆续赴莫学习，缺少领导成员，李富春等又不能如期前去。为此，旅欧党团组织经过反复多次研究，确定赴莫学习第三批名单，

是：傅烈、穆青、王自言、喻和卿、熊味根、王西屏、王锡三、郭玉昌、郭达垓、胡伦、徐东、粟泽、饶来杰、孟杰亭、华鄂阳、黄品铭、陈家珍、彭树敏、聂荣臻、李林、范易、冉钧、廖仁先、李传龄、黄平民、石琼、朱祺。这27人由穆青负责，于1924年9月22日晚9时55分从巴黎起程赴莫。

在27人起程前的9月20日，李富春给旅莫的王若飞、陈乔年、刘伯坚等写信说：“这次来俄事，你们来信的意见，在西欧方面实在经过许多的考虑，无奈在事实上实在有许多困难，而且是一时不能即行解决的困难所以名单不能如你们所指定的来的圆满。……在理由上不能否认你们指定名单的理由，在事实上有许多万分行不通的地方，就只好如此了。……西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及留法组，对于我1人的赴俄问题的讨论，实在费了许多时间，总之我个人也只好打破现时赴俄的观念，暂时留法了。”李富春服从组织决定，担任了旅欧团组织的编辑委员会主任和《工人月报》的编辑等职务，蔡畅也仍在巴黎担任支部教育干事。

由于旅欧党团组织未按旅莫党团组织要求派32人赴莫，而只派去了27人。故旅莫 Cy 地方团书记刘伯坚于1924年10月15日给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写信说：“据27个同志说，你们因旅莫所要的7人只有2人能来，其他5人都不能来，故宁缺5人，不找人补充。……现在我们尽可能的再向第三国际交涉，要求由西欧再来几个同志和女同志，……富春与蔡畅如能来，在这里毫无问题，因为安插一二人入东大随时都可以办到。”之后，

旅莫青年团组织又与第三国际进行了交涉，结果只许西欧再来3个女同志；他们又向东方大学校长交涉，要求再来几个男同志，得到了允许。留法组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地商定出了再派5位同志赴莫的名单，并取得了旅莫青年团组织的完全同意。这时由于旅欧团的“六大”即将举行，工作太忙，所以留法组又决定赴莫的5人于团“六大”结束后的次年1月1日再动身。因为未能及时收到第三国际汇给赴俄路费以及办理护照等原因，推迟于1925年1月17日下午，李富春、蔡畅、郭隆真、马志远、周世昌等5人方从巴黎动身赴莫。他们途经柏林住了5天，于1925年1月下旬到达莫斯科。1月27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了座谈会。李富春在会上对5人来莫的经过及旅欧青年团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2月11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将法国来的党员李富春、蔡畅、马志远转为旅莫支部的党员。

彭德怀同志视察敦煌小记

王 文 焕

1958年10月22日下午，两辆小汽车嘎然一声，在敦煌县委门前停下。车内出来一位浓眉大眼、体魄健壮、穿着俭朴的军人，还有几位随行的同志。

当天在机关值班的县委副书记刘孟晋，听说来了中央领导，连忙走出大门。一位部队同志把刘孟晋引到那位身穿旧军大衣、脚蹬青布鞋、面容和蔼可亲的军人面前介绍说：“这位是彭总，今天到你们这里来视察工作。”

“啊！彭总，您好！”刘孟晋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彭总结实有力的大手，作了自我介绍，并对没有提前出来迎接表示歉意。

彭总微笑着说：“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一家人，不需要搞什么迎接。”

车开进县招待所，停在一排简陋而洁净的平房前。刘孟晋深深不安地对彭总说：“我们这里条件差，房屋旧……”

彭总爽朗地笑出声来，连说：“没关系，我们经济基础差嘛，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接着他又叮嘱说：“生活上可不要给我搞特殊，大家吃啥我吃啥。”

这时，只见彭总又转身走向车边，从车里捧出许多

洁白的棉花。这是社员们交售新棉时撒在路上，被他沿路拣来的。彭总语重心长地对刘孟晋说：“生产这些也不容易，浪费了多可惜！你们要告诉干部群众，让他们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进了招待所客房，彭总便和刘孟晋聊了起来，问他是不是本地人？刘孟晋回答：“是当地人。”彭总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是当地人，更应该把家乡建设好。”彭总又问他多大年纪？刘孟晋回答说：“今年29岁，没有经验，让我这样年轻人挑县上的重担子，真是……”彭总摇摇头说：“你算什么年轻，我象你这个年龄早就指挥千军万马了，你正是干的时候呀！”

那天晚饭，彭总坚持要在县委食堂和大家一起就餐，吃的清汤宽叶子拉面、萝卜丝菜。吃过饭后，彭总很高兴，又到伙房和炊事员一一握手，还和他们拉家常，感谢他们的服务工作。

次日上午，刘孟晋代表县委向彭总汇报工作。当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敦煌县也实行了一县一社，劳动分配上推行二十个大包干（即免费供给吃饭、穿衣、看病、上学、办婚丧事等），大锅饭、形式主义、“共产风”搞得很厉害。

彭总在听汇报时，浓眉紧锁，态度严肃，说话不多，但每句都抓住要害，一针见血，很有份量。

当彭总听到敦煌县实行一县一社介绍时，直率地说：“一县一社不是方向，不是大了就好，要看生产发

展的水平。”

针对敦煌县劳动分配上推行的二十个包干，彭总明确指出：“包不了就不要勉强，超越了客观现实就要碰壁，就会犯错误，就会遭到失败。共产主义社会，人民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极大的丰富，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

谈到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情况时，彭总插话说：“粮食打多少算多少、报多少，要实事求是。农业生产，上一季要看下一季，今年要为明年做准备、打基础。粮食生产一定要抓紧，有粮就好办，没粮就不安宁……”

下午，彭总到杨家桥公社视察，参观了社办缝纫厂、食堂，又到田里和社员一起参加了劳动。

彭总参观杨家桥一队公共食堂时，亲自拿起饭勺检查饭菜的质量，并向有关人员了解伙食情况。当他看到全队男女老少都挤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情景后，转身问刘孟晋：“这样多的人在一起吃饭你看好不好？”又说：“共产主义决不是吃大锅饭、睡大炕！”在伙房地上，彭总发现一堆拣剩的菜叶，许多好菜也被扔了，十分可惜地说：“菜叶也不要浪费。吃不掉可以拣下晒干，储备起来……”

彭总视察完食堂，来到杨家桥公社。杨家桥是敦煌有名的水果之乡，盛产大肉桃、李广桃、长把梨等。公社会议室桌子上摆满了五光十色、香喷喷的各种水果。刘孟晋拿起一只长把梨请彭总品尝，彭总也拿起一只递给刘孟晋。彭总吃了一口，风趣地说：“味道不错。我吃梨只是尝尝味道，你吃梨就要带领群众多栽果树，让

更多的人都吃到你们美味的果实……”

10月24日，彭总乘车去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参观，他让刘孟晋和他坐在一起。开始，刘孟晋惴惴不安直直坐着，也不敢说话，显得很拘谨。彭总用双手让他靠到座椅后背上，笑着说：“年轻人，你靠着坐不舒服，为啥要直挺挺的？不要拘束嘛。”

一路上，彭总看到村边有许多简单粗糙的土炉子，就问刘孟晋：“这是不是群众炼铁的土高炉？”刘孟晋回答：“就是的。”彭总又问：“炼得出铁？”刘孟晋回答：“炼出的也是烧结铁。”这时彭总叹了口气说：“这样的炉子怎么能炼铁呢！能办到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就不要硬办。”

到了莫高窟，彭总看见两个公安人员站在门口，便问刘孟晋：“这是不是专门调来搞保卫的？”接着彭总又说：“不要神秘化，这样搞会脱离群众。”

在参观莫高窟期间，彭总精神奕奕，看得仔细，问得认真。他一边看，一边赞叹，并对管理人员说：“一千多年了，很不容易，还要好好修缮，把它完好地保存下去。”

彭总参观后，向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谢意，并追昔抚今，欣然命笔，题写了五言诗一首：

“玩视千佛洞，
历史枉自长，
闹市成遗迹，
敦煌行人稀。”

一九四九年，
兰州灭继援^①，
红旗向西指，
春风笑昆天。”

① 系指彭德怀同志于1949年夏，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扫灭青海军阀马步芳之子马继援部队的战事行动。